

國立政治大學

碩士論文

題目：胡錦濤時期中美安全關係研究



指導教授：邱坤玄 教授

研究生：趙大均

中華民國 一〇一〇年六月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分類與整理	8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18
第四節 研究範圍限制與章節安排	22
第二章 後冷戰中美關係之發展	24
第一節 理論的觀點：中美安全互動的意義	24
第二節 後冷戰初期的美中關係關係：美國觀點	29
第三節 後冷戰初期的美中關係關係：中國觀點	39
第四節 小結	45
第三章 胡錦濤時期中美軍事安全關係之競合	47
第一節 核擴散議題	47
第二節 區域衝突與權力平衡	54
第三節 台海問題	61
第四節 小結	65
第四章 胡錦濤時期中美經濟安全關係之競合	68
第一節 貿易逆差與美中關係	68
第二節 人民幣匯率與升值	76
第三節 金融風暴與美中關係	81
第四節 小結	90
第五章 結論與研究發現	9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一、探討「國際體系」與「美國外交政策調整」的相關性

蘇聯瓦解，標誌著建立在「蘇聯威脅」的兩極化的國際政治結構出現鬆動，國際間的權力關係也出現了急遽的變化。對於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本質與發展、世界秩序的評估、美國的對外政策作為，美國學術與政策研究界，在環繞的「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下，存有「樂觀論」與「悲觀論」的爭議¹。前者認為冷戰的瓦解，象徵著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社會多元化訴求不但贏的全面的勝利，也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因此美國對外政策應建立在「民主和平」的方式上，追求全球經濟相互合作的利益；後者評估後冷戰全球將進入「文明衝突」的對抗中，美國若要維繫、鞏固自身於後冷戰時期的霸權，則必須重視物質力量的建構，並將權力平衡視為外交政策的主軸²。

國際體系的轉變深刻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內涵，舉例來說從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³與小布希(George W. Bush)⁴的對外政策來說，一方面反映了後冷戰時期兩種思維的爭議的內容，同時也顯示美國對外政策的調整。針對「體系轉變」與「美國外交政策」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分析，吾人有以下的假設，並希望

¹ 關中，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遠景季刊*（台北：2002）第3卷第1期，頁3-8。

²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1992)pp.3-18.

³ 柯林頓於1994年6月提出「交往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指出安全、經濟與民主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而美國的安全有賴於美國願意在國際社會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該戰略強調交往與擴大的意義在於，美國必須在全球進行選擇性的交往，使有限的資源集中於應付影響美國利益最大地區或議題的挑戰；而所有的美國的戰略利益都有賴於擴大民主與市場國家社群來達成。參閱，“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Released”，Office of Press Secretary, Washington, D.C., July 21, 199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5, No.31 (August 1, 1994), p.522. William J. Clinton,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1995-1996* (Washington D.C.: Brassey's, January, 1995), pp. XII.9.

⁴ 小布希的對外政策主要建立在新保守主義的思維中。新保守主義為一種社會思潮，重視權威與共享價值文化；其社會主義立場通常會出現一種封閉的民族主義，懷疑多元文化主義⁴；新保守主義同時強調向世界推展民主價值對確保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但認為推廣此一價值不是靠國際協調，而是靠美國的實力甚至是武力。有關新保守主義的內涵可參閱 Andrew Heywoo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Foundation, 2002), p.50.

經由這樣的假設模式中，從具體的「外交政策」、「國家互動」與「國際事件」中，得到經驗性的驗證，並且比較政策調整的內容意義。

吾人將所關注的「體系」與「美國外交政策」相關性分析的基本架設。第一、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與美國對外政策密切相關，後冷戰格局為一超多強，而美國外交政策主要的作為，即為鞏固美國霸權與維護國家利益此一目標。第二、美國對外政策在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擺盪，換言之，「如何鞏固美國霸權的手段與途徑」，在美國內部有所爭議，大體上小布希總統偏向「現實主義傳統」，柯林頓與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Jr）總統較偏向「自由主義」傳統。第三、美國的全球與區域戰略決定了美中台三變的互動關係與台海政策；或者說，就「國際因素」來看，中美關係是鑲嵌在美國的全球與亞太戰略的架構中。第四、「權力平衡」仍是美國全球、區域、美中關係最核心的思維；深入而言，「權力平衡」主要是建立在美國物質性條件下。如何將這四個一般性的假設變項，提出經驗性、政策性的分析，同時尋找解釋項之間的邏輯關係，成為本文第一個重點

二、分析體系轉變下的「中美關係」的性質及其意義

就「全球戰略格局的轉變」而言，這是傳統宏觀、政治權力與國家中心的論述，主要關注的命題在於後冷戰的國際政治格局的轉變的性質、中共對於國際結構的認知與後冷戰霸權國美國的關係、國際格局體系美中關係對兩岸關係的影響等三個層面。基本而言，後冷戰的國際政治改變了冷戰傳統的二元體系，美國儼然成為世界的霸權，在此同時，國際上也興起中國威脅的討論。

對美國來說，對於中國崛起的態度是充滿疑慮的，萊斯在「促進國家利益」一文中指出，中國大陸並非甘於現狀的強權，而是一個想改變亞洲權力平衡，並使之朝向對其有利的強權。美國要以經濟互動促進中共內部轉變，曾是要圍堵中共在權力上的野心，美國應追求與中共合作，但兩者有利益衝突時，不應畏與中共對抗⁵。因此，中共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而非柯林頓所謂的「戰略伙伴」，

⁵ Rice Condoleezza,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79(1), 2000, pp.46-51.

對中共採取既交流又圍堵的「圍和」(Congagement)策略，防止中國崛起成為歐亞大陸的霸權或是威脅美國盟邦的安全⁶。

對於中國來說，中共除了特別強調跨世紀國際政治最重要的現象是中國崛起外，對於世界格局的評估，也從過去世界朝多極化的方向過渡與發展，到現在強調世界多極化應該得到發展，同時在國際上積極推動此種趨勢的進展⁷。

中共對於後冷戰國際政治格局的評估，具有以下的意義⁸。一、中共具有強烈的主觀願望成為國際政治的一極；二、中共顯然主張多極化的國際格局，比兩極化更有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其主要目的是要打破美國獨霸的局面，因為中共認為「多極化」世界格局的形成，有利於實現主要大國的權力平衡，有利於防止一兩個大國操縱國際事務，因而有利於制止霸權主義；三、中共對於多極化的格局，由原來力求適應多極化的趨勢，現在則是積極促進多極化的發展；四、戰略伙伴關係是促成多極化主要方式。在朝向多極化發展的世界中，中共主張傳統的權力平衡，雖然可以改變有關國家間的權力對比，卻不能改變有關國家的外交政策意圖或者利益衝突的現實。而夥伴外交則假定，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包括兩國間的相互依賴和全球範圍的相互依存，使國家之間의 共同利益多於衝突利益。

在此背景下，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基本矛盾在於：企圖追求「多極化」的崛起中的大國，與維持「單極化」既有國際政治格局的霸權之間的衝突。由於台灣問題更涉及美、中兩國的核心利益、戰略定位，因此成為兩國之間主要的矛盾來源。

從結構現實主義者 (Structural Realism) 的眼中來看，國際結構本身有特定的規律與制約，並且是影響國家行為者的主要因素。假若如此，則蘇聯解體之後所改變的國際結構，應該也改變了許多國家在冷戰體系下的戰略思考和國家行為。這樣的改變，是否象徵著新的國際結構的建立，而國家行為的外部制約力量是否由此而來，這都是亟待確立的問題。質言之，從後冷戰時期 (特別是胡錦濤

⁶ Zalmay M Khalilzad, "Sweet and Sour Recipe for a New China Policy", *RAND Review*, 23(3), 2000, pp.6-11.

⁷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31 卷第 3 期 (台北：2000 年)，頁 23。

⁸ 同前註，頁 28-29。

掌權以來)國家互動的模式去探討美中關係的內涵及其意義,構成本研究的第二個重點。

三、探討中美關係下的安全概念及其意義

從戰略、國家利益與安全的角度思考,後冷戰時期美國存在三大戰略的調整方向。⁹美國的第一種選擇是孤立主義,不過這可能是一種得不償失的選擇。第二種則是多極化和國際權力平衡的選擇。這種選擇要求美國在世界各地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就像19世紀英國在歐洲大陸事務中成為「隔岸平衡者」一般(offshore balancer)。在亞洲,美國也必須防止任何大國稱霸,可以通過在日本與中國兩大強國之間轉換聯盟關係來維繫美國的利益。深入來說,美國充當「隔岸平衡者」顯然在短期內代價不大,但是從長遠看將面臨其他大國更有力的競爭,甚至侵害到美國切身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國有時不得不為大國平衡而支持非民主國家反對民主國家,這違反了美國的政治原則。第三種選擇是美國擔當全球領導。為此美國必須鞏固和加強北美、歐洲和東亞先進國家的民主同盟,形成民主和平區,並且使之擴大;另一方面保持美國的軍事優勢,但使永武力時必須謹慎,避免能力的透支;要擴展美國的經濟實力,保證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

承續上述觀點,根據美國學者波森(Posen)與羅斯(Ross)的整理,他們認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擁有四大戰略選擇¹⁰,亦可作為另外一組對照的觀點(相關內容請參閱表1-1)。

若從中國的觀點出發,「新安全觀」則構成了其後冷戰時期戰略安全思維的主軸。中共「新安全觀」的提出,是在北約東擴,美、日「安全合作新指標」及美國介入台海危機等背景下,中、俄等五國首腦聚集上海,討論邊境地區軍事互信問題,這是中共考慮新型安全問題的發端¹¹。繼之中共於1996年7月20日在東協外長會議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的安全觀念」,1997年4月23日江澤民在俄羅斯發表「『中』俄關係與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中,首度宣示

⁹ Zalmay Khalilzad, "U.S Grand Strategie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 and World", in Zalmay Khalilzad, ed., *Strategic Appraisal 1996*, Santa Monica, Cal., :Rand, 1996, pp.11-34.

¹⁰ Barry R.Posen, Andrew L.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6-1997, Volume 21, Issue3:5-53.

¹¹ 張文木,「中共國家安全哲學」,《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1期,頁24。

「新安全觀」政策，認為必須棄「冷戰思維」，反對集團政治，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與爭端，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以對話協商促進相互瞭解和信任，通過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¹²。同日江澤民在俄羅斯杜馬發表的演講中，向全世界闡明了中共關於維護國際安全的基本主張，即各國有權根據本國國情，獨立自主的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各國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

吾人以為，美中安全思維的比較之下，對其國家互動過程中所涉及的安全議題進行分析才具有深刻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才能延伸本研究之「體系-國家行為-對外政策-安全議題」的分析軸線。

表 1-1 提出之美國四種戰略選擇

戰略選擇	新孤立主義	選擇性交往	合作安全	優勢
分析支點	最低限度、防禦 現實主義	傳統均勢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	最大限度現實主義和單邊主義
主要國際政治問題	避免捲入	大國和平	和平不可分割	競爭對手崛起
世界秩序	遠距離均勢	均勢	相互依賴	霸權
國家利益概念	狹窄的	有限的	跨國的	廣泛的
地區優先選擇	北美	工業化歐亞	全球	工業化歐亞和潛在對手
北約態度	撤出	保持	轉變與擴大	擴大
地區衝突	放棄	遏制，有選擇的 干涉	干涉	遏制，不加選擇的干涉
人道主義干涉	放棄	有選擇性干涉	幾乎不加選擇干涉	不加選擇的干涉
武力使用	自衛	選擇	經常	任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¹² 人民日報，「江澤民在杜尚別出席「上海五國」元首會晤時的講話」2000年7月5日。

第二節 文獻分類與整理

一、文獻基本分類

本文在文獻性質的分類，吾人區分為以下幾種類型。第一、一般性的國際政治理論；第二、美國與中國官方的政策聲明或各類研析報告；第三、一般性政策分析；第四、有關個別事件敘述性質的文獻。

(一) 一般性的國際政治理論：本文所採用的分析架構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現實主義為主，包括了結構現實主義與霸權穩定的基本假設，並以相關學者之著作置為本文的理論框架。這一類型的文獻，能幫助本文的研究取得學理上的憑藉，並以此作為分析架構。

(二) 美國與中國官方的政策聲明與智庫研析報告：例如美國總統與中國領導人的重要講話；此外亦包含官方所作之各項政策評估報告如：「國家安全戰略報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國防部的「四年國防檢討報告」(QDR)、中國軍力報告 (China Military Power Report) 等。這類報告多涉及，探討各年度美國對於東亞區域局勢的研判、美中關係的互動、對各國 (包括中共) 內政外交的評估，以及美國所面對的全球或區域情勢，和可能的發展和因應之道。最後美國許多得著名智庫，例如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 (CSIS)、美國企業研究所 (Enterprise Institute)、等，也經常性的發表有關東亞局勢、中共發展評估或者中共與美國未來關係發展等研究報告，提供學術研究或者政策決策參考的依據，也納為資料蒐集的標的。

(三) 有關政策分析性質的文獻：關於政策分析性的文獻，其來源一般多為學術性的論文期刊為主，並有另部分是屬於政策討論的專書。在學術文章部分，該部分之文獻頗為豐富，大抵來說可分成兩種種研究的方向：

1. 探討美國的對華政策，以美國與中共關係為寫作的主軸，而將兩岸關係放置在美中關係的依變項之中，亦即將美國對中共外交政策的調整，作為兩岸關係變化觀察的中心點，把美國的政策突出於台灣與中共之上。

2. 探討中共的對美外交政策，把中共對美政策的調整作為探討美國與中共，以及兩岸之間關係變化的切入點。因為中共對美國政策的變化，其亦影響中共與週邊國家，諸如日本、南北韓、俄國、印巴等雙邊或多邊關係關係，台灣因為屬於這一個範圍中，故該文獻可供參考的部分亦多

(四) 有關敘述個別事件性質的文獻，主要是對個案的描述與探討，而這樣的個案，對於美中安全議題互動的探討，都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二、相關概念的文獻整理

(一) 中國崛起的評估

「中國崛起」或「中國威脅論」以美國學界為主要發起者，主要觀點即在於蘇聯瓦解以及中共國力崛起，讓中共存在對外擴張的趨力。福瑞伯格 (Aaron L. Friedberg) 以「權力移轉」理論說明強權崛起過程中最具侵略性的徵兆，而中共近二十年的發展，存在該種特徵。美國軍方亦不斷提醒應積極防範中共的崛起。孟儒 (Ross H. Munro) 與白禮博 (Richard Berntein) 所著《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一書，則直接提供美國與中共對抗的想像場域，也引發美國學界對於未來美中關係發展的辯論¹³。這些文獻多半呈現出美國學界多於中國崛起的疑慮與分析。

中共近年來軍經實力大有增長，在北京奧運後也呈現「軟實力」(soft power) 上昇的現象。特別是 2005 年以後，胡溫領導集體提出「和諧世界」新口號，來總括過去對和平共處五原則、新安全觀、公正合理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等主張，並獲得西方的關注，甚至擔心「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 是否要取代「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¹⁴。

中共「綜合國力」的提升，相對地強化其軍事現代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發

¹³ Ross H. Munro, Berntein Richard 著，許綏南譯，*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 (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 年)，頁 3-5。

¹⁴ 邱坤玄，「台灣的中共外交研究與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東亞研究* (台北：2009 年)，40 卷第 2 期，頁 18。

布「2010年國際形勢黃皮書」，認為在軍事總實力上，中國軍隊人數和武器裝備多，因此排名世界第2，僅次於美國。2010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全球軍力報告」指出中共軍費支出僅次於美國，為全球第二大及亞洲第一軍費支出國。¹⁵

1990年代起，許多美國學者就倡言中國威脅論，而美國對於中共的外交也一直處在「交往」（engagement）與「圍堵」（containment）政策之間，在交往思維下如何改變中共的政體，一直是美國理想主義者的目標，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將成為人類政府的終結形式¹⁶。其觀點反應出，冷戰後美國對西方價值觀高度自信與自傲。而中國的崛起也促使美國思考著中國是否能夠融入國際社會和走上民主；鑑於感受到中共對美國日增的威脅，美國許多國會議員、保守派媒體工作者和卸任的情報官員及戰略學家，都主張為了預防中共坐大，應該對中共採取全面圍堵的政策。

Nicholas D. Kristof 在「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一文認為，中共到了21世紀上半期的經濟會超過美國而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增長的速度，中共將與美國、日本、歐洲並列為世界四極之一。中共的經濟成長將對世界經濟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例如全球性原料特別是石油的供應短缺，以及生態環境惡化。而根據「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來估算，中共的國防支出已高達900億美元。龐大的國防預算使得中共購買高科技先進武器，強化中共國防戰力。他也擔心，在太平洋和遠東出現權力真空，中共將會獲得戰略機會去擴大他在此區域的利益。文章結論提到「國際社會如何容納新興強權的雄心」的問題，如果中共能夠持續維持經濟成長，那麼將是未來數十年內國際關係最重要或最危險的任務之一。

李明認為，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發展，已使中共成為世界矚目的超過十四億人口的市場，吸納著舉世生產的物資，促成國際經濟榮景；同時由於中共生產力提升，中國大陸也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的出口國，提供全球所需的消費品。「崛起的

¹⁵ 相關報導可參考新浪網，網址：<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6-09/0851554624.html>（點選日：2011年3月12日）。

¹⁶ Ibid., pp.3-18.

中國」(Rising China) 成為舉世最重要的談論話題¹⁷ (李明, 2006, 75)。

許志嘉指出,基本上,多數美國學者、專家都認為,中共已經在崛起中,「中國威脅論」的看法已在美國引起關注,至於如何因應中共這種崛起態勢,也就出現了「圍堵」(containment)與「交往」(engagement)兩種中國政策觀點¹⁸。于有慧指出,美國國內對於如何維持與中共的關係,一向有「圍堵」與「交流」兩派主張,前者主張中共勢力崛起,勢將造成對區域及全球安全上的威脅,故應在中共未真正強大之前,即予以壓制;惟柯林頓政府主張的是後者,主張與中共交往是基於經濟與戰略的龐大利益¹⁹。言下之意,民主黨仍是以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多多元安全觀作為美中關係互動的基礎。

(二) 美國亞太安全的戰略選擇

1. **延伸威懾**: 奈依 (Joseph S. Nye) 主張保持冷戰遺留下來的雙邊安排為基礎的軍事戰略,保持美國在日本與朝鮮半島的軍力部署。這一戰略隱含了美國戰略家對於日本軍事力量崛起和未來走向的擔憂,他們希望通過保持以前前沿駐軍和雙邊安全同盟為特徵的軍事戰略來牽制日本,並消除一些亞洲國家對日本軍事崛起的恐懼。保留「延伸威懾戰略」同時反應美國政策與學術界一種較有代表性的看法,即美國與日本應在地區事務中發揮不同的作用:美國通過軍事與政治領導為本區提供安全,而日本則向本區國家提供經濟援助²⁰。

2. **接觸平衡**: 這一戰略的主要涵義是,美國整合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以及與日本的特殊關係為基礎,同時發展與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以充分擴大美國作為平衡者的長期靈活性。該戰略的倡導者認為,美國在東亞擁有重大的利益,這些利益可能因為核擴散、軍備競賽、戰爭或是一個封閉的貿易集團而受傷害。當前在亞洲的挑戰是政治與經濟方面的,美國的競爭者是日本、中國與其他較低程度上的其他國家。日本與中國在發展他們的力量,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時可能符合美國的利益,有時可能與美國的利益相抵觸。只有通過保持對本地區的介入,

¹⁷ 李明,「地緣政治與中共對東北亞的外交戰略」,《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略》(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2006年),頁75。

¹⁸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出版,2004年),頁205-206。

¹⁹ 于有慧,「中國的大國外交」,《中國大陸研究》(台北:1999年),42卷第3期,頁45-62。

²⁰ Joseph S. Nye, Jr., "Coping with Japan,"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92/1993, 89, p.98.

華盛頓才能在未來雜亂無章的均勢政治中，握有牽制中國與日本的籌碼與基礎²¹。

3. 多邊主義：這一戰略主張是在亞洲建立新的或調整現存的安全機構，以整合日本和本地區的其他軍事力量。主張這此一戰略的人士認為，日本作為一個巨大的經濟強權將對美國構成挑戰，只有將日本納入一個多邊的安排，否則日本未必願意與美國協調防衛政策，而且有可能在更高的水平上武裝自己，或者試圖限制美國在亞洲的所有形式的參與。一項多邊安排將使得有益地、合法地參與太平洋的安全秩序。這一戰略的可行性在於，一個制度化的多邊架構安排更容易獲得美國人民的支持，因為他要求的是平等的分攤軍事費用。對東京來說，由於這一戰略允許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加強自身的軍事力量，並以一種能為亞洲國家所接受的方式在區域安全與事務中發揮更多的影響力與功能，因此日本也會支持區域多邊安全機制的想法²²。

4. 遠距離平衡：該戰略主張，由於冷戰的終結，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已無必要，美國軍隊應該撤出亞洲，而通過其在西太平洋美國領土與阿拉斯加的軍事存在維繫對亞洲的戰略距離平衡。此一戰略選擇基於對亞洲地區發展較為樂觀的估計，即朝鮮半島的僵對美國而言已不再是嚴重問題；日本缺乏進行任何軍事冒險的興趣，並且已經高度融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對亞洲不再構成威脅；中國因擁有可靠的核威攝而感到安全，在未來 10 年都會致力於經濟發展，不致於成為意圖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國家」；俄羅斯在可預見的將來無法構成需要認真對待的威脅；美國有能力與本地區與未來的盟友合作，對付企圖發動侵略的國家。此外，該戰略還認為，美國應減少其所承擔的海外義務，以集中精力加強美國社會或是經濟等問題；在安全方面，主張奉行「準美國堡壘」的軍事戰略，依賴其海空軍和核力量威懾對手²³。

5. 融合戰略：該戰略主張美國應將其核能力與常規能力保持在足以維持地區安全與威懾的水平，加速亞洲社會主義國家與世界經濟、政治體系的融合的進程，並使美國在經濟與政治上處於未來「太平洋世紀」中的優勢地位²⁴。

²¹ Richard J. Ellings and Edward A. Olsen, "Asian'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1992, 3(2), p.15-17.

²² *Ibid.*, pp.15-17.

²³ *Ibid.*, pp.15-17.

²⁴ 朱崇坤主編，*霸權的歷程—美國軍事戰略冷觀察*（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年），頁 260-261。

(三) 中國國際戰略與安全政策

以現實主義的觀點，國家必須依賴自身力量追求利益；國家利益是國際戰略追求的首要目標，中共學者李少軍認為：「國家利益」是構成國際戰略第一要素²⁵。閻學通也指出：「國家利益」會隨「國家定位」而調整，現階段中共國家利益以「安全利益」為優先，爾後依序為「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文化利益」等三項²⁶。劉靜波則認為 21 世紀中國國家利益可區分為「核心利益」、「關鍵利益」、「重要利益」，而「政治安全、穩定國際環境、主權領土完整」是三個主要的核心利益²⁷。而中共「2008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把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保障國家發展利益和保護人民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努力建設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實現富國和強軍的統一。」現階段中國國防政策的基本內容是：維護國家安全統一，保障國家發展利益。至於事關「發展利益」的「維護國家發展利益，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持續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則列為第二項，上述的分類可視為中共對「國家利益」的官方論述。

中共對外政策一貫強調「和平共處」與「獨立自主」，因此，「大國」定義就是「帝、反、修」²⁸，「大國」一詞在毛澤東時期一直避而不談，直至 1997 年「十五大」之後，中共對外政策有重大改變，並且以「最大發展中國家」、「亞太大國」做為自我定位。國內學者張登及分析中共「大國定位」時提出，中共依其戰略對象與目的的不同，主動調整其「國家定位」，冷戰時期中共自我定位為「人地大國」、「體系大國」、「反大國／挑戰大國」，而現階段則以「體系大國」、「負責任大國」、「反大國／挑戰大國」做為自我定位²⁹。而康紹邦、呂力於探討「國際戰略」時，則以「市場大國」、「文明大國」、「負責任大國」做為中共發展國際戰略的自我認知³⁰；這是中共學者各家說法。中共自己對「大國」的定義不清，正如董立文指出中共的大國究竟是發展中大國、區域大國或是全球的大國？中共自己

²⁵ 李少軍，**國際戰略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8。

²⁶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與影響」，**中國利益總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6），頁 5。

²⁷ 劉靜波，**21 世紀初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6 年），頁 48-53。

²⁸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文化，2003 年），頁 47。

²⁹ 同前註，頁 97。

³⁰ 康紹邦、呂力合著，**國際戰略新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 年），頁 1。

也說不清楚，因此定位不清，造成理論與實務矛盾³¹。

另外，陳啓懋從國際體系角度探討中共國際定位，陳氏認為中共國際定位可分為四階段發展：70年以前是「國際體系反對者」，71-78年中共已成為「國際體系反霸者」，到90年以前，中共又轉變為「國際體系參與者」，911事件之後中共又轉變為「國際體系參與者、維護者與建設者」³²，蔡拓分析：「21世紀的國際關係進一步凸顯著全球政治，無論人們自覺與否，接受與否，人類這個新主體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共同利益、共同價值都日益尖銳、突出，逐漸走進國際關係的中心議程。理性的審視這一進程與趨勢，積極協調全球政治、世界政治與傳統國際政治的關係，才是明智之舉。」³³，從分析中可以發現：中共國際定位認知與國際戰略發展有密不可分關係，國際定位決定中共國際戰略走向，而國際定位則又導因於「國家利益」的驅使，因此，中共對「國際定位」的調整，追根溯源仍是追求「國家利益」。

胡鞍鋼提出國際戰略發展「增長、強國、富民、提高國際競爭力」四大目標³⁴，並且認為必須「以實力為本，接觸與抗爭並重，維護、擴大和推進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以塑造出對我有利的國際戰略環境」³⁵，胡氏並歸納出：「富民強國」是中共歷代領導人的戰略目標³⁶。針對國際戰略發展部分，中共學者門洪華也指出：中共國際戰略變革主要受到「國際地位的認知」、「國際局勢轉變」與「國家主權利益」等因素影響³⁷，在「單極為主多邊體系」的國際政治、經濟局勢，中共體會到與強權共處、合作的必然性及政治鬥爭長期性的前提下，中共國際戰略呈現出「合作安全的實質性變化」、「融入國際擴展利益的外向轉變」、「加強地緣政治與經濟控制力」、「形塑世界大國地位」等四種發展趨勢³⁸，尤其作者於「形塑世界大國地位」一項中，特別強調「柔性權力」的提升，重視「柔性權力」的塑造與運用，此點與中共國際戰略發展特重視文化與文明有關。

³¹ 董立文，「論中共的大國定義及其問題」，*中山人文社會學期刊*（台北：1998年），第6卷第2期，頁65-76。

³² 陳啓懋，「國際體系和中國國際定位的歷史變化」，*國際問題研究*，2006年第6期，頁36-37。

³³ 蔡拓，「當代中國國際定位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人民網*，2010年5月8日。

³⁴ 胡鞍鋼，*中國大戰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8。

³⁵ 同前註，頁112。

³⁶ 同前註，頁3。

³⁷ 門洪華，*建構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05-206。

³⁸ 同前註，頁208-210。

(四) 安全研究與安全觀

鄭端耀認為，新安全觀的特點有三：首先、國家安全已非一國之力可單獨維護，而且軍事力量非可靠憑藉。其次、國家安全非單一固定化含義，而是具有多元性內涵，同時安全感的認知與需求，可能較具體安全措施更重要。最後、國家安全應建立在互動、互利、和互信的基礎上，而且唯有如此，安全空間才得以增長，和平較能持續³⁹。此外、國家安全與國際或區域安全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國際成員應經由開放合作方式、包容共存原則和共同參與過程，來面對安全威脅的挑戰，共謀解決之道。

就探討 21 世紀國際關係學科係以國家權力和安全觀為議題而言，張亞中、孫國祥認為，長期以來，在西方學術界存在關於國際安全理論探索有兩點基本看法：(一)國際關係領域有著關於安全研究的理論分析傳統。(二)安全理論問題不會消失，其重要性將與日俱增。而就現實主義及傳統安全觀而言，安全是人類社會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首要條件，也是國際關係理論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就國際關係而言，安全不啻即為國家安全⁴⁰。

金威則認為，和平與安全問題一直是國際關係理論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伴隨著國際關係現實的發展變化，國際關係理論從古典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發展到今天眾多理論的百家爭鳴，這也引起了安全觀的演變。將安全觀變化的探究，置於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框架內，有助於把握安全觀演進的外部原因及不同安全觀的理論依據，從而為冷戰後更進一步探討安全理論提供一個廣闊的視角⁴¹。

換言之，軍事力量係影響國家安全的最主要因素，於是傳統的國家安全就是軍事安全，是一場「零和遊戲」。Robert Jervis 認為，一國的安全意味著另一國的不安全，他國的安全之日就是自己的不安全之時。國家尋求自我保護、鞏固

³⁹ 鄭端耀，「新型安全觀與兩岸關係」，**社會建構論與兩岸關係：理論與實踐的對話**（台北：當代思潮系列座談，政大國關中心主辦，2001 年）。

⁴⁰ 張亞中、孫國祥，「亞太綜合安全：台灣安身立命之所基」，**亞太綜合安全年報**（台北：2002 年），頁 3。

⁴¹ 金威，「從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看安全觀的變化」，**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0 年第 4 期，頁 10。

和促進安全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手段就是最大限度地擴大自我軍事力量，以對付潛在和外來的軍事威脅。由於片面強調以軍事實力追求國家安全，當一國發展軍備，即使是防禦性的，也會被其對手視為威脅，從而不得不作出發展軍備的相同反應。如此反覆只會造成對雙方乃至整個國際政治環境的更不安全，這就使有關國家處於一種「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⁴²。

中共認為後冷戰的國家安全問題，應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與爭端，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嚇，以對話協商促進建立相互瞭解和信任，通過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⁴³另外，確立以經濟安全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即以綜合安全為內涵、合作安全為手段)，配合多種措施(包含睦鄰外交與加入國際組織)，期藉以擴大共同利益、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增強經濟合作，以謀求未來具體的國家安全⁴⁴。

	傳統的安全觀	中共的新安全觀
安全威脅來源的認知	軍事實力	動機
維護國家安全的途徑	加入軍事同盟	增加信任、共同利益的聯繫 (合作安全)
國家安全的目標	國家生存(追求霸權)	國際和平(共同安全)
安全的內容	軍事	政治、經濟、軍事(綜合安全)
安全的核心議題	軍事實力	互利、互信、平等、合作
安全的概念	絕對安全 (追求國家安全)	相對安全 (國際安全與國家安全是互通的)

資料來源：閻學通，*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天津人民，2000年)，頁101-103；吳英明、林麗香，*全球化與中國新安全觀*，*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2卷3期

⁴²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3.

⁴³ 〈中俄關於世界多及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1997年4月24日，版1。

⁴⁴ 王勇，「論中國的新安全觀」，*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1期，頁42-45；高桓，*多極化世界需要樹立新安全觀*，*國際政治與安全*，2000年第11期，頁22-27。

(2000年3月)，頁15；作者編製。

在安全內容方面，王逸舟主張綜合安全，將安全的認識從傳統的軍事領域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非軍事領域，範圍亦從國家延伸至整個國際社會。未來將遇到的安全問題不再侷限於軍事層面，新的問題如經濟安全、資訊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跨國犯罪與安全、核擴散與安全、民族主義與安全、移民安全、社會矛盾與安全等等將逐漸浮現而更應注視。安全利益範圍不再是只有國家，還包括個人利益、團體利益以及全球利益⁴⁵。

總的來說，中共自認為是依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充分吸收世界各國新的安全觀念、理論、思想和政策主張，而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安全觀」，其主要特點為⁴⁶：

第一、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維護國際安全的基本原則，以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為根本目標。

第二、強調安全必須平等，各國不分大小一律享有平等的安全權利，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把本國的安全建立在威脅和損害別國安全的基礎上。

第三、主張安全是綜合的，包括兩方面：一是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等的有機組合，二是綜合使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外交、宣傳等各種手段維護國際和國內安全。

第四、強調安全必須是全球的，各國的安全相互影響，各個地區的安全是構成全球安全的有機組成部分

。

第五、主張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保障國際和平與安全。

⁴⁵ 王逸舟，「論綜合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1998年第4期，頁23-26。

⁴⁶ 楚樹龍、彭春艷，「冷戰後國際安全理論的發展」，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第4期，頁13；薩本望，「我國安全觀的變化及新的普遍安全觀的主要特點」，和平與發展，2000年第1期，頁5-9。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一、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研究方法 (method) 是幫助研究者選擇有效的執行工具，來獲取研究所需的資料，從中得到所欲求的結論，換句話說，研究方法是指蒐集和處理資料的技術和進行的程序⁴⁷。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是交代了探知研究客體方法，或者更具體地說，是交代研究資料的來源與對資料進行分析的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將採用文獻分析法 (Documental Analysis)，來進行本文之研究。為了方便本文研究議題的相關內容，並對「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台海政策進行深入分析，必須透過各種既存史實資料、官方文件、學術著作、政策報告作為研究基礎，進行對政策面向運之現實與真相，加以整理、分析與批判；亦即經由文獻分析及蒐集對研究相關之文本，針對主題有關之記載加以比對分析，以求對事實的接近，並閱讀多方文獻以維持學術研究中立與客觀。

(二) 歷史研究法

以歷史資料來陳述分析適時演變的因果關係，發覺某特定時空所發生的事實，瞭解其前因後果的關連性，重建演進規律並作有效預測；亦即是採用歷史研究法瞭解政治現象的背景與其變化軌跡之發展，對研究主題的政治、安全、經濟等歷史面象建立「整體性」關連解釋。經由歷史研究途徑瞭解其主要內涵及變遷，對其研究對象有所掌握後，方能對未來發展之趨勢作出合理預測。

歷史研究法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曾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在行為研究法、數量研究法興起後，逐漸失去主導地位，但是其重要性仍無法取代⁴⁸。

⁴⁷ 朱宏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年），頁25-28。

⁴⁸ Robert Jones Shafer, 趙干城、鮑世奮譯（1996），史學方法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頁33。

二、研究途徑

(一) 結構現實主義

古典現實主義 (classical realism) 是國際政治的主流，其基本假設有三：第一、國家中心。國家是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行動者、角色與研究對象，其他角色如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則居於次要地位。第二、理性抉擇。國際政治的研究建立在國家有如一個理性決策者的假設上。即是在狀況不定、資訊不足的情形下，國家仍會謹慎評估各種選擇的成本。第三、權力至上。國家以追求權力最大化為目標，國際社會的本質是無政府狀態，缺乏中央權威強制協議的執行以及保證安全，因此國家必須依靠自己力量維護其利益⁴⁹。

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和論點，到了二十世紀 70 年代受到了挑戰，特別是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爭論，此為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的爭辯⁵⁰。造成這次爭辯主要的原因在於：70 年代國際社會中非國家行為體的興起，美蘇的相對衰弱，國際多極化趨勢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換言之，新的國際局勢使得古典現實主義的分析能力受到質疑；在此同時，國際關係學術領域因為研究方法的創新，因而引發了此次辯論⁵¹。1979 年華茲 (Kenneth N. Waltz) 在其著作《國際政治理論》(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正式提出「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 的論述，作為古典現實主義的修正與補充。華茲利用國際體系和權力分配的架構，將古典現實主義國家、權力和利益的中心概念納入其中，並藉著國際權力分配的型態，作為分析國家對外行為的基礎。結構現實主義雖與古典現實主義同樣重視權力，但更強調權力的工具性，用以達到國家安全的目標。國際體系的基本要素包含系統的基本單元與系統本身的結構。一般而言，結構現實主義有以下假設。

⁴⁹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78), pp.1-3.

⁵⁰ 多數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皆認為國際關係歷經了三次大辯論，第一次是在 1930-40 年代「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爭辯；第二次是在 1950-60 年代「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的爭辯；第三次則是 19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間的「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爭辯；即「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辯。

⁵¹ 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研究的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2 期，頁 65-89。

1. **體系結構**：華茲認為一個體系包括兩個變量，其一是結構、其二是單位⁵²。國際體系以自身力量的權力決定在體系中的排列。而在國際體系中，結構是由每單元（國家）所組成，在形式上每一國家都具主權平等的權力，也不需服從其他國家的安排，整個國際體系呈現出分散與無政府的狀態，而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結構是根據單元之間的能力的分配來界定的。能力分配則屬於權力分配形式，權力分配的變化會直接導致體系結構的變化。

2. **體系結構與行動體的互動關係**：華茲認為有關體系結構構成的三要素，包括（1）國際體系是無政府而非等級的（2）國際體系是由功能相同的國家行為與互動構成的（3）國際體系的變化是體系內力量分佈不同所引起的⁵³。他認為前兩項是不變的，而第三項則是處在變化之中，因為無政府的國際狀態中，國家不論大小，所考量的都是以國家安全與絕對主權為主。換言之，體系結構不是一個靜態的結構，而是動態式的，結構可以改變行為體的行為，並且可以改變行為體之間的互動結果。

3. **權力與安全觀**：古典現實主義將國家追求權力視為手段與目的，但華茲認為國家最終目的是要藉權力獲得安全，權力僅是國家追求安全的一種手段。此外，他也賦予權力新的概念與功能。他認為在體系中大小排列形成結構，權力的變化引起結構的變化，權力在國家的分配及分配的變化有助於結構的形成和對結構的變化。

4. **均勢理論**：華茲認為均勢理論是結構現實主義重要組成的部分，他甚至認為兩極體系下的權力分配，是最有助國際體系的平衡與穩定⁵⁴。換言之，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國家不是謀求權力的最大化，而是尋求權力的平衡分配，而權力只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所以均勢理論其實質意義在尋求大國間實力平衡的分配關係。

⁵² Waltz, Kenneth N. 著 (1997)、胡祖慶譯，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圖書），頁 121~123

⁵³ Kenneth N. Waltz 著，胡祖慶譯，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圖書，1997 年），頁 121~123。

⁵⁴ Ibid., pp.161-170.

(二) 霸權穩定論

「霸權穩定論」理論於1973首先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所提出，而其正式名稱則出自國際政治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金德爾伯格將經濟學中有關於「公共財」的概念應用在國際關係中有關霸權國家之所以存在，以及為何存在作出了解釋以及說明⁵⁵。所謂「公共財」在經濟學中意指這種商品是一般人在消費此種商品時，並不會減少其他消費者獲得這個商品的數量，例如道路、路燈、人行道等等，但是由於免費的消費者太多，所以必須有一個機構負責提供這樣的公共財或是強迫消費者付費以維持公共財的提供；而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的所謂公共財，所指涉的意義就是一種可以保證貨物資本可以自由流通的一些制度，比如開放的國際貿易制度，或是穩定的國際貨幣等等。而這種制度，顯然的必須有國際上的擁有強大經貿實力的國家負責維持這些制度，這樣的國家就是金德爾伯格所意指的「霸權國」。

這個霸權國負責維持制定有效的「國際經濟建制」（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全球性的經濟混亂，而保持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金德爾伯格認為霸權國的責任在於提供領導，而非支配的慾望，這樣的說法與依賴理論中所批判的霸權國家有很大的不同；而基歐漢給予霸權穩定論的定義中則認為，國際體系中主要國家的國家權力資源的改變將會影響到整個國際建制的改變；換句話說，基歐漢認為對於國際建制的最有利情況乃是由一個單一的、穩定的霸權國，提出可為國際廣泛接受並易於遵守的規則，所以霸權的衰退則意味著國際建制的衰微與混亂。霸權穩定論基於現實主義的基礎，強調國際政治結構與大國權力分配是國際政治分析的依據。國際之間的無最高政府狀態並不意味著混亂，它將管理國內經濟體制的結構概念應用於國際政治之中，而具備階層式的分佈。霸權尋求維繫其霸主的地位，但是手段則帶有著自由主義的色彩。如果一旦主要的霸權國家衰微，那麼國際之間就會因爭奪霸權國的領導地位而互相爭鬥，直到出現新的霸權國為止。簡單地說，就是霸權國的穩定為國際政治經濟系統提供了穩定，政治與經濟互相影響依存。

⁵⁵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June 1981), pp. 242-259

霸權國為何提供這些公共財呢？基於傳統現實主義的觀點，顯然是因為成為霸權國有利可圖，而非是無私的奉獻或純粹為了維持威望。對於國際結構而言，權力較大的國家對於體系的影響以及制約的力量都較弱小的國家為大；甚至就國際體系的規則制定而言，霸權國家都享有相當程度的發言權。因此霸權國家理所當然地會制定對於其國家利益有利的國際互動規則，霸權國家的利益受到最大的保障；再加上霸權國家擁有最先進的科技以及生產技術，因此維持自由開放的國際經貿體系秩序，自然對於霸權國家是最為有利的。基於這樣的前提，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與霸權國家的國家利益休戚與共，霸權國家當然要維持其霸權態勢，防止一切可能會導致霸權衰退的不利因素產生。

第四節 研究範圍限制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範圍

就「時間」而論，本文的觀察時間分成「長時段」與「短時段」兩個時間序列；長時段的背景是以在 90 年代蘇聯瓦解，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格局形成，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作為基礎，有助於針對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美國對外政策、亞太區域政策、美中關係進行整體性、宏觀性與系統性的觀察。短時段的時間則為 2002 年胡錦濤掌權，跨越了美國總統小布希與歐巴馬時期的外交政策（2002-2011）。

就「空間」而論，本文設定的空間背景是建立在結構現實主義的多層次上，即將中美安全關係議題置於「全球體系」、「區域」、「三邊互動」等三個層次。嘗試在結構的制約下（大國塑造全球與區域的結構、格局），探討政策產出與空間之間的關連性。

二、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大抵來說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是理論的限制，第二是研究條件的限制。在理論限制的部分，本文的研究以結構現實主義與霸權穩定論

作為基礎。這些理論在宏觀的國際政治之分析與預測有其一定的效果，然而，當面對變動不羈的國際情勢，特別是運用到複雜的中美關係變化時，也有其解釋能力上的不足。

以結構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來說，主要是強調「結構」(structure)對國家行為的影響，並將重點放在體系角色之間的權力分配，特別是大國之間的權力分布情形。若掌握了大國權力分布的狀態，就掌握了國際結構的圖像，也就能夠運用這樣的圖像來分析所有國家間的互動過程，以及預測國家間互動的可能發展；然而，其前提必須以一段較長的時間作為其觀察的單位，方能產生一定的解釋效果。霸權穩定論則假設了國際結構的圖像，是個權力集中於單一霸權國的狀態，這樣的狀態不僅有利於霸權國的利益，更有利於其他非霸權國利益，以及整體國際體系的穩定；同時，霸權國擁有各方面強大的影響力。若其假設為真，則單一「霸權國」是否實際存在，以及其存在是否真有助於體系穩定，就需受實證經驗的挑戰。

本文的研究在時間上的範圍，是鎖定在 2002 年至 2010 年中美安全議題的互動，但這樣的一個時間單位是否足以讓結構現實主義的論點，發揮其有效的解釋能力，可能會成為本文研究上的限制。再者，從蘇聯瓦解之後國際結構開始產生巨大的變遷，這樣的變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單一霸權的存在與否，或者此以霸權國的行為動機和行為方式，是否如同霸權穩定所言，成為國際秩序的穩定器；而霸權國的影響能力以及意願，是否削弱了「霸權穩定」的本意，這種理論與實際的不一致部分，可能會成為本文研究上的限制。

就資料而言，若要探知中國與美國官方政策的真實意圖有其操作上的困難，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透過文獻的整理去發掘事實與政策發展的脈絡，並重新建構一個事件發展的歷史進程，以期形成研究分析的逼真性。

第二章 後冷戰中美安全關係之發展

第一節 理論的觀點：中美安全互動的意義

一、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合作

安全合作的目的是在於增進相互安全。在國際政治中，安全合作是可能的嗎？國家間如何進行安全合作？國際機制在安全合作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對於這些問題，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有不同的解讀。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關係的基本特徵，由於缺乏有效的中央權威，國家只能在「利益極大化」與「自保」的基礎上進自己的利益，因此安全合作是困難的。但是結構現實主義並不完全否認合作。為更進一步闡明結構現實主義對安全合作的理解，吾人有必要區分防禦性現實主義和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內容及其差異。⁵⁶

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幾乎不承認安全困境的存在，否認共同安全的可能，認為國家應該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安全。最大化、對相對收益的關注使得合作極其困難。由於欺騙的存在和難以判斷，國家普遍採取競爭性安全政策。因此，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合作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稀少的。⁵⁷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認為國際建制是邊緣力量，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最小。

防禦性現實主義認為安全困境的存在和螺旋上升，容易引發國家間的衝突。國家應該追求防禦性的政策、保持克制。國家除了武力和結盟外，還可以通過安全合作追求安全，並強調合作性政策是國家自助的重要形式。但防禦性現實主義者並不認為機制在安全合作中必然扮演關鍵作用。國際建制是國家利益和國際體系約束的產品，而國家利益和國際體系的約束影響國家間是否合作。國際

⁵⁶ 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 1, 1999, pp. 42-63.

⁵⁷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2002, pp. 149-173.

建制本身並沒有太多的解釋力。⁵⁸雖然建制足以實現某種程度的合作，但這種合作是脆弱的，除非行為體的想法和對利益的界定發生改變，否則世界依然充滿動盪。

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由於國際社會缺乏中央政府執行規則，國際建制的虛弱、欺騙和背叛無所不在，因此合作是困難的。但是世界政治並不等於戰爭狀態，在不同的問題和不同的時間架構內，不同程度地存在合作。而複合相互依賴的加深，安全合作提供了基礎和條件。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建制在合作中的作用，認為國際機制的作用主要表現在：（1）降低交易成本；（2）延長對未來的預期（The shadow of the future）；⁵⁹（3）增加可獲取的資訊的數量。

新自由主義認為建立機制能增進安全，機制並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有獨立的影響力和生命力。各國應該通過建立安全機制來尋求安全，這些多邊安全合作組織一旦建立，就會對各國的行為產生約束。即使在霸權國家衰落後，多邊合作組織也能夠維持國家間的合作並提供。⁶⁰

建構主義者認為國家間關係是一種社會建構，強調規範和認同對行為體的利益界定和行為選擇的影響。建構主義認為外交政策認同和國家利益是內在於國際體系的主體間相互建構的結果，而用以界定認同和利益結構的主體間的知識，則成為對行為體的內在制約。⁶¹國家間發生衝突可以通過國家間衝突的認同加以解釋。國家間在相互交往中可以構建「敵人」或「朋友」等不同的認同，從而影響行為體的行為。如果行為體之間形成相同的認同，則較為容易達成諒解與合作；如果行為體形成敵人或對手的認同，在現實中這一認同容易由想像變為現實，合作難以達成，衝突可能出現。建構主義者把合作視為一個社會學習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行為體通過社會互動產生對現實的共有理解，重新界定利益，甚至可能發展成集體認同，從而緩解安全困境。⁶²

⁵⁸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3, 1994/ 1995, pp. 83-85.

⁵⁹ "The shadow of the future" 是指國家在合作中的行為會影響別國在下次合作中對該國的判斷。因此，為謀求他國的合作，國家會謹慎地對待合作。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38, pp. 226-254.

⁶⁰ 唐世平，*塑造中國的理想安全環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12~18。

⁶¹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

⁶²

總體而言，國際政治的三大理論流派對安全合作有不同的解釋。總體上看，結構現實主義對安全合作的態度、機制的作用等問題的看法不如新自由主義樂觀。新自由主義認為機制能改變行為體對結果的偏好，從而使合作得以延續。而結構現實主義認為機制只不過是權術，是國家利益的反映。建構主義則強調物質結構之外的主體間知識、社會建構和觀念、認同的作用。進攻性現實主義為國際安全合作留下的空間最小。

二、中美安全政策與議題理論基礎：霸權穩定論與新安全觀

(一) 霸權穩定論的基本意義

「霸權穩定論」是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之一。冷戰結束後，該理論在國際安全領域有非常廣泛的影響。它最初由金德爾伯格（C.P. Kindleberger）於 20 世紀 70 年代率先在經濟領域裡提出。⁶³他認為霸權體系的存在對穩定世界經濟至關重要。80 年代，該理論被吉爾平（R Gilpin）等人應用於國際安全領域。其主要觀點是：霸權體系不僅有利於世界經濟的穩定，而且有助於國際政治格局的穩定。隨著當時批判理論的興起，霸權穩定論也受到了挑戰。但具有以下四種的意義：⁶⁴

1. 霸權帶來穩定：所謂霸權國，是指軍事、政治、經濟及自然資源等諸方面實力遠遠超過其他國家，能夠強行推行並在一定時期實現其意志的大國。而霸權體系則是指霸權國領導和統治的體系。霸權國的存在與國際體系的穩定之間存在正向關係，正如基歐漢所說：「由一個霸權國主宰的霸權結構非常有益於強大的國際體系的發展，一個體系的運行規則比較明確，霸權國既能夠也願意建立和維持自由經濟秩序的規章和條例，自由國際體系因此能夠獲得充分的發展。」⁶⁵

「能夠」是指實力，「願意」即霸權國恪守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並願意為國際體系穩定承擔相應的責任。

⁶³ Charles.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⁶⁴ 孫曉玲，「霸權穩定論」與中國新安全觀：一種比較視角，*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 年第 2 期，頁 53。

⁶⁵ 吉爾平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 年），頁 87~88。

2. 霸權提供公共商品：為什麼國際體系的穩定需要霸權呢？為論證其中的原委，「霸權穩定論」引進了經濟學中關於「公共財」的概念。在國內社會，公路、人行道、燈塔等這類公共物對於維護開放經濟非常重要。但是由於個人可以免費消費它們，公共財經常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行為主體願意為這種產品承擔更大的份額或者有某種權威機構迫使消費者為它們付費。對於開放的國際社會而言也是如此，國際社會需要穩定的貨幣體系、自由的貿易體系、有組織的國際安全體系等，所有這些，在國際社會缺乏公共權威的現實下，只有霸權國才有實力、有意願去提供，並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搭便車」現象。霸權國為承擔公共商品而提供成本，做出了自我犧牲，卻為世界帶來了穩定。⁶⁶

3. 霸權衰弱：根據吉爾平的論述，由於三個層次的原因霸權必衰。一是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經濟力量的分配格局必然會被新的霸主所打破。二是從受益角度看，根據邊際效益遞減規律，霸權國為維持霸權而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與從中獲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當霸權國國內消費和為保護這種體制而付出的防務開支比國民儲蓄和生產性投資增長更快時，霸權國在經濟上將喪失提供公共商品成本的能力，從而不得不放棄霸主的地位。三是從對「搭便車」的後果及道德影響上分析，「搭便車」者一方面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負擔，削弱了霸權國的實力，另一方面又從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權國失去為國際社會提供自由經濟體制的意願。⁶⁷

4. 霸權衰弱並非不可挽救。吉爾平認為建立新體系的成本比維持體系的成本要高，這使得舊國際體系的慣性時間會非常長，霸主國的作用不僅僅在於該體系的日常運作，而且在於控制住危機局面。因此，美國要維持霸權必須未雨綢繆，只要措施得當，霸權的衰弱就會被遏制。為此，霸權國可以採用削減成本、減少國際承諾、多邊領導等手段來延緩霸權的衰弱。而霸權穩定論的完善者基歐漢則非常強調國際建制的作用，因為相對於建立新的霸權機制，霸權國建立的機制可以通過一些共同的安排，建立起關於國家行為的關鍵預期，可以改變相對的交易成本，使各國談判的追加成本更加低廉。國際機制使協商後的合作成為可能，

⁶⁶ Charles.P.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2 (June 1981), pp.242-259

⁶⁷ 樊勇明，「霸權穩定論的理論與政策」，*現代國際關係*，2000年第9期，頁20~21。

建立在霸權基礎上的世界秩序因此得以穩定。⁶⁸

（二）新安全觀的基本意義

「新安全觀」則構成了其後冷戰時期戰略安全思維的主軸。中共「新安全觀」的提出，是在北約東擴，美、日「安全合作新指標」及美國介入台海危機等背景下，中、俄等五國首腦聚集上海，討論邊境地區軍事互信問題，這是中共考慮新型安全問題的發端⁶⁹。繼之中共於1996年7月20日在東協外長會議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的安全觀念」，1997年4月23日江澤民在俄羅斯發表「『中』俄關係與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中，首度宣示「新安全觀」政策，認為必須棄「冷戰思維」，反對集團政治，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與爭端，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以對話協商促進相互瞭解和信任，通過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⁷⁰。同日江澤民在俄羅斯杜馬發表的演講中，向全世界闡明了中共關於維護國際安全的基本主張，即各國有權根據本國國情，獨立自主的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各國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

深入而言，對於安全觀 闡述得最詳細、最系統的是在2002年東協區論協壇外長級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向大會提交的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具體主張如下：⁷¹

1. 安全的含義具有綜合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安全的內涵由軍事、政治領域擴展到了經濟、科技、環境、文化等諸多領域，一種安全的維持與獲得需要其他安全的支撐。
2. 安全的手段是多樣性的。武力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爭端與矛盾，以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為基礎的安全觀念和體制難以營造持久和平。尋找安全

⁶⁸ 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和等譯，**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08~113。

⁶⁹ 張文木，「中共國家安全哲學」，**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1期，頁24。

⁷⁰ 人民日報，「江澤民在杜尚別出席「上海五國」元首會晤時的講話」2000年7月5日。第1版

⁷¹ 人民日報，中國向東盟論壇提交新安全觀立場—，2002年8月2日，第3版。

的手段趨向多樣化，加強對話與合作成為尋求共同安全的重途徑。

3. 安全的內容具有平等互利性。新安全觀認為安全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異同，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心態，互不猜疑、互不敵視。各國應該經常就各自安全防務政策以及重大行動展開對話與相互通報。互利是指順應全球化時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互相尊重對方的安全利益，在實現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時，為對方安全創造條件，實現共同安全。
4. 合作的模式具有靈活性。靈活性包括具有較強約束力的多邊安全機制、具有論壇性質的多邊安全對話、旨在增進信任的雙邊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學術性質的非官方安全對話等。促進經濟利益的融合，也是維護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

第二節 後冷戰初期的美中關係：美國觀點

一、從冷戰到後冷戰

對美國來說，中國關係的進展主要依賴兩個因素，一是國際環境的需要，二是國內的共識。前者是變動的，後者是缺乏共識，所以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基本上是不穩定的⁷²。事實上，美國對華政策長期以來在「圍堵」及「接觸」兩條路線搖擺不定，端賴當時美國對自身利益的界定及考量。回顧歷史情勢，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於美國如何看待共產主義及因應對抗的思維有關，在美國的認知中，中國不同於蘇聯這個「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狂熱及舊沙皇擴張主義」混合體的國家⁷³，而對中國保持一定程度的善意⁷⁴。然而中國對美國的善意並不領情，50年代的韓戰象徵著美國「聯中制俄」的策略失敗，使得美國將同是共產主義意識

⁷² 關中，「十年必辯，十年必變：五十年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折」（國政研究報告，民國91年4月1日）

⁷³ 美國前駐蘇聯外交官肯南（G.Kennan）在其1946年2月所提出之著名的「長電報」中所提出的觀點。

⁷⁴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卿 Acheson 再將國共內戰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國民政府的政策白皮書中，表達一個理念，亦即中國博大的文明及民主的個人主義將為中國推離外國的桎梏。

型態的中蘇視為一體，採取圍堵或遏制的策略。直至 1970 年代，美中在共同的戰略目的：對抗蘇聯的情況下，逐步尋求接觸。但美國在拉攏或與中國交往的思考中並未有「以交往促使改變」的信念，純粹只是現實主義戰略的考量。1979 年中美建交後，中國也在鄧小平主導下進行改革開放，美方逐漸認知到雙方之間雖有歧見存在，但仍彼此相互需要，其已不同於前述那種純粹屬於現實主義般的「戰略」考量。

80 年代初，美國的對華政策是以中國學者所稱的「新現實主義」為基礎。雙方關係由初始的戰略關係到 80 年代初起的長期、持久的建設性關係。這種關係意謂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交往，但也隱含著兩國之間仍有許多仍待解決的「非建設性」事務需要處理，例如台灣問題、西藏問題、中共軍售等。1983 年美中停止使用「戰略關係」一詞，兩國在現實的基礎上積極交往。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兩國關係也加速進展⁷⁵。迄至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以及 1990 年的東德政權的垮台，以及 91 年蘇聯的瓦解，使美國再次思考如何看待中國。華府必須面對的課題是，要與中國和平共存，還是也要將中國政權轉化；中國的崛起是否影響到美國的領導利益，中國是否會在蘇聯瓦解後成為另一新興的霸權。對理想主義者而言，中國可以是下一個投射的目標，對現實主義者而言，中國也可以是下一個在國際情勢中合縱連橫的對象。前述的天安門事件及蘇聯的瓦解使得美國對中共角色的認知有了變化，圍堵中國的思維開始出現。美國的理想主義開始介入對華政策的思考，現實主義者也開始重新評估對中國地位的看法。兩者在中國事務上有交集有歧見，在「交往」或「圍堵」上也有了觀念的差異。

就宏觀面而言，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選擇傾向於「交往政策」，其以「合作促使安全」為主，而較沒有冷戰期間歐洲國家面對蘇聯時的「交往」有「和平演變」的意涵在內，但隨著「美國第一」、「美國價值觀」等思想的形成。後來在政策上的指涉上，「交往」開始有了「促變」的意涵⁷⁶。在這種整體外交戰略

⁷⁵ 兩國高層互訪頻繁，1984 年中國總理趙紫陽返訪美，同年 4 月，雷根總統訪問北京並與鄧小平會晤。1985 年 7 月，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訪美，同年 10 月，副總統布希訪問中國。在經濟合作及文化交流方面，1985 年美國已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而雙方人員往來頻繁，中國已成為向美國派出留學生最多的國家。另外隨著兩國軍是領導人的互訪，雙邊的軍事合作項目也逐漸擴大。

⁷⁶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伙伴**（台北：揚智出版社，1999 年）頁 79

架構，以及圍堵中國一直並非對華政策的主流思潮的影響下，即使老布希總統被迫在 89 年天安門事件後，宣布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但仍反對「孤立中國」。布希認為孤立政策是危險的，強調應以「繼續保持交往」作為對華政策的主軸，支持中國改革開放。整體而言，美國在冷戰後對中國的「交往政策」有其雙面性，此與 1983 年起美國開始發展與中國「建設性」關係時僅有「互利」的合作互動有所不同，「全面交往」政策本身有積極的「利益均沾」互動，也有促使中國「和平演變」的內涵。換言之，「全面交往」政策本身涵蓋「合作、遏制、促變」的意涵。

二、老布希時期

布希政府的亞太與對華戰略一方面要求維持權力平衡，另一方面要求將亞太國家整合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共同體 (a community of market democracies)。該戰略的特點有下。首先，美國雖然裁減亞太駐軍，但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承諾不變；其次，美國仍以雙邊安全的關係為重，而不支持多邊區的安排；再者，美國的政策是「經濟整合而防衛分歧」(Integration in Economics, Diversity in Defense)；最後，美國的角色是維持區域的動態平衡⁷⁷。布希政府的亞太戰略充分反應亞太助卿索羅門 (Richard Solomon) 的「平衡車輪」(the Balancing Wheel) 觀點、國務卿貝克的「扇形架構」(the Fan Framework) 說，以及布希政府的亞太戰略架構報告。

同年 10 月 30 日，他在聖地牙哥分校的演說中，提出「經濟整合、防衛分歧」的亞太安全戰略⁷⁸。他指出，亞太地區經濟成長的力量已導致區域的經濟整合，而亞太經合會 (APEC) 將來會發展為亞太地區以市場經濟取向為共同目的的多邊機制。然而，在安全方面，他強調亞太地區與歐洲不同，威脅來源不只一端，致各國對威脅的認知分歧，因此，未來不宜以區域性防衛組織解決問題，而應依賴美國與亞太國家所建立的雙邊安全關係。他認為，亞太地區應該區分為東北亞、東南亞及南太平洋三個區域安全區；而每一安全區的問題及參與國皆各不相同。亞太地區的安全問題如果需要多邊機構解決，聯合國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

⁷⁷ Martin L. Lasater, *The New Pacific Community: U.S Strategy Options in Asian*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1996), pp.12-13.-

⁷⁸ Richard H. Solomon, "Asian Security in the 1990s: Integration in Economics, Diversity in Defense," *Dispatch*, Vol,1 No.13(Nov.5,1990), pp.243-248.

貝克於 1991 年 11 月 11 日在日本東京發表演說，提出「扇形架構」觀點⁷⁹。貝克說明美國的亞太戰略與亞太國家的交往政策。他強調美國必須與亞太與歐洲國家保持交往，方可成功建立新的國際體系。他首先指出，面對亞太的新局勢，一個繁榮而安定的太平洋共同體（a Pacific Community）的建立，端賴三大支柱：及經濟整合的架構、民主化趨勢的獎勵、以及防衛結構的界定。他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視為市場的開放及阻止與美國合美國友邦敵對的國家或國家集團稱霸。亞太地區已是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美國與亞太地區的雙邊貿易已超過與大西洋地區的雙邊貿易總和，超過比例已達三分之一。戰後以美國為核心的雙邊同盟關係促成東亞的安定與繁榮。美國的駐軍與安全承諾形成一個非正式但卻非常有效的「平衡車輪」。

他將美國與亞太地區的交往比喻成為一把打開的摺扇，底部在北美洲，西向越過太平洋。摺扇的核心扇骨是美日同盟，向北延伸是美韓同盟，而向南延伸是美國與泰、菲、澳等國的同盟，連接各扇骨則是共享的經貿利益，亞太經合會即是反映該等利益的組合。貝克認為，美國與亞太國家的雙邊安全條約關係以及前置部署軍力仍是亞洲安全結構的基礎。冷戰的終結，導致美國及友邦的力量增強，但亦對安全帶來新的挑戰，使得美軍的結構、防衛活動以及維持區域安定的手段皆須加以調整。惟因亞太國家對安全威脅的認知不一致，難以成立類似歐洲的多邊安全組織⁸⁰。美國雖對亦對亞太地區出現的多邊安全機制的可能性加以注意，但是認為尚不宜建立正式的多邊安全組織。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角色，亦由圍堵蘇聯轉為地緣政治上的平衡者、公正的介入者，以及不確定威脅的防阻者。換言之，美國的戰略由圍堵轉為維持權力平衡。

布希政府認為冷戰的結束對亞太地區安全的影響不大，因此在 1990 年 4 月提出為「亞太邊緣地區的戰略架構：展望 21 世紀」（A Strategy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的報告（簡稱亞太戰略架構報告）中，維持美國冷戰時期亞太戰略的基本內涵。美國的前置駐軍、海外基地、

⁷⁹ Secretary Baker, "The US and Japan: Global Partners in a Pacific Community," Dispatch, Vol.1.2, NO.13 (Nov.5, 1990), pp.841-846.

⁸⁰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出版，1999 年）頁 44。

雙邊安全協定、嚇阻侵略與維護美國利益，仍然不可或缺⁸¹。美國在冷戰告終後仍在亞太地區維持相當規模的駐軍。該報告認為原因在於：俄國仍在東北亞維持強大武力、亞太國家的先進武器仍在擴散、朝鮮半島以及其他亞太地區可能爆發危機。

1992年7月布希政府向國會提出第二份亞太戰略架構報告⁸²。該報告指出，由於蘇聯瓦解及冷戰的終結，美國在亞太的區域性角色，在冷戰時期原本居於次要的地位，如今已轉居主要地位。美軍在亞太的基本安全任務是：防衛夏威夷、阿拉斯加及兩地與美國本土的交通線；保護美國領土與自由協約國；協防盟邦；維持太平洋、印度洋、波斯灣、東海及南海交通線的安全。

三、柯林頓時期

有關柯林頓的亞太與對華政策可從其亞太助卿羅得(Winston Lord)在1993年3月參議院外委會任命聽證會上級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之說中得到說明。柯林頓於7月中旬訪日、韓時進一步加以說明⁸³。綜合而言，柯林頓政府的新太平洋共同體是建立在六大基礎上⁸⁴。

第一，美國與亞太國家的同盟條約關係，尤其是美日同盟關係。該等同盟關係雖然形成於冷戰時期，但是其角色已由反應性轉變為預防性；換言之，由冷戰時期圍堵特定國家的行為，轉變為後冷戰時期預防任何國家危害和平與安定之行為。因此，美國要繼續維持對日、韓、菲、泰、澳五國協防的堅定承諾；強化美日安全合作的關係，使日本成為協助美國維持東亞安全的主要伙伴；同時恢復1992年終止的菲律賓的軍事關係，包括軍事演習、美艦訪菲和軍事訓練。美國保持其維持亞太安定的領導角色與核心地位，但亦要求盟邦分擔責任。

⁸¹ *A Strategy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A Report to Congres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 28, 1991).

⁸² *A Strategy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Report to Congres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2)

⁸³ President Clinton, "Building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Dispatch*, Vol.4, No.28 (July 12, 1993), pp.485-488

⁸⁴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頁52-55。

第二、美國的亞太駐軍。美國繼續維持十萬名左右駐軍，以免亞太出現權力真空、爆發核武競賽。大部分駐軍在日韓兩國。駐日美軍將長期維持不變，其功能出協防日本外，尚協助需美國的亞太軍事行動。駐韓美軍的功能是嚇阻北韓南侵，並在韓戰再起時使美國自動介入。柯林頓政府已凍結裁撤駐韓美軍的計畫，但是美國、中共、南北韓「四邊會議」成功後，可能會改變凍結計畫。美國要求東南亞的「軍事駐留」(military presence)，除增加新加坡的設施使用外，亦希望其他東南亞國家提供設施的使用以及後勤支援。

第三、多重安全體系。柯林頓政府主張發展多重安全體系，以因應多重的威脅及機會。多重安全體系有如相互重疊的多重鎧甲。每片鎧甲可對人體的部分提供安全保護，多層鎧甲自然會提供多重的保護。美國與亞太國家的雙邊安全體系是第一層鎧甲。柯林頓政府支持的區域安全對話，如東北亞對話論壇(Northeast Security Dialogue Forum)，東協外長會後會(ASEAN 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是第二層鎧甲。區域性經濟組合如亞太經合會亦可扮演降低區域情勢緊張的角色。柯林頓改變其前任反對亞太多邊安全體系的立場。但是誠如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新加坡東協外長會後會強調的，區域安全對話只是「輔助」而非取代美國在亞太的雙邊安全條約與前置駐軍。亞太助卿羅得亦表示，美國支持多邊安全對話，但不謀求建立正式的多邊安全公約，因為歐洲與亞洲的環境不同，不宜成立類似歐安組織的政治架構⁸⁵。

第四、美國與中共的「全面交往」。中共為美國在下世紀的主要對手。美國要確保雙方得關係朝建設性方向發展，並使中共在國際體中按規範行事，成為美國心中負責、合作有建設性的成員。美國係望透過交往、在共同利益的議題上進行合作；在利益與矛盾兼有的議題上尋求共識、減少分歧；在利益無法調和的議題上防止或是減少衝突。美國其尤希望與中共軍方各階層進行交往，促使中共軍事透明化、影響中共的軍事決策。美國的交往政策暗含中國所指責的「軟圍堵」。

⁸⁵ Winston Lord,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Ten Goals for American Policy," *Dispatch*, Vol.47, No.36(Sept.6,1993), pp.612-614

第五、美國與亞太國家間開放而公平的經貿關係。美國對亞太地區國家輸出已超過美國對外輸出的 60% ，與美國的經濟繁榮與安全密切相關。美國對外貿易主要的逆差也在亞太地區。然而，亞太國家的市場不夠開放。美國一方面推動亞太經合會的自由貿易計畫，其他方面運用外交談判壓力，迫使亞太國家貿易伙伴開放市場，進行「公平」（符合美國利益）的貿易。

第六、民主的擴展。柯林頓認為經濟成長，加上資訊時代的來臨，以使人們無法抗拒對自由的渴望；而民主政治的擴散是亞太和平、繁榮與安定的最佳保證之一。民主國家不僅更能滿足人民的需要，意會成為較佳的鄰居，不會互相攻伐、實施恐怖主義、製造難民潮、販賣毒品、製造非法武器；在貿易對話中亦是可靠的伙伴。因此，美國支持亞太地區民主改革的浪潮，要求各國尊重人權。

然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逐漸增強，美國認為中國已逐漸成為區域和全球大國所兼具的挑戰與機會。挑戰來自於中國傳統文化對國際事務的觀點與美國有顯著的差異；而機會則是來自兩國享有許多共同的經濟與安全利益。

二、小布希時期

90 年代末，柯林頓政府任期即將結束之際，美國對華政策何去何從，再度成為美國政壇的政壇所關注的焦點之一，而柯林頓時期的全面交往和戰略伙伴關係的政策，以及批評者所主張的「圍堵」政策，成為 2000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主軸之一。美國著名智庫藍德公司（RAND）的一項研究報告⁸⁶中提出美國對華政策的第三種選擇，巧妙地融合「交往」與「圍堵」，主張對中國這新興強權軟硬兼施採取「胡蘿蔔與棍子」雙管齊下的策略，而創造出「圍和」（Congagement）此一新名詞。

該報告指出，北京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指導因素是追求綜合國力，以提供建軍所需的科技與工業基礎，所以中國必須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以建構利於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然而，中國領導人關切共黨專政和宣稱擁有台灣主權，使雙方關

⁸⁶ 該計畫是美國空軍委託蘭德公司進行「中國國防現代化及其對美國空軍的影響」研究計畫的一部份。該研究計畫成果後集結成為專書：「美國與一個躍升中之中國」。

係難以大幅改善。現實主義理論與中國傳統的亞洲地緣政治思想都顯示中國在實力接近美國時，可能進行確立領土主權、尋求區域霸權，以及改變國際體系規則之行為。美國必須對未來可能發生的美、中衝突預籌因應之策。是以，「圍和」政策的主軸簡言之就是一方面維持與中國交往之政策（但須做微幅的調整），以期雙方能走向未來的合作關係；但另一方面美國也需採取預防措施以因應未來美國可能轉為美國敵人的情況。該政策主張繼續促使中國大陸進入國際體系，同時準備應付可能的中國威脅，其內容包括：

- （一）修正的交往：對中國大陸的人權議題採取較強硬態度
- （二）強化與區域內國家的關係：以便在北京採取敵對立場時可以和東亞各國進行安全合作
- （三）處理台灣問題：只要中國未來路線持續不確定，便支持強化台灣事實獨立的地位；若中國大陸朝民主的方向演化，美國政策將轉為鼓勵與支持兩岸自願統一。

綜合而言，這項所謂「第三選擇」政策的精髓在於，中國大陸追求區域霸權或攻擊台灣時該政策可能轉為圍堵，但若中國大陸變得民主與合作，將加強兩國的伙伴關係。對美國而言，為因應後冷戰時期國際安全環境的轉變，採取維持美國優勢的戰略選擇，不論交往或圍和戰略都是為防止中國大陸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而傷害美國國家利益。是以，「圍和」政策背後的深刻意涵在於，認為中國不儘可能和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存在與盟國關係發生衝突，更可能因為中國堅持共產主義，而使美中之間的意識型態衝突難以避免，進而為圍和戰略提供理論基礎。布希政府初期即採取圍和政策，既尋求與中國的經濟和國際事務合作，在中國大陸擴大民主思想與競爭理念，以塑造「民主和平」的價值；但另一方面，亦以軍事力量為後盾，對中國進行某種程度的圍堵，避免其直接挑戰美國的強權地位。

除圍和政策的形成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布希政府亦逐漸調整華府對美中關係本質的看法，由柯林頓時期的「戰略伙伴」演變為「戰略競爭者」的定位。1999年，小布希在競選時即稱中國為「戰略競爭者」，顯然是為凸顯其與柯林頓政府在中國政策的不同。小布希總統雖不再使用「戰略競爭者」的稱謂，但

也不再接受「戰略伙伴」來界定中美關係的用詞。2001年7月，美國務卿鮑爾表示，他已放棄使用布希總統的競選語言，不再形容中國是「戰略競爭者」。對於美中關係的定位，鮑氏強調戰略競爭及戰略伙伴皆不是，因為美中關係如此複雜，牽涉層面極廣，只用一兩個詞來概括美中關係是不可能的。在部分議題上，布希政府將中國視為伙伴，但在部分議題上，則視中國為競爭對手；而美中之間所存在的是一個「坦誠、建設與合作性」(candid, 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坦誠的關係面向，意即雙方的負面及困難因素。換言之，在追求各自目標的同時，彼此之間有許多的歧異必須坦誠陳述，更重要的是雙方都能以文明方式來處理彼此關係，而不致於成為敵人。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急遽發展，以及在國際事務上所取得的重要地位，美國國內越來越重視「中國崛起」的議題。近年來有關中國崛起議題的討論始終方興未艾，外界將其視為威脅及機遇者皆有之，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基本上，國際間有關討論中國崛起的討論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強調中國經濟力量在世界經濟形勢中的角色，一類針對中國軍事力量對亞太地區戰略格局的衝擊。上述研究均以中國所處之地緣為依托，從而引申出中國崛起對此一地區相鄰國家的戰略意涵，當然其中尤以台灣、日本以及美國與此一局勢之發展息息相關。這些討論亦從中國崛起這個課題之主體意圖或能力、衝突或調和、激進或保守、經濟或軍事、權力或制度、理論或策略等等不同側面切入⁸⁷。布希總統2004年連任後，美國朝野掀起全面關注中國崛起的熱潮，對華戰略逐步從「中國問題」，轉變為聚焦於「中國崛起問題」。綜觀相關討論，其大致可分為「中國機遇論」與「中國威脅論」兩種完全相反的論述，前者認為中國在經濟上的快速成長及軍事上的向外擴張，已形成一種威脅；後者則認為中國無意和美國對抗，如果美國將中國視為一強大伙伴，中國的崛起就不會構成威脅。

在這種氛圍中，如何處理中國崛起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問題。尤其由布希政府對華政策的演變可知，如何應對中國崛起，減少對美國霸權的可能衝擊，中國如何運用不斷增長的實力等問題一直貫穿布希政府的對華政策。但前述的圍和及戰略競爭者的定位及操作逐漸面臨侷限性，華府的對華政策又到了5

⁸⁷ 袁易、嚴震生、彭慧鸞合編「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認知」。(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年)頁2。

年一變的週期。2005年9月21日在應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邀請，以「中國往何處去：從會員到責任」發表演說。在演說中，佐氏數度提出中國應超越目前只是國際社會成員的身份，在未來扮演「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a response stakeholder)⁸⁸，並正式宣告美國將以此重新界定與中國的關係。佐氏認為從1972年尼克森訪問北京時，美中關係是由「雙方共同反對的」所定義，但兩國現在有機會由「雙方都贊同的」重新定義。他指出，美中有許多共同利益，但建構在意外利益的關係總是根基短淺，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價值上的關係才可深可久。佐氏並引述國務卿萊斯的談話說，美國歡迎一自信、和平及繁榮的中國，一個可以體認其成長和發展端賴於與世界維持建設性聯繫的中國；美國希望中國能加入美國和其他國家，共同面對新世紀的挑戰。佐氏又指出，要合作成為「利害關係人」，不意謂忽視彼此歧見，美中之間仍有需要控管的歧見，但這樣的控管是在一個能提供共同利益的大架構下，讓當事者在維持可以提供共同利益的政治、經濟與安全體系中進行。至於在台海問題上，佐氏表示，美國已表明美國的一中政策，仍然基於三項公報與台灣關係法，對中國而言，和平解決與台灣的歧見仍然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佐氏也對兩國其他議題提出看法，包括中方應增加國防經費的透明度，經貿體制應與國際接軌，以及調整外交政策，避免在區域建立個別聯盟，以利操縱亞洲。

佐氏的對美中關係的新定位顯示美國將逐漸揚棄「單邊主義」的行為模式，擴大分擔及維繫國際秩序的群體基礎。而「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一詞意謂著中國從這個國際體系中獲益，因此有責任與別的國家一起來加強這個體系；中國既是利害關係人，這個體系的成敗興衰就與中國休戚相關；中美及其他國家必須共同建構未來國際體系，共同應對未來的挑戰。美國做出這樣調整的動機十分簡單：如果不儘早將中國納入國際秩序體系，接受國際行為準則的規範，未來在面對恐怖主義、核武擴散、大規模傳染疾病等問題時，美國將更為孤立無援，也將影響美國戰略佈局，傷害其國家利益。爾後，美方正式將此作為雙邊關係的定位，並在朝核問題等多項國際事務上與中國進行合作。

⁸⁸ 「負責任利害關係人」一詞首度出現在佐立克2005年8月2日在北京的記者會上。

第三節 後冷戰初期的美中關係：中國觀點

中國的外交戰略有其不變與變的兩面。不變的一面乃是現階段其追求和平穩定的內外環境，爭取中國經濟建設所必須的技術和國際資金，將經濟合作、共同發展作為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的主要支柱，以利國家現代化之發展，提升中國的綜合國力，以便在國際社會發揮影響力。至於變的一面，則是因應內外環境的變遷或突發事件，做出適當的對策及作為。自 1949 年建政迄今，北京從初始的極力徹底切斷舊中國的外交傳統，採取所謂「一面倒」的策略，一切以蘇聯馬首是瞻、到後來的孤立閉鎖的外交政策，再到今天的積極推動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事務，建立大國地位，走向大國外交。中國這種主動出擊的轉變，顯現其已開始調整全球戰略及亞太政策。九一一事件對於國際環境的衝擊以及對於美國亞太及對中政策的影響，即屬於中國外交政策中變的因素。然而，總體而言，不論基於安全、政治或經濟的考量，也不論是基於國內需要亦或國際格局使然，中國短中期的外交戰略佈局，仍將持續追求和平穩定的國際與周邊環境，繼續其「韜光養晦」、「靜以待變」，並加強推動「大國外交」以期「有所作為」。但九一一事件後，世界戰略安全環境的變化，的確也為中國的外交帶來新的機會與挑戰。

綜觀中國的對美政策的變化，不脫離中國如何看待美國霸權的發展及演變。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憑藉獨一無二的經濟及軍事實力(特別是核武力量)，而成為世界強權，尤其 90 年代初，蘇聯瓦解後，美國更成為世界獨一無二的超級強權。

一、江澤民時期

中國方面則觀察到 90 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曾支配世界近半個世紀的兩極格局終結，大國關係不斷調整，世界局勢呈現「多極化」的格局。此種格局的變化與兩次世界大戰後格局變化的條件完全不同，前兩次變化與戰爭有直接的關連性，而多極化世界格局的形成卻是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所產生，是世界各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實力長期演變的結果，其原因比前兩次更加錯綜複雜，多種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其中一極的崩潰。因此，多極化進程是長期的，是一個動態又複雜歷史過程。

在對此國際情勢的變化，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92年的14大中就曾明確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大變動的歷史時期，兩極格局已經終結，各種力量分化組合，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新格局的形成將是長期、複雜的過程」。中國認為兩極格局的結束某種程度上刺激了美國建構單極世界的霸權慾望，但這一格局的結束也為其他力量中心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和條件。歐盟、中國、俄羅斯及日本等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制約美國搞單極的行為，雖不可能完全形成聯合制美，但各個力量中心之間形成了某種程度的牽制力量。

基於這種對國內外環境所評估的情勢，中國在89年以後，一方面仍將焦點置於本身國力的提升，同時則以大國自居繼續推動「大國外交」，促進全球朝向多極化的發展。所謂大國外交有兩個意義，一方面是積極加強與美、俄、日以及歐盟等大國的關係，並藉此取得大國的地位及影響力，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全方位外交來扮演大國的角色。此一大國外交戰略具有多重目的，包括突破部分西方國家的預防性遏制或圍堵，爭取改革開放與經濟改革的有利環境，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以及防止大國支持台灣的分離與獨立勢力，特別是希望獲得美國公開表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以及承諾不支持台灣獨立⁸⁹。在對美政策上，其重點包括擴大雙方的經貿交流與合作、尋求恢復與華府的軍事關係，促進雙方領導人互訪等。但中國仍反對美國的單極主義，因此在15大中依舊強調「反霸」，企圖聯合其他國家以制衡美國。

1996 台海危機後，柯林頓政府強烈希望與中方改善關係，尤其從國家戰略利益層面考量，如何掌握有利的契機，一方面促進雙邊合作，另一方面減少潛在的衝突，就成為美國未來國家利益的重要抉擇。就美國而言，當然期望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扮演美國利益的正面角色，因此美國對中共採取交往的戰略以保持對話，促使中國在完全融入國際體系前，置於雙方所建構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之框架中。北京方面，則十分清楚地瞭解未來美國在全球政經體系的超強地位，中國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並無能力挑戰其地位；況且這樣的挑戰會對中國的現代化將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中國願意承認美國在全球體系的領導地位，亦願意與美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但中國並非毫無條件，其前提是美國要以正面友善的態度承認中國在亞太地區和全球的強國地位，並在台灣問題上不挑

⁸⁹ Bates Gill, "Powell in China: Modest Progress Will Be Better Than Non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7, 2001.

戰「一個中國」原則。對美中兩國而言，戰略伙伴關係中的「戰略」意涵，主要是指雙方充分體認對方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與角色，並以合作代替對抗，藉此發展和鞏固雙方的國家利益，以達雙贏的目的。

1996年7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雷克前往北京展開「戰略對話」之旅，美中代表同意以「戰略眼光和長遠觀點來看待和處理」雙方的關係，以及江澤民所提出的「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原則。雷克在與中國領導人會晤時亦表示，此行目的是為兩國如何展開戰略性對話，以建立一個和平安全的世界。1997年，柯林頓競選連任成功後，其對華政策主軸聚焦於深化與中國的全面交往，主張與中國積極交往，並採取多元化的方式與中國接觸，不因某一問題產生分歧而影響到其他問題，諸如人權問題、貿易逆差問題、軍售問題、以及台灣問題等，將個別處理，不再相互掛勾。同年10月底，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赴美進行訪問，兩國決定致力於建立一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Relations of 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雙方同意領導人定期訪問及政府部長級官員互訪；至此，雙方戰略伙伴關係正式宣告成立。

然而，誠如前述對中國崛起的闡述，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在20世紀末逐漸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並成為全球性的議題。就中國而言，在全球政治事務上，中國認為儘管中美之間固有的矛盾和歧見依舊存在，甚至根本無法獲得解決，但沒有必要與美國在結構性分歧的議題上進行重大的衝突。最有利於中國的策略是能夠找到合乎雙邊利益的聚集點，拓展雙方相互合作的空間。是以，中國除了致力於全力發展本身的經濟外，更積極拓展與美、俄、法、英、歐盟、日，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建立各種形式的夥伴關係，透過與主要大國以及其他國家之間建立與維持各種友好合作的關係，以創造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並盡量排除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上差異對發展雙方國家關係所帶來的干擾。在國際社會上，中國不僅要求以平等參與的方式加入現存國際體系的各種機制、論壇和組織，更爭取成為其中主要成員，使國際規範的制定和修正能適當的反應中國的要求，符合中國的利益與世界觀，創造適合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以利爭取中國的國際地位與權力。但為使國際社會減少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中國開始宣揚其「和平崛起」的理念。

中國和平崛起首次成為國際和中國所矚目的焦點，是源自於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中發表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演講。在此演講中，鄭氏指出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包括問題的方面和動力的方面，歸根到底，都離不開中國的龐大人口。中國為解決發展問題的一切努力，無論經濟、政治、文化工作，內政、外交、國防，歸根到底，都是為了使中國人民生活條件改善，而這就是中國對人類發展承擔起的無與倫比的重大責任。鄭氏並提出三項強調⁹⁰，其中之一即為中國的發展是一條奮力崛起而又堅持和平、堅持不爭霸的道路，因此，中國唯一的抉擇就是奮力的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⁹¹。同年12月，中國總理溫家寶應邀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正式提出「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的概念。在這篇名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裡，溫家寶指出：

我們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充分和自覺地依靠自身的體制和創新，依靠開發愈來愈大的國際市場，依靠把龐大的居民收入轉為投資，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的進步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要義就在於此。

爾後，中國向國際社會大力宣揚「和平崛起」，強調中國並無稱霸的野心。但由於崛起一詞仍使國際社會，尤其是歐美國家有所疑慮。自2005年起，中國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⁹²，強調「和平發展」，強調中國過去不稱霸，現在不稱霸，將來強大了也不稱霸。中國現在及未來強大後均將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希望藉此回應西方社會所擔憂的「中國威脅論」，消除世界各國對中國

⁹⁰ 另兩項強調分別為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這本身就是中國人的一個重大的歷史性戰略抉擇，以及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⁹¹ 鄭氏闡釋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戰略方針有三條：一是毫不動搖地銳意推進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基本內涵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證；二是大膽借鑒吸收人類文明成果而又堅持弘揚中華文明，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遇到細緻地統籌兼顧各種利益關係，包括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社會環境。

⁹² 該份白皮疏於2005年12月22日發佈，全文約一萬二千字，包括：和平發展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以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等六個部分。主調是表明，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實現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

崛起的憂慮。在這種思維下，中國對美政策則是有意強化雙邊合作關係，尤其未來二十年是中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中國在這段期間內與美國維持建設性合作關係，才是符合中國領導人最大利益的對美工作方向。由中國的角度觀之，在面臨全球化的競爭趨勢挑戰下，胡錦濤政權對美政策的戰略思維，除了把握「和平與發展」原則，積極加強雙方合作關係外，中國的選擇空間並不大。因此，中美之間雖仍有許多重大歧見，但中方逐漸願意配合美國政策，在國際上發揮建設性的角色，包括共同執行反恐戰爭、維持朝鮮半島穩定，促進中東地區和平，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以及保持台海現狀，避免局勢失控造成危機。綜合而言，中國對美政策已有別於90年代「大國外交」，在與美交往的背後，更重要的目的在於制衡美國霸權，而是認清自身仍未具備挑戰美國霸權的實力，與美國為持有好關係更可為大陸經濟發展與確保和平，有助於發展的國際環境提供機會。雖然中國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及霸權行為並不滿意，但與美國直接對抗更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此中國選擇繼續「韜光養晦」，與美國保持有好關係。

總結前述的觀點，吾人可將和平崛起或和平死發展的邏輯概括為所謂的「和平論述」。深入分析，和平論述的外部結構而言，涉及了「外-內」與「內-外」兩個部分。首先，是「外-內」的胡錦濤的分析。中共認為國際體系以及體系內的國家互動，已從冷戰的零和的二元體系走向後冷戰競合的單極結構，這意味在新的國際體系下，雖然仍存有區域性的衝突，但是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較低，再加上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潮流，使得國家之間對於促進合作與追求和平有了更多的共識。這樣的國際環境為中共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現代化的政策目標提供了良好、穩定的外部條件。北京當局往往以「戰略機遇期」形容這樣的情勢。⁹³

其次，是「內-外」的說明。而中共處於「戰略機遇期」的首要工作為追求

⁹³ 最早闡述「戰略機遇期」的基本意義的為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的內容：「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可參考新華網，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1/16/content_2467736.htm（點選日：2008年10月9日）胡錦濤對此觀念亦有不少著墨與補充，以胡2007年8月13日在中央黨校的演講：「緊緊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為代表，相關內容可參考人民網，網址：<http://opinion.people.com.cn/GB/6102773.html>（點選日：2008年10月9日）。

「小康社會」。⁹⁴中國在追求小康社會的過程中，一方面只希冀讓人民的經濟生活在溫飽之同時能有更多的改善，並同時持續針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傾斜式的經濟發展策略與制度遺產進行調整，因此中國的崛起，只是一種「內向性」與「和平的」崛起，對於既有的國際政治格局將會採取較為溫和、和平的態度；換言之在希望擁有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下，中共才能進行小康社會的建設，這意味了中共並不是「現狀的改變與破壞者」，更說明了中國與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是相互結合的，互為需求。

從前面的「外而內」與「內而外」的分析中，胡錦濤初步建立起和平論述的外部架構。其主要用意在於表明中國的崛起並不是對於國際現狀的挑戰與威脅，因為中國不僅與世界經濟相互依賴、緊密結合外，更重要的是，中國崛起的主要目標仍在於改革開放的邏輯之內，經濟現代化仍是中共首要的政治目標。只是過去改革開放的重點在於「發展是硬道理」與「穩定壓倒一切」，現在漸漸轉為「協調發展」與「和諧社會」。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外部架構中，中共嘗試將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情境秩序與自身的發展邏輯相互結合，這種分析脈絡大致結合了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結構現實主義」（外而內，宏觀到微觀：國際結構制約國家對外行為與外交政策）與「新古典現實主義」（內而外，微觀到宏觀：每個國家政治目標與制度的差異將影響對外政策的內容）的基本假設與意涵。

更深層來說，中共有意透過這種和平論述，將其傳統的外交理念如「和平共處五原則」與「獨立自主」外交與自改革開放的訴求相互結合，透過軟實力的運作，形塑所謂的「北京共識」下的「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發展新模式：政治是威權的、經濟是計畫與市場混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權是公有的、改革是漸進的、社會是國家統合主義的，使其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政治是民主的、經濟是自由放任的、產權是私有化的、改革是全面的社會是開放的價值體系、政經制度相互抗衡。⁹⁵中共建構所謂「北京共識」的內容，是一種

⁹⁴ 有關「小康社會」小康社會的定義可參考新華網，網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8243.htm（點選日：2008年10月9日）。

⁹⁵ 有關「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的比較與爭辯可參考新華網，「中國提升軟實力：『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網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6/13/content_1522884.htm（點選日：2008年10月11日）；華夏經緯，「國際上已經形成了『北京共識』」，網址：

歷經將「普遍的『特殊化』」（亦即「後社會主義」中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經濟的意識型態論述）轉向為「特殊的『普遍化』」的過程，其目標是有意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竟奪「文化霸權」。這不僅可以從平面上消彌中國威脅論的陰影，更可以從理論與價值的本質面剷平中國威脅論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中共更可將其外交理念、經濟發展模式改革路徑做為其他後發展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在進行經濟現代化或經濟制度改革時，在「華盛頓共識」之下擁有其他替代性的選擇可能。

第四節 小結

就對外關係而言，北京所面臨的後冷戰情境與國際政治體系正是一種「維持現狀的霸權/崛起大國」、「鞏固單極化/追求多極化」的矛盾關係，在此衝突的結構的下，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也相應出現，這使得中共必須回應、處理這樣的失衡局面，否則將對其國際形象、國家利益、經濟現代化甚至對台政策帶來不利的後果。簡單來說，只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威脅論」的基調未曾改變，中共的經濟現代化、綜合國力的提升以及台海問題必然就是美國牽制中共崛起的關鍵因素，中共的任何作為都將被解釋為對於現狀與美國利益的挑釁；在美國所建構國際關係的理論與文化霸權之下（不論是「現實主義」或是「自由主義」的思維），北京的一舉一動都將被視為現狀的改變者或是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

對美國來說，對於中國崛起的態度是充滿疑慮的，萊斯在「促進國家利益」一文中指出，中國大陸並非甘於現狀的強權，而是一個想改變亞洲權力平衡，並使之朝向對其有利的強權。美國要以經濟互動促進中共內部轉變，曾是要圍堵中共在權力上的野心，美國應追求與中共合作，但兩者有利益衝突時，不應畏與中共對抗⁹⁶。因此，中共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而非柯林頓所謂的「戰略伙伴」，

<http://hk.huaxia.com/zt/pl/07-093/608561.html>（點選日：2008年10月11日）；人民網，「關於『北京共識』與中國發展模式的對話」，網址：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557/54488/54489/3802863.html>（點選日：2008年10月11日）

⁹⁶ Rice Condoleezza,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79(1), 2000, pp.46-51.

對中共採取既交流又圍堵的「圍和」(Congagement)策略，防止中國崛起成為歐亞大陸的霸權或是威脅美國盟邦的安全⁹⁷。

對於中國來說，中共除了特別強調跨世紀國際政治最重要的現象是中國崛起外，對於世界格局的評估，也從過去世界朝多極化的方向過渡與發展，到現在強調世界多極化應該得到發展，同時在國際上積極推動此種趨勢的進展⁹⁸。

中共對於後冷戰國際政治格局的評估，具有以下的意義⁹⁹。一、中共具有強烈的主觀願望成為國際政治的一極；二、中共顯然主張多極化的國際格局，比兩極化更有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其主要目的是要打破美國獨霸的局面，因為中共認為「多極化」世界格局的形成，有利於實現主要大國的權力平衡，有利於防止一兩個大國操縱國際事務，因而有利於制止霸權主義；三、中共對於多極化的格局，由原來力求適應多極化的趨勢，現在則是積極促進多極化的發展；四、戰略伙伴關係是促成多極化主要方式。在朝向多極化發展的世界中，中共主張傳統的權力平衡，雖然可以改變有關國家間的權力對比，卻不能改變有關國家的外交政策意圖或者利益衝突的現實。

⁹⁷ Zalmay M Khalilzad, "Sweet and Sour Recipe for a New China Policy", *RAND Review*, 23(3), 2000, pp.6-11.

⁹⁸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31 卷第 3 期（台北：2000 年），頁 23。

⁹⁹ 同前註，頁 28-29。

第三章 胡錦濤時期中美軍事安全關係之競合

(一) 核擴散議題

一、美國反擴散政策的調整與影響

核武器的擴散與反擴散，一直是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係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安全課題之一。雖然國際社會在政策層面建起了各項廣泛的反核擴散的制度與建制，顯然，反擴散已經成為當代國際關係具有道德優勢的話題。

在傳統安全問題上，核子武器長期被當做國家安全的終極手段。在下一代能源技術問世並被軍事化之前，這種狀況還會繼續。因此，在沒有做好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法律安排與技術替代之前，超前談論無核武器世界不免流為奢談。不僅多數有核武器國家根本就不可能接受全面禁止核武器，就連一些無核武器國家也仍在試圖獲得核武器。在國家層面，核武器的擴散屬於傳統安全範疇，歸入國家追逐軍事能力的傳統安全範圍。但進入次國家甚至非國家層面後，核武器的擴散就將導致國際安全秩序的嚴重失衡，其破壞力難以想像。這種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在「毀滅」能力上的博弈，顯然不為傳統安全概念所涵蓋。在兼及傳統與非傳統的安全領域中，核擴散正是當今世界最為關注的核心安全問題之一。

九一一攻擊對美國國家利益與全球戰略安全格局造成重要的衝擊。而恐怖主義、流氓國家、大規模殺傷武器和技術擴散以及這三者的結合構成了美國國家安全最大的現實與潛在的威脅¹⁰⁰。小布希上台後及授權國防部對美國國家安全形勢、安全防務戰略進行評估。對美國面臨的安全與戰略進行全面的評估，與全球認為大規模毀滅武器和技術迅速擴散，並為流氓國家和恐怖主義組織利用，以偷襲、欺騙等方式攻擊美國及其盟友，為美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¹⁰¹。針對這種威脅，倫斯斐在QDR報告與序言中指出：「我們不知道美國的利益會在何時何地受

¹⁰⁰ 楚樹龍、耿秦主編，世界、美國和中國—新世紀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理論探索，（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84。

¹⁰¹ Donald Rumsfel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QDR)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30,2001.pp4-8.

到威脅，何時美國會受到攻擊或者何時美國人將死於侵略。我們能清楚各種動向，但事實何時發生卻不得而知。我們能識別各種威脅，但不可能得知何時何地美國及其盟友會被攻擊，『九一一事件』恰恰證明了這一形勢。¹⁰²」

小布希認為新的安全環境中，美國本土防務已成為國家安全戰略中最急迫的任務。由於導彈技術的擴散，經濟全球化，跨國旅行和貿易的增長，訊息科技的進步，美國本土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¹⁰³。對於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中長期威脅，QDR 報告認為，儘管美國與其他盟國的關係牢固，但同另一些國家的關係卻是合作與競爭並存，新的地緣政治發展趨勢中，亞洲逐漸展露出大規模軍備競賽的現象，「亞洲可能出現一個擁有巨大潛在資源的軍事競爭對手」，美國在該地區的基地與前沿補給設施都相對於其他地區較少，需要增加該地區的基地與補給設施，同時發展遠距離的投射能力¹⁰⁴。

以往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一是注重自由主義的論述上，即擴大民主、推進市場經濟，重視人權普的價值觀；二則是注重現實主義，即強調國際合作和權力平衡，主張嚇阻與威懾。柯林頓政府時期，美國一度將擴大民主、推進市場經濟和重視人權視為美國全球戰略的優先地位。「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的全球戰略發生了轉變，變成建立反恐包圍網和制止大規模毀滅武器的擴散被置於優先位置。換言之，最重要的目標必須是確保美國不會再遭遇到類似的攻擊，特別適合、化學與生化武器的襲擊。2002年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指出：「保衛我們的國家，抗擊敵人，是聯邦政府最根本的首要職責。今天，這個任務已發生根本的改變。過去敵人是靠大批軍隊與發達的工業才能威脅美國，而現在躲在陰暗角落的個人組成的網路用此購買一輛坦克還少的代價就能在我國國土上造成極大的混亂與痛苦」；為此，「我們的任務首先是瓦解和搗毀全球國際恐怖組織，打擊首惡份子，摧毀其指揮控制和通訊系統，斷絕其物資供應與經費來源。這使恐怖主義分子的策劃和行動能力陷於癱瘓」¹⁰⁵。

為實現反恐和制止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的目標，美國政府用唯一標準來評價

¹⁰² 同前註, p8.

¹⁰³ 同前註, p10.

¹⁰⁴ 同前註, 3-4.

¹⁰⁵ 中華歐亞基金會、改革開放論壇聯合研究報告，**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台海局勢**（台北：大屯出版社，2003年），頁57。

所有國家，同時也包括盟友。唯一的標準是這個國家是否願意採取所有手段打擊恐怖主義，積極防止大規模毀滅武器的擴散，取消對基地組織與其他恐怖主義組織的容忍、後勤支援與保障，嚴密控制各自國家的大規模毀滅武器，停止生產大規模毀滅武器。根據此一標準，如果一個國家支援或者庇護一個打算襲擊美國的組織，或者它故意未對這種組織採取行動，那麼這個國家就處在一種與美國事實上的交戰狀態。支援者或者庇護這種組織是一種門檻。它將使得雙邊關係的許多方面變的不甚重要。在它認為時間和地點適合時，美國既對這個組織、又對這個國家採取行動。

二、中國反擴散政策的調整與意義

1992年初，聯合國安理會發表主席聲明，把大規模毀滅武器的擴散定性為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一方面在該項主席聲明的起草過程有著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該項聲明進一步強化了其在後冷戰時期和平與安全的責任。對中國而言，反對核擴散實為北京強調「做一個負責任大國」與展現政治影響力的具體表現。¹⁰⁶

有鑒于此，在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後，中國在維護核不擴散機制中也有所作為，主要表現在中國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在保障監督方面進行了積極的合作。中國反擴散的基本態度也直接地反映在對外關係領域。2004年12月，中國與歐盟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歐洲聯盟關於防擴散和軍備控制問題的聯合聲明》，雙方相互確認對方為裁軍和防擴散領域的重要戰略夥伴，並確定了優先合作領域。¹⁰⁷

此外，中國還嚴格按照防擴散政策和出口管制法規，通過情報交流和執法合作，與有關國家聯合打擊擴散活動。2004年4月，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第1540號決議。該決議是安理會通過的第一個專門的防擴散決議，有利于在現有國際法基礎上推動和加強國際合作，妥善解決非國家行為者獲取和販運大規模殺傷性武

¹⁰⁶ 楊潔勉等著，*大磨合-中美相互戰略與政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60。

¹⁰⁷ 「反核擴散：中國的大國責任與利益追求」，*新華網*，網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14/content_5089524.htm（點選日：2011年5月17日）。

器及其運載工具和相關材料的問題。中國積極參加了決議磋商，提出了許多建設性建議，為通過該決議做出了重要貢獻。¹⁰⁸

實際上，中國已經成為國際不擴散體制內的重要國家。為此，中國不僅可以在國際防擴散領域擔負起自己應擔負的國際責任與義務，而且還可以彰顯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在拓展「軟實力」與消弭「中國威脅論」取的一定的政治資本。中共十六大報告將「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作為中國在 21 世紀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即闡述前述的政策目標與內容。¹⁰⁹

然而，核危機和核擴散的現象重生，特別是依憑絕對的武器（包括核武器）和科技優勢來追求絕對安全的思想的抬頭，使得核武器的作用和價值在冷戰後仍為國際社會所青睞，由此導致國際核環境復雜化。其中就已有的核國家而言，吾人分析中國的戰略核環境未必如自我評估般樂觀。

首先是中國周邊出現了嚴重的核危機與核擴散。客觀的講，中國的周邊地區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運載工具擴散最為嚴重的區域。1994 年以來的朝鮮半島核子危機（以下簡稱「朝核危機」）不僅考驗著中國與北韓關係，也考驗著中北京處理應對危機的能力。1998 年 5 月，印度借口「中國威脅」作為其發展核武器的動因，實際上說明中國無可避免地要涉入到南亞安全體系之中，並且使其成為一個重要因素。

此外，日本政要借口朝核危機而不時發出的核武裝言論及其實有的核能力使中國的安全戰略評估更加復雜。由此導致的重大影響是：是核（擴散）因素而非主要核大國的對外政策行為導致地區局勢緊張，從而使得中國政府不得不認真思考和探索將核力量納入整體戰略統籌之中的有效途徑。換言之，地區局勢的發展變化迫使中國不得不認真思考核武器除威懾之外的其他功能，而這顯然不同於冷戰時期在核問題上較為單一的目的追求。可見，中國加強反擴散政策也是對自身安全的切實考慮。

最後，在核武器和導彈擴散問題上，美國將中國視為重點監控的國家之一，1993 年 7 月的「銀河號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在這個時期前後，中國反

¹⁰⁸ 同前註。

¹⁰⁹ 吳蕤思，「國際核不擴散體制面的挑戰：美國的作用及其對中國的意義」，載於倪世雄、王義桅主編，*中美國家利益比較*（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年），頁 209。

對美國借口擴散問題制裁一些發展中國家，這也被美國視為中國欲挑戰國際不擴散機制的表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積極地在國際不擴散機制內尋求解決朝鮮核危機和伊朗核問題實際上直接關乎新世紀中國的國際形象，因而也是中國國家利益的切實體現。

三、反擴散與美中關係

反擴散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重要議題，然而中美兩國在這個問題上意見分歧較大。中國批評美國對台灣輸出先進常規武器，違反國家間關係的根本原則；而美國批評中國對外輸出未經安全保障的核技術，並出口一些引起美國關切的導彈和導彈技術。中美相互批評，甚至將處理上述各自提出的問題的方法相互聯結，這種做法直至 21 世紀初才告結束。目前，雖然中美對彼此的一些做法仍有不滿，尤其是北京繼續強烈反對美國對台軍售，但雙方都已不再將單一問題的解決同其他問題的解決進行直接關聯。最近幾年來，中國對敏感性軍民兩用技術的出口管制給予了高度重視，也提出了一系列關於核生化技術與導彈技術出口管制的法規。

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與中期，中美在核與導彈技術出口問題上有過分歧。中國向巴基斯坦和印度提供的民用核技術，都是在《反核子武器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的許可範圍內。但為了限制印度等不參加《反核子武器擴散條約》的國家利用國際民用核能合作，美國在 1974 年印度「和平核爆」之後，於次年發起「核供應國集團」(NSG)，要求 NSG 的成員國不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非成員國發生民用核技術轉移。中國在調整了相關政策後，於 2004 年加入了這一機構，承擔起不同不接受全面核安全保障的國家發生任何核交易的新責任。¹¹⁰

但美國近年來對印度網開一面，通過調整立法不再對印度施加這一限制，並試圖在 NSG 內部通過對印度的豁免。大國合作是國際治理的保障，但能否合作以及如何合作還需因事而論，在有些問題上能合作，而在其他問題上就可能難以合作。防擴散問題屬於可以而且應該合作的領域，至少是基於有核國家的共同利益

¹¹⁰ 馬耀邦，*中美關係-透視大國隱性戰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 年），頁 153。

(即都有核武器)，它們都希望國際格局穩定，都希望避免核擴散引起國際關係更為複雜，都希望防止非國家行為體獲得核武器。¹¹¹

但是，反擴散的利益只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即使是國際合作的利益，仍然不能超越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國家的各種利益之間未必協調，可能出現相互競爭的局面。防擴散始終屬於美國的重要國家利益，在克林頓總統時代，軍事安全、經濟重振及促進民主並列為美國的三大核心利益，其排序隨時間而變，其中防擴散屬於軍事安全利益的核心之一。但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反恐躍升至美國的首要安全利益，而防擴散利益則排序下降。這兩者的結合(即防止恐怖分子獲取大規模毀滅武器)一時成了美國的超級安全利益。¹¹² 但對中國來講，反擴散固然符合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而且防擴散國際合作有利於中美關係的穩定與發展，但反擴散安全利益在中國的利益排序遠不如它在美國的地位。在中國，核心利益是社會經濟發展和維護國家主權，恐怕在這個層面上，防擴散還排不到利益排序的前列。利益排序不一，解決問題所給予的重視與投入就不同。中美在防擴散領域還存在摩擦與不信任，就是一個結構面的命題。

中美在反擴散問題上的合作也會給其他領域的合作帶來問題。中國接受超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更多責任，包括不同不接受全面核安全保障的國家發生民用核能合作。這種限制自身核能技術出口的行為，固然有助於中國從西方獲得民用核能合作(中國是有一定核技術出口能力的國家，西方要求中國限制自己向「有問題」的國家核出口行為，來換取它們向中國出口中國所需更先進核技術的權利)，但未必能促進自己在獲取外國化石燃料方面的利益。2005年，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競標收購美國的尤尼科石油公司時，也未因中國先前曾給予的反擴散合作而獲得回報。相反，在美國府會的強烈干預下，這一收購被迫流產。¹¹³

在中國於2004年加入了「核供應國集」後，布希政府次年就開始與印度合作，啟動了美印核能合作的戰略計畫，並在2007年獲兩國行政當局同意，美國參眾

¹¹¹ 同前註，頁154。

¹¹² 曹雄源，**戰略透視-冷戰後美國層級戰略體系**（台北：五南出版，2011年），頁164-165。

¹¹³ 「反核擴散：中國的大國責任與利益追求」，**新華網**，網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14/content_5089524.htm（點選日：2011年5月17日）。

兩院也給予了有條件的同意。這一計畫有如下三個特點：¹¹⁴ (1)罔顧美國國內法與「核供應國集團」規則，刻意免除對印度從國際社會獲得民用核能合作的限制，提升印度的國際競爭力；(2)促進美印戰略夥伴關係，戰略矛頭有所指向；(3)損害現有國際防擴散制度的嚴肅性，對釋放印度軍事核能發展資源不無助益。可見，美國的防擴散政策從屬於美國的安全戰略。在布希政府的反恐戰略下，美國為促進整體安全利益，不惜降低其防擴散價值取向。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布希政府可能錯誤地理解並確定了美國的整體安全利益。但這一事件的發展，提醒了人們正確界定防擴散在現階段中國國家利益中的地位。美國確有為了牽制中國而錯誤界定防擴散利益，但中國不應因此而放棄在防擴散問題上繼續與美國合作，也不宜因為在防擴散問題上中美享有共同利益而不恰當地誇大防擴散在本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性。中美防擴散合作既有維護各自安全的作用，又有維護地區和全球穩定的效用，但反擴散合作關係在雙方利益衡量中不是核心，更非全部，對此必須有清醒認識。中美關係中的利益聚散與競合，已不斷為事實所證實。中國在成長發展的過程中，對外政策需要更加穩健與成熟。

然而，美國對中國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問題上，始終有所不滿，特別是擴散至所謂「流氓國家」，更一向為兩國之間的重大歧見，而「九一一事件」更讓美國加深對此一問題的關注。對美國而言，中國是僅次於俄羅斯的第二大飛彈威脅國家。此外，中國過去也多次違反非但不擴散條約，將核子武器技術出售給巴基斯坦，並將先進的飛彈組件賣給巴基斯坦與伊朗，對於中國公開或暗中協助「流氓國家」發展戰略武力，美國至感不滿。美國中情局即曾提出警訊，美國在未來十五年間所面臨的彈道飛彈威脅，尤其是來自北韓、伊拉克及伊朗，將遠比冷戰時期嚴重。也因此，布希總統將上述三個國家稱為「邪惡軸心」，認為他們所擁有的大規模毀滅武器，將對世界和平形成重大威脅。

當美國明確將「反恐戰爭」與「邪惡軸心」劃上等號後。中國與這些國家的互動關係，便成為華府關切的對象。例如江澤民於2002年4月出訪利比亞及伊朗，即表示「中國當前的首要議題之一，是保護發展中國家免受美國的狂妄之舉。之後，伊朗官方亦透露獲得自中國方面在國防工業及技術上的協助。美國對此深

¹¹⁴ 金駿遠，*中國大戰略與國際安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121。

表不滿。惟隨著國際局勢發展，以及胡錦濤對美政策著重於加強與美合作，避免雙方產生直接衝突，美中兩國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歧見逐漸有縮小的趨勢，2003年所爆發的「朝核危機」就是雙方在此議題上合作的重大突破。

（二） 區域衝突與權力平衡

一、 地緣政治觀點下的中美關係

冷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化的發，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資訊技術得到普及，從本質上重塑了社會、經濟、政治關係，改變了各種行為體的觀念，重構了這些行為體通過全球空間的互動方式。原本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換言之人類進入了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

在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國際關係呈現出一種互賴的特質，同時形成了一個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文明相互交融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儘管國家之間的競爭仍然存在，但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領土擴張和爭奪勢力範圍的零和關係，而是在競爭中謀求可能的共同安全與繁榮。¹¹⁵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國家利益的實現，需要穩定的地區和全球國際關係的穩定架構，需要國家之間彼此的協調與合作，更需要共同應對所面臨的挑戰。

在新的地緣政治時代，中美關係也呈現出新的意義與概念。美國前總統布希曾表示：「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在這一時代裡，中美的雙邊關係將在21世紀上半葉的權力結構的形成過程中，將產生重大的作用」。¹¹⁶由於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有所加強，中國的發展中大國的地位也繼續提升。因此，中美關係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另一方面，中美關係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影響到全球的繁榮與發展。一段時間以來，中美兩國在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文明和地緣資源方面更顯雙邊互動關係，成為中美關係發展的一個新特點。這種互動雖然不反映在領土疆域地圖上，然而，這種隱性的互動比國家邊界的變

¹¹⁵ 蘇浩，「地緣重心與世界政治的支點」，現代國際關係，2004，頁4。

¹¹⁶ 陳永祥，布希與中國（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42。

更具有真實性，因為它為各個國家提供了一個更加廣泛的地緣互動空間。¹¹⁷

從地緣政治視角來看，中國是擁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中國的西北部地處麥金德 (Halford John Mackinder) 所說的心臟地帶。¹¹⁸ 及其通往心臟地帶的戰略通道。這一地緣條件是它獲取國際政治權力和資源的主要來源，它能對地緣政治全域產生持續不斷的影響的基本條件。¹¹⁹ 中國的東部地區是斯皮克曼 (Nicholas John Spykman) 所稱的邊緣地帶。這些地區經濟發達，與外部世界聯繫緊密，是地緣政治的關鍵部位。所以，中國既是心臟地帶之樞紐大國，又是邊緣地帶的關鍵力量。

美國橫跨北美大陸中部，東臨大西洋，西瀕太平洋，南靠墨西哥灣，西北接北冰洋，領土還包括北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島，海岸線長22 680 公里。¹²⁰ 中美兩國隔海相望，中國位於太平洋西岸，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位於太平洋的東岸，是最大的發達國家，這一地緣因素對於兩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深入而言，冷戰結束後，隨著美國全球霸權的確立和中國整體國力不斷提高，在區域安全和地緣競爭問題上，中美雙方的疑慮正逐步加重。美國認為中國可能成為「亞太地區扮演，並在安全領域「對美中共同安利益構成挑戰的問題中成為美國的伙伴」。但中國又「最有可能在軍事上與美國競爭；如果沒有反擊戰略，中國可能運用『破壞性』軍事科技抵銷美國傳統優勢」。¹²¹ 美國認為中國正在以一種間接的、不直接與美國衝突的方式在全世界與區域逐步增加自己的影響力；重點策略是美國目前還沒有可靠的策略阻止中國的崛起以及影響力的擴大。¹²² 對於中國主導上海合作組織，強化東協「10+1」、「10+3」機制，加強中俄、中印戰略對話，積極推出東亞共同體等政策作為，都被認為是北京一系列精心設

¹¹⁷ George J. Demko, Willian B. Wood, Recording the world: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Westview Press, 1999.

¹¹⁸ 麥金德在第一篇主要論文〈O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中說：「政治問題要靠實地探索得到的結果來決定。」也就是說地理情勢會決定國家情勢。在這篇論文中麥金德表現了四項觀點：1.地理對國家的影響可從歷史中找尋 2.世界的輪廓已經被描出。3.世界有陸權與海權兩種不同征服國家。4.科技的進步已提供實現大型現代國家的機會這就是他後來的世界島與心臟地帶理論的基礎。

¹¹⁹ 李義虎，**地緣政治學：二分論及其超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253。

¹²⁰ 中國國家地理編委會，**國家地理(世界卷)**（北京：藍天出版社，2007），頁314。

¹²¹ QDR, February 2006, pp.28-30.

¹²² 王黎，**中美戰略互信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院碩士論文，2010年），頁16。

計，旨將美國勢力驅逐出亞太地區的多邊關係網絡。

在中國看來，「九一一事件」使得美國打著「反恐」的旗號對中國周邊進行戰略佈局包括：拉攏格魯吉亞（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吉爾吉斯）等中亞「轉型國家」，在阿富汗建立親美政權並設立永久軍事基地，加強同印度的關係，提升與日本及澳大利亞的軍事同盟，繼續加強台灣的軍事交往，藉助朝核問題全面調整在朝鮮半島的軍事布局。這些動作雖然沒有必然聯繫，但是大多隱含對華戰略包圍之意。中美如果不能達成某項戰略性的諒解，相互間發生地緣政治衝突的風險性依然很大。¹²³

二、東亞地區權力結構與安全困境的起源

安全困境的研究者們認為在一個自助的、無政府的國際結構中，國家之間的恐懼與不信任感始終存在，由此產生了相互提防與戒備，各方紛紛採取措施加強自身安全，它們在尋求自身安全的過程中又加劇了這種恐懼，進而發生軍備競賽或者形成聯盟，從而導致新的不安全，增加了對抗甚至衝突的可能。這些衝突有以下三種表現形式：¹²⁴

（一）朝鮮與美、韓、日之間的對峙

朝鮮半島是東北亞安全困境態勢最嚴重的地區，也是當今世界兵力部署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在2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部署了近190萬的正規軍，而其中的70%又集中於軍事分界線兩側，雙方軍隊晝夜相向，嚴陣以待。龐大的軍事集結是互信缺失的結，這又反過來加深了彼此的敵意。韓戰結束以來，韓國始終對來自北方的襲擊抱有戒心，通過加強軍備以及與美國的聯合軍事演習來懾服北方；北韓也始終在提防來自美、韓的軍事攻擊和顛覆企圖，於1998年推行「先軍政治」路線，一切以軍事工作為先，一切以軍事工作為重，並通過發展軍備特別是尋求擁有核武器來增強自身的「安全」，提升和美、韓談判的地位。北韓的動向恰好被美、韓、日當作威脅的信號，使之也採取相應舉動，從而形成了安全困境的惡性循環。

¹²³ 同前註，頁17。

¹²⁴ 王秋彬，「東北亞地區安全困境及其成因解讀」，*長春師範學院學報*，第28卷第4期，2009年7月，頁1-2。

(二) 中、日兩國間的相互猜忌和提防

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國家實力顯著增強。中國GDP占全球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中國進出口總額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足1%上升到2007年的約8%。1978年以來，中國年均進口增速達到1617%，已成為世界第三、亞洲第一大進口市場。2007年中國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經濟體，甚至有人預測，中國若繼續以目前速度增長，日後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同時，日本則積極謀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國際舞臺上扮演真正的大國角色，還以重新定位的美日聯盟為掩護，積極推動品質建軍，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不斷引進和研製先進的軍事裝備，擴充軍事力量。2001年7月6日，日本內閣通過並發表了題為「21世紀擁有一支精銳強大的自衛隊」的年度防衛白皮書，該報告巧妙地隱瞞了日本的軍事實力，卻有意誇大其周邊國家的軍事威脅，為其品質建軍尋找藉口。白皮書指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目標「超出了防衛必要的範圍」，表示「強烈的憂慮與警戒」。在中國實現載人航太試驗成功之後，日本也加緊實施自己的航太計畫，欲與中國在太空一比高低。

(三) 美國對中、俄的防範

東北亞地區國家數量不多，但大國數量相對較多，中、日、俄、美四大國利益在此碰撞。為防止新興大國的挑戰，美國始終沒有放鬆對中、俄的防範與牽制。中俄兩國在美國的戰略擠壓下走向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美關係因戰略合作基礎的消失在冷戰後起起落落，不管美國如何聲言怎麼看重中國、中美關係如何重要，它對華防範的總政策是不會變的，用台灣、西藏等問題來牽制中國的做法也不會放棄。美國俄羅斯也不「放心」，也推行北約東擴，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支持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的反對派採取街頭革命的方式奪權，指責俄羅斯的民主與人權。2006年2月，美國國防部公佈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指出「包括印度、俄羅斯和中國在內的主要和新興大國的選擇，將是決定21世紀國際安全環境的主要因素……並將影響美國及盟友未來的戰略地

位和行動自由。」¹²⁵

為了適應新的戰略需要，美國強化了同日、韓的軍事同盟，不斷加強美韓同盟與美日同盟之間的戰略協調，力圖把形成於 20 世紀 60 年代的美日韓三國聯防體制轉變成為一個具有實質內容的機制，打造亞洲版的「北約」。在美國推動下，從 1998 年起美日韓三國每年都舉行「聯合防衛政策協商會」，表面上看旨在協調和統一三國的對朝政策，實際上則是通過強化美日韓三邊機制來加強對朝鮮施壓並排擠中國和俄羅斯的影響力。¹²⁶總之，無論是朝鮮發展核武器、試射導彈，還是美韓聯合軍事演習、美日加強軍事同盟，都是因互不信任、相互提防與恐懼造成的，而這一惡性循環又因為缺乏有效的安全合作與對話機制而加劇。因此，只要雙方不消除顧慮、不放棄零和博弈的思維，東北亞安全困境態勢將繼續發酵。

三、中國崛起、權力轉移與區域權力平衡

在過去的 60 年中，中國曾經歷過兩次崛起，目前正處於第三次崛起中。中國的崛起造成了權力轉移和大國間的權力互動。1949~1950 年，中國第一次崛起，為此要求修正地區秩序以反映其力量及其對安全的需求。中美和中蘇間多次爆發衝突後，美蘇最終容納了中國對改變東亞秩序的要求。1978~2008 年，中國以和平方式第二次崛起，成為東亞大陸的主導力量。整個東亞地區正在被劃分為中美兩國的勢力範圍。21 世紀初葉中國的第三次崛起將對美國在東亞海域的控制力及其全球的安全利益形成挑戰。中國領導人面臨著如何把握中國第三次崛起帶來的問題，而美國則應保持中國合作性外交和經濟政策，並鼓勵中國再次和平地崛起並維持自身的利益。¹²⁷

吾人分析，三次中國的權力變化都符合對有關權力轉移動態和不穩定根源的經典理解。與其他大國相比，崛起中的大國由於經濟和政治變化速度的不均衡，獲得了更大的相對權力。這種權力會使崛起

¹²⁵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http://www.defenselink.mil/qdr/report/Re2port20060203.pdf>, 2009-01-12.

¹²⁶ 楊光海，「美國的東亞同盟體系：態勢、趨向及意圖」，*國際論壇*，2002，頁 4。

¹²⁷ Robert S. Ross, 「中國崛起、地區權力轉移與東亞安全，從 1949 年到 21 世紀」，*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 年第 11 期，頁 36。

的大國能夠在地區政治秩序中要求更大的發言權，進而要求與其新力量相稱的更大的安全。崛起中的大國所要求的變化可以包括以下戰略性物品：新的或更大的勢力範圍、對海上航道的控制權、可靠地獲取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的資源。這些要求本質上具有破壞穩定的作用，因而經常遭到一些現狀維持國的反對。這些國家不願為了滿足崛起國的要求而從進行代價高昂的戰略調整，擔心由於失去盟國以及獲取自然資源的通道變得更為脆弱而造成安全係數降低。因此，權力轉移常常導致大國戰爭，因為一個崛起國可能採用預防性戰爭手段來取得想要現狀維持國不願和平讓與的東西，維持現狀的國家也可能在權力轉移的早期使用武力消除崛起國構成的潛在挑戰。¹²⁸1949年之後，中國三次崛起中的每一次都造成了與權力轉移相聯繫的大國關係變動。這種變動為理解中國外交的早期不穩定和衝突、此後的外交合作時期以及21世紀大國合作的前景提供了一個關鍵視角。

正如1949年之後的中國對外關係史表明了其他大國對中國崛起和權力轉移所做的調整一樣，21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對外關係也將反映中國的崛起及其對大國政治的影響。中國的政治影響力擴展到東亞大陸周邊並不表明中國崛起過程的完結。中國的經濟繼續增長，因此其相對軍事實力也將增長。大國間經濟的逐步發展和增長率的不平衡很可能導致中國的第三次崛起。中國第三次崛起的主要特徵顯示它將挑戰美國關鍵的安全利益。¹²⁹這種情形將出現在中國國內不穩定加劇和社會民族主義情緒增強的時期，因此它可能限制中國和平崛起的能力。因此，國際安全政治和中國國內政治的共同作用很可能會使中國的第三次權力轉移成為一個困難的過程。

國際關係學者指出，隨著台灣問題引發戰爭的可能性減弱，中國正在將其注意力轉向其他的國家安全問題。¹³⁰中國日益參與全球事務及其日益依賴於國際貿易和自然資源的進口，使得中國在全國範圍內對發展一支遠洋海軍的興趣不斷增長，這支力量可使中國能夠在國際海洋問題上發揮國際領導作用，包括在人道主義救援行動和維持全球秩序方面，並使中國能夠保護其海外經濟利益。因此，中

¹²⁸ 關於權力轉移的經典著作，參見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也可參見Jack Levy,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¹²⁹ 資中筠，*戰後美國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頁118。

¹³⁰ Roy Kamphausen, David Lai and Andrew Scobell eds., *Beyond the Strait: PLA Missions other Than Taiwan*,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 S. Army War College, 2009.

國自2008年後期參與在索馬里附近打擊海盜行動是中國海軍發展軍事行動能力和後勤能力的一個更大過程的組成部分，這將使中國海軍以更複雜的方式、在更長的期間內展開遠洋行動。¹³¹

與中國擴大海洋興趣相伴隨的是中國的大眾民族主義不斷增強。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正通過訴諸大眾對國家成就的自豪感，包括發展航太工程、舉辦2008年奧運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機場以及製造大型噴氣式客機來對國內不穩定(包括對失業、腐敗、不平等和環境惡化的廣泛不滿)做出反應。在軍事方面，中國媒體大力宣揚了中國在亞丁灣打擊海盜行動中做出的貢獻，也廣泛報導了2009年為紀念中國海軍建軍60周年而在東海舉行的海上閱兵式。2009年10月1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紀念日，中國舉行了它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閱兵，廣泛展示了中國的先進武器裝備。¹³²

中國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崛起伴隨著中國對修正東亞大陸的地區秩序的要求，這只是挑戰了次要的美國地緣安全利益。與此不同的是，假如中國正在呈現的發展海上力量導致中國的第三次崛起，它將構成對中美合作的嚴重挑戰。首先，中國若要實現第三次崛起和獲得要求修正地區秩序的能力，就需要發展能夠進行遠洋兵力投放的海軍。但自二戰以來美國已經認識到它的國家安全要求它擁有對所有其他國家的海上優勢。在80年代，美國已經打造了600艘艦艇海軍，並準備與蘇聯展開以海軍軍備競賽作為對蘇聯海上力量有限發展的反應。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將表明其國防政策的趨向，它同樣可能招致美國對中國意圖和能力的更大擔憂。

其次，美國自20世紀30年代起就認為，東亞海域不受該地區大陸國家的控制是維持東亞權力分配關鍵，與美國的安全利益相一致。美國與日本在二戰前的衝突以及美國在東亞介入冷戰表明，美國對防止任何一個國家同時控制東亞大陸和海域有持久的興趣。這一戰略觀在艾奇遜1950年1月對美國防禦圈的界定中得到了表述。¹³³美國將很可能把中國的第三次

¹³¹ 唐世平，塑造中國的理想安全環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134。

¹³² Robert S. Ross, 「中國崛起、地區權力轉移與東亞安全，從1949年到21世紀」，*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11期，頁42。

¹³³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崛起和中國不斷發展更強大的海上力量看
做是對美國至關重要的安全利益的挑戰。

最後，正如一支強大的海軍和航空母艦對於中國人而言是正在形成的大國地位的象徵一樣，對於美國人而言，海洋中的主導地位是美國大國地位的象徵。隨著中國逐步發展海軍力量，中國將可能挑戰美國人對美國利益的看法並招致美國民族主義，因而促使美國防禦政策的政治化。美國民族主義將加劇華盛頓應對中國第三次崛起所構成的對國家安全方面的挑戰。

中國領導人面臨的當代外交政策挑戰是如何把握中國權力的第三次崛起。一方面，與1949年之後兩次中國的崛起相比，中國在21世紀初的崛起應該是最容易管理的。中國已經取得了它最重要的安全目標——整個周邊地區的邊界安全。¹³⁴因此，中國領導人應當能夠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崛起，並採用和平手段實現其地區範圍內的目標。

(三) 台海問題

觀察過去三十年美國六任總統對華政策變化的記者邵培德 (Patrick Tyler)，在結論中這麼說：「下一任美國總統將面臨柯林頓上台之初所面臨的相同問題——一個威權式的中國，一方面力圖改革和發展經濟，一方面卻依然對企圖透過民主和人權運動推翻中國統治偏執如故的中國；一個企圖透過和平手段統一台灣，卻擔心美國放任兩岸從事武器競賽，從而增加戰爭風險的中國。新總統將面對中國的複雜性，他得做每一位前任總統所做過的決定，要不要對抗中國」¹³⁵。

「台海問題」始終是美中關係中極其敏感和「重中之重」的議題。回顧歷史，自國共內戰逐漸接近尾聲之時，美國政府逐漸對台灣的前途產生憂慮，並認為一

¹³⁴ Robert S. Ross, 「中國崛起、地區權力轉移與東亞安全，從1949年到21世紀」，*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11期，頁43。

¹³⁵ Patrick Tyler 著，聯合報譯，*中美交鋒*，（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年2月），頁519。

旦台灣為共黨所統治，將對美國國家戰略安全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¹³⁶。因此，在長達四十年的東西冷戰時期，台灣成為美國圍堵共黨主義的重要一環。惟在七〇年代，尼克森總統推動「聯中抗俄」的戰略下，美中關係逐步正常化，並於七八年雙方正式建交。自此之後，美國的台海政策大致係由幾個重要支柱所架構起來，包括一個中國政策、和平解決、不作調人、兩岸對話交流，以及柯林頓政府後期所提出的「尊重台灣民意」等。這些看似明確的政策立場，事實上都存在著模糊的政策空間。事實上，美國所奉行的「一中政策」是建立在美中所簽訂的三個公報（上海公報、建交公報與八一七公報）的基礎上，然而這三公報對「一個中國」的定義只提供原則性的陳述，並存在著相當模糊的空間。但北京方面卻經常不斷以最嚴謹的方式來定義及詮釋這三個公報，作為試圖左右美國對台關係的重要機制。換言之，所謂的「一中原則」被北京視為中美關係的基本核心，而華府則強調其所謂的「一中政策」，兩者之間的細微差異，這種操作模式正是美國作為兩岸平衡者，能同時與兩岸政府發展關係並發揮影響力的模糊空間所在。然而，不可諱言的，大部分的美國總統均依循中共的期待，對於三公報做出較為嚴格的解釋，並自我限制對台關係¹³⁷。更有甚者，柯林頓總統 1999 年在上海所宣示的「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加入以主權國家為要件的國際組織），即是美國向中方立場傾斜且對我極為不利的政策調整。

小布希政府上任後對兩岸的政策是採取「戰略清晰」的原則，亦即美國明白表示反對中共對台動武，也不支持台灣獨立的「台灣不獨、中國不武」的立場。前國家安全顧問，也是現任的美國國務卿萊斯闡釋美國的兩岸政策就是維持現狀不變，反對台海任何一方採取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作為。另一方面，小布希政府逐漸改變以往美方自我設限及向中方傾斜的立場逐漸出現有利於台灣的樂觀發展¹³⁸，展現有意調整對台之現行作法的趨勢。具體而言，其作為包括（1）正視台

¹³⁶ 1948 年，美國參謀聯席會針對「台灣如失陷於共黨主義將對美國戰略安全產生何種影響」進行研究，並得到上述之結論。為防止此一局勢的產生，美國政府採取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防止台灣為共黨所統治的策略。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頁 789。

¹³⁷ 例如台美雙方高層的往來幾乎不存在，台灣的外交部長不能前往華府，台灣想採購部分高科技武器裝備也為美方所拒絕。

¹³⁸ 如批准台美 1979 斷交以來最大宗的對台軍售，其中包括 4 艘紀德型驅逐艦、12 架反潛機及 8 艘潛艇；解除許多我政府高層訪美或過境美國的限制、同意我國防部長湯曜明參加台美軍事會議，以及陳總統兩次過境美國的待遇提升。

灣經驗的意識型態意涵，肯定「民主台灣」的形象，(2)謹慎並有限度的接受台灣對國際生存空間的要求，(3)強化台灣「可靠的戰鬥軍力」，提升美台軍事合作，(4)從「固盟」的立場出發，不把「台灣問題」作為對中國談判的籌碼，(5)以中國針對台灣的軍事準備，尤其是大陸東南沿海的飛彈部署為由，突顯「中國威脅論」¹³⁹。針對華府這些友台的動作，中共當局當然感到不滿並提出抗議，惟華府僅以上述作法均符合中美三公報來加以回應；而布希總統 2002 年首次訪中時更公開表示，美方遵守台灣關係法中對台灣的安全承諾¹⁴⁰。更值得重視的是，布希在 2002 年江澤民訪美期間，曾明確表示美國的一中政策是以三公報和台灣關係法所構成，換言之，美國所謂的一中政策的基礎，除了對北京較為有利的三公報之外，華府更透過強調台灣關係法來加以平衡。

中國方面，對布希政府明顯傾向台灣的政策走向頗感不滿，外交部曾公開宣稱美方的作為「對中、美關係造成破壞性損害」。「九一一事件」後，面對美國領導世界地位的更加鞏固、對華嚇阻戰略的漸進清晰，美台關係的逐步強化，中國的總體反應可以說謹慎低調，被動防禦。中國內部對如何因應此種情勢發展曾提出辯論，大致可區分為三種意見¹⁴¹：(1)加強鄧小平的「先辦好自己的事」的戰略觀，以及兩個「寄希望」，立足於「等」。(2)強調「依靠自己的實力與決心」的戰略觀，亦即軍事準備，立足於「打」。(3)強調「要有戰略耐心來轉化兩岸關係」，以及營造長期優勢，立足於「磨」。由中國相關智庫人士及學者的看法，第三種意見似有成為中國對台政策的主流意見。惟自胡錦濤於 2003 年起逐步掌握權力後，中國對台政策又有新的變化。在所謂「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的軟硬兩手策略下，中國方面採取矛盾辯證的思維來處理兩岸關係。2005 年 3 月，胡錦濤提出「胡四點」¹⁴²，除堅決反對台獨外，亦強調寄希望於台灣人民。2005 年 3 月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的「硬」作為後，中國為弭平國際社會的疑慮，以及台灣內部民意強大反彈，中國釋放一系列對台懷柔作為，如邀我在野黨領袖訪中，開放台灣水果銷往中國大陸等，顯示其「軟的一手」策略的操作。美方對於

¹³⁹ 董立文，唐開太，**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台海局勢**（中華歐亞基金會、改革開放論壇合著，民 92 年）頁 178。

¹⁴⁰ 事實上，布希對台灣的安全多所關注，例如 2001 年 4 月 25 日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即表示，將竭盡所能的協防台灣。

¹⁴¹ 董立文，唐開太，**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台海局勢**，頁 181。

¹⁴² 胡四點內容包括：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第二，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第三，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第四，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

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雖有所不滿，但並未形成雙方重大歧見。美方仍維持一貫政策，並敦促北京與台灣民選政府領導人對話。

綜合而言，美中在台灣問題上各有立場及利益。就中方而言，在處理該議題上，常面臨兩難的困境：若採取武力犯台，將使美、中關係惡化，進而破壞其國家戰略的大局；尤其面臨 2008 年奧運及 2010 年世界博覽會的舉行，中國內部的最高原則是「穩定壓倒一切」。但若不採取行動，台灣獨立又將對其安全戰略甚至統治基礎產生威脅。因此，胡錦濤所主導的對台政策主軸即在於「爭取民心，作好準備」，為自身的戰略決定保持彈性，因應可能突發的情況；並改變以往「促統」的對台政策主軸，而朝向「反獨」的方向發展。

至於就美方而言，其面對中國仍採取經濟交往及軍事圍堵的兩手策略，其目的在於既能維持其強權的地位，又要大陸經濟發展的利益，台灣的戰略利益即成為美國對中國交往的可運用的籌碼。因此保持兩岸分治的現狀，將有助於保持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戰略利益。是以，雖然美中兩國在台海地區的戰略利益和目標不儘相同，但維持台海現狀穩定成為雙方基本的共識，並符合雙方現階段最佳的利益。因此，近年來，中美逐漸形成處理台灣問題的默契，中方為避免激怒台灣內部的反彈，使兩岸關係日益疏離，而採取「拉美制台的策略，企圖由美方來壓制台灣種種走向獨立的作為。而美方為了維護自身所界定的台海現狀，也對陳總統的相關作為，如正名、制憲、公投等諸多作為進行壓制，避免擦槍走火，引起中國的誤判，導致區域情勢緊張。美中的處理模式雖然離所謂「共管台灣」仍有頗大的距離，但不可諱言的，雙方在此議題上的確已形成一定程度的默契。

第四節 小結

回顧九十年代以來中美關係的演變，不難發現每當中美關係面對危機或突發事件時，兩國的「敵人意向」都會不同程度的啟動。¹⁴³這不利於危機的解決和兩國的合作。在全球化時代，中美要在應對共同威脅、維護共同利益中，塑造有利於合作的新的認同，至少也應避免敵人認同的出現。

首先，中美軍事與安全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避免雙方發生軍事對抗或軍事衝突，以及維護地區穩定，這使得合作的深度和主動性都不強。隨著新問題和新威脅的出現，有充實中美合作的內容、拓展合作的領域。在軍事合作中，除繼續增強透明度、功能性交流和互訪外，美國應放寬對華軍事技術出口管制。

其次，近年來中美之間形成了多層次、多領域的對話和協商機制，如首腦會晤、戰略對話、防務磋商、戰略經濟對話等。許多機制尚處於初始階段，如何加強各種機制的制度化建設，從而穩定中美合作提供制度化保障，避免合作受兩國政治關係和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擾，應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此外，還應加強中美日、中美俄、中美印三邊戰略安全對話，以消除疑慮、增強信任。過新安全觀規範中美安全合作安全內涵的擴展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凸顯，要求人們對安全合作的模式進行新的思考。中美如果能以平等互利和共贏的理念來規劃中美安全合作，有利於緩解中美的安全困境為中美穩定的安全合作提供基礎。

最後，針對複雜的台灣問題，中美之間必須思考此一問題的本質與意義。從理論上來說，針對台海情勢，美國遏制中國三大難題尚未解決：（一）、中國不可能被遏制？（二）、中國可不可以被有效遏制？（三）遏制的後果與影響可否控制？

¹⁴³ 王輯思、徐輝：「.中美危機行為比較分析」，*美國研究*，2005 年第 2 期，頁 27~ 29。

關於第一個問題，美國相關的研究答案是否定的，只要台灣宣佈獨立，則中國是不可能被美國的優勢軍力所遏制的¹⁴⁴。第二個問題比較複雜，分三個層面討論：（一）有效遏制中國到最後需要大規模的核子武力，但這個選擇對美國來說既不切實際，也不適用於中小型的衝突¹⁴⁵。（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八次對外用武的案例研究顯示，中國有可能不顧損失在台海問題上對美國發動有限的先制攻擊¹⁴⁶，（三）從戰略競爭者的角度來看，由於政治考慮及認知的問題，中國有可能發展不對稱戰略挑戰美國的安全利益¹⁴⁷。

第三個問題是環繞在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理論展開討論，過去那種討論相互錯誤認知使衝突情勢呈螺旋式上昇，而其發展是沿著「領土爭議」→「軍事手段」→「軍備競賽」→「安全困境」過程進行的安全困境概念¹⁴⁸，並不適用於台海局勢，因為從某種程度說，「台灣問題」是台灣政治認同而不是中國擴張領土的問題；中國的武力不但用來遏制台獨，也可以用來違背台灣的意願達成統一；相同的，美國與台灣共同努力遏制中國的武力統一，也可以被中國看作是為台獨創造保護條件。所以台海局勢問題與傳統的國際安全困境不一樣，是更難解的安全困境¹⁴⁹。

換言之，針對台海特殊的安全困境，如果美國的目標是避免與中國開戰，而不是在戰場上打贏中國，亦即過去中國對台灣的宣傳所說的「準備打是為了不打」，那麼美國對中國實行單純的遏制政策是不可能達到這個目標，因為遏制取決於實力與決心，它的困難在於，如何避免太軟弱使目標國有機會剝削，又不會太強硬使目標國感到挑釁¹⁵⁰。

¹⁴⁴ Thomas J.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No.4 (Spring 2001) ,p.38.

¹⁴⁵ Abram N. Shulsky, “Deterrence Theory and Chinese Behavior,” RAND, 2000, pp.45-47.<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161/>

¹⁴⁶ Allen S. Whiting, “China's Use of Forces,1950-1996,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No.2 (Fall 2001) ,p.131.

¹⁴⁷ 同註 28，頁 11 及 18。

¹⁴⁸ 對於亞太安全困境過程的分析，請參閱 Thomas J.Christensen,“China,The U.S.-Japan Alliance,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Spring 1999), pp.49-80.；Gerald Segal,“Networked Security:Why We Do Not Need A New Framework For East Asian Security”,*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Vol.XII No.2 (Summer/Fall 1998) pp.488-505.

¹⁴⁹ Thomas J.Christensen, “The Contemporary Security Dilemma:Deterring a Taiwan Conflict”,*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5:4, (Autumn 2002) ,p.13.

¹⁵⁰ Peter Hays Gries；Thomas J.Christensen, “Correspondence:Power and Resolve in U.S. China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No.2 (Fall 2001) ,p.161.

針對這個問題，中、美雙方的學者出現有些交集的建議方案，即都提出了相互保證不威脅對方國家的核心利益的建議，美方學者主張對中國的有效遏制必需混合「再保證」的策略，說服中國，台灣獨立不符合美國自己國家安全利益，甚至提出可以使美國民眾接受而中國也相信的積極性論證，即民主台灣（做為中國民主政治的一種形式）有助於中國政治自由化，亦有利於美國的長遠利益，這稱為「偏民主的再保證策略」（pro-democracy reassurance strategy）¹⁵¹。中國的學者則主張「相互戰略保證」，中國可以向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證是：（一）不排斥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存在，（二）不尋求主動突破世界格局，（三）中國統一不會威脅美國的海上優勢¹⁵²。

對於以上這些學者的建議，討論的重點可能不在它的具體內容可行性及可信度為何，而是相互保證策略是不是美國對中國遏制的必經之路，如果是的話，那麼美、中兩國就必須去辨認對方的核心利益，並且提供可以付出給對方的安全保證，而無論這些保證的內容是什麼，對於美國而言首先就需要穩定的美、中關係，如此安全保證才得以可能，那麼美國對華戰略仍需在遏制與接觸中求平衡，而美、中關係如果朝這種方向發展，對台、美、中三邊關係及兩岸關係的意義又是什麼？

回過頭來看現實問題，中美關係的定位問題仍是決定雙方關係未來走向的基本因素，中國在處理對外關係時，最重視的仍是所謂的「基本框架」問題，尤其是大國關係的基本框架，中國與俄國有「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與日本有「中日友好合作夥伴關係」，與歐盟有「建設性的夥伴關係」，曾經與美國柯林頓政府有「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中國「大國外交」的一項特色，有了這個基本框架後，中國就可據以要求對方遵守、體現或擴大這些原則，中國的外交利益由而實現。

¹⁵¹ 同註 33。頁 19。

¹⁵² 唐世平、曹筱陽，「尋求中、美、日相互安全的基點」，《戰略與管理》雙月刊，2002 年總第 50 期，頁 105。

第四章 胡錦濤時期中美經濟安全關係之競合

第一節 貿易逆差與美中關係

冷戰結束初期，經貿問題一直與中美關係中的其他問題纏繞在一起，互相促進，交互制約。在後冷戰最初十年內，尤其是在最初五年裡，華府和北京都認為，日益加強的經濟聯繫將構成在人權問題上影響對方的手段。許多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利益團體依據這樣的假設行事：經濟制裁或制裁威脅以及北京對美國出口市場的日益依賴，可以作為促進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北京方面則不贊同此一觀點，認為中國龐大的經濟潛力可以影響華府的方針。儘管如此，在一些經濟糾紛和不擴散問題的爭端中，經濟槓桿成為華府爭取中國讓步的有力工具。換言之，在此時期中，經貿雖是維繫兩國關係的黏著劑，但經濟議題的重要意義已超出只求雙方經貿實益的範圍¹⁵³。

一、中美貿易逆差的現狀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 年以來，中美貿易之間美國開始出現逆差，1993 年逆差額為 63 億美元，2009 年逆差額為 1142.6 億美元，2009 年的逆差額是 1993 年的 18.1 倍。期間僅有 2001 年和 2009 年兩年逆差額較上一年有所縮小，其餘年份逆差額一直以較大的幅度增長。¹⁵⁴

深入而言，就經貿結構來看，中美雙邊貿易自兩國建交後出現較發展態勢內容，雙邊貿易額從 1979 年的不足 25 億美元迅速增長到 2010 年的 3853.4 億美元，增長超 150 倍。據中方統計口徑，2010 年中美貿易額占中國當年外貿總額的 12.96%，對美進出口額分別占中國進口總額的 7.32% 和出口總額的 17.95%，美國僅次於歐盟位列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2010 年中美貿易順差為 1812.66 億美元，在當年中國貿易順差中的占比高達 99.0%。據美方統計口徑，2010 年美中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 4568.2 億美元，美中貿易額占美國外貿總額的 14.32%，對華進出口額分別占美國進口總額的 19.1% 和出口總額的 7.2%。美中貿易逆差

¹⁵³ 前美國貿易代表 Mickey Kantor 曾指出，貿易與國際經濟已經走到了對外政策的桌面上。柯林頓總統是第一位真正使貿易成為內政外交之間橋樑的美國總統。

¹⁵⁴ 王慧，「中美貿易逆差原因分析」，*價格月刊*，2010 年第 10 期，頁 19。

2730.7 億美元，占當年美國貿易逆差的 43.03%。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¹⁵⁵

從投資方面看，美國是中國的主要投資來源地，在 2010 年對華投資前十位國家／地區排名中，美國以 40.52 億美元的投資額位列第五。2010 年美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 1576 家，同比下降 0.76%；實際投入外資金額 40.52 億美元，同比增長 13.31%。中國已成為眾多美國企業全球利潤的最大貢獻者，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最嚴重的 2008 年和 2009 年，仍有超過 70% 的美國在華企業實現盈利。

從金融領域看，中國成為美國巨額財政和貿易赤字的重大平衡者，其持有的大量美元資產為美國國內投資和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截至 2010 年末，世界其他國家所持有的美國國債總計 43726 億美元，其中中國的美國國債持倉量為 8916 億美元，雖較上年減持 32 億美元，但占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國國債的比重為 20.4%，仍為美國國債最大的持有者。¹⁵⁶

美國認為是人民幣幣值低估導致了美中之間巨額的貿易逆差。近年來，美國多次要求人民幣升值。美聯儲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稱中國低估幣值是為了支援出口導向型政策，聲稱如果中國採用一個更為靈活的匯率政策，則能解決中國的通脹和經濟中的泡沫，使不平衡的世界經濟達到平衡。¹⁵⁷美國占最大投票權的 IMF 在它的半年世界經濟展望中提出，中國等國家積累了過多的貿易順差，如果提高幣值，同時採取擴大內需、完善金融市場的政策，則會減少順差，同時不會影響經濟的增長。中美貿易逆差問題隨著雙方貿易的迅速發展呈現出擴大趨勢，並受到美國當局的廣泛重視。

¹⁵⁵ 「中美經貿關係中的分歧與共贏」，中評社，網址：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6/9/9/1/101699137.html?coluid=148&kindid=0&docid=101699137&mdate=0520001511>（點選日：2011 年 5 月 22 日）。

¹⁵⁶ 同前註。

¹⁵⁷ 同前註。

二、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一) 美國寬鬆性的經濟政策，導致消費過高，儲蓄不足

美國經常項目巨額逆差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的國內政策。一方面，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了美國消費過高、儲蓄不足。2001年以來，美國為刺激經濟增長而採取的超低利率政策導致美國的儲蓄率不斷下降，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間，美國個人儲蓄率大多維持在1%以下，超低利率政策也刺激了投資支出擴張，個人收入和資產價值快速增長，提高了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實行減稅和增加開支的財政政策也加劇了經常賬戶逆差。另一方面，美國出於自身利益對國際分工和貿易格局施加影響。其一，美國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再將產品由這些國家出口到世界各地；其二，美國在大量進口消費品以滿足本國市場巨大需求的同時對出口設置各種障礙，阻止本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導致美國巨額的商品貿易逆差。¹⁵⁸

實現全球經濟的再平衡，需要各國共同來承擔調整責任。只有各個經濟集團之間開展積極的政策配合和協調，全球性不平衡的調整才能有序釋放。就中國而言，未來中國將改變以投資和外需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著力擴大內需，促進服務部門的私人投資，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美國而言，應當改變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結構，採取措施增加國內儲蓄，確保長期財政可持續性，並放寬對中國出口限制。

(二) 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必然導致中美貿易失衡

中美兩國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中國不得不更多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出口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目前中國平均工資只有美國、日本的3%左右，低工資造成中國產品成本低、價格低，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低技術產品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帶動了出口增長，而這些出口產品多數是美國自身結構調整在減少或不願生產的領域。美國近年來經濟增速下滑，但對於中國商品的消費並沒有減弱，故而擴大進口，所以會大量進口，質優價廉的中國產品正好滿足了當今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美國的需求，使美國廣大消費者受益。

¹⁵⁸ 尚耿，「從結構與制度視角解釋中國匯率政策和外部經濟失」，*國際經濟評論*，2007，第7-8期，頁18。

兩國間進出口商品結構也反映了互補的現實。中對美大宗出口的產品都是勞動密集型的，而美對華產品出口明顯屬於高技術設計與行銷為主的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以及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農產品。近些年中國對美出口的產品結構表面上有了明顯優化電腦通信等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份額顯著上升，但中國只是從事高技術產品的加工製造環節，而美國從事的則是高技術中的高端產品以及設計和行銷，屬於產業內及產品內分工，因此中國對美出口實質上仍然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這種分工是產業鏈的內部分工，在利益分配上高端產品和設計行銷總是拿大頭，而低端產品和加工製造則只能拿小頭，因此中美貿易推動了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可見，兩國貿易是優勢互補的分工合作，即使在高技術領域，中國出口日益上升，但同美國之間根本不是在同一個水準上的競爭關係，而是優勢互補的關係，是雙贏而不是零和。進而說明中美貿易之間存在的逆差只是一種產業結構的及產業分工的經濟表像上的必然。¹⁵⁹

進一步分析，90年代初期，中國開始大力發展加工出口貿易，中美貿易順差開始出現。日本、韓國、香港、臺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和規避與美國、歐盟的貿易摩擦，紛紛把與歐美貿易摩擦較大的產品組裝工序轉移到中國大陸，並在大陸設立了大量的外資企業。中國則從東亞等國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半成品經過加工、組裝後依賴原有的銷售管道再向美國、歐洲等傳統市場出口。在對外貿易中，各國對進口商品的原產地認定以「實質性改變」為原則，加工產品的出口國就從上述國家和地區轉移到了中國。¹⁶⁰

在此背景下，中美的貿易順差是從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而來，由於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不斷地把生產轉移到中國大陸，中國輸美產品只是取代了原先東亞和東南亞對美國的出口。因而，國際產業轉移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美貿易順差。美國產業結構內部調整使得與出口和國內消費相關的產業萎縮嚴重，非出口的服務業占主導。由於在生產性創新方面投資短缺，效率下降，加上人工成本高，美國在消費品製造方面已不具備生產優勢，只能依賴大量進口，中國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日常消費品，也使得中美貿易差額擴大。¹⁶¹

¹⁵⁹ 孫滔，人民幣升值與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天津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頁2。

¹⁶⁰ 李稻葵，「中美貿易順差：根本原因在哪裡」，國際經濟評論，2006，頁05。

¹⁶¹ 高永富，「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及其解決途徑研究」，國際貿易，2009，頁2。

(三) 中美兩國的貿易結構決定了雙邊貿易的不平衡

美國的優勢在於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而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由於美國向中國的進口以生活必需品為主，需求彈性較小，美國經濟增長帶動中國出口增加的效果顯著，能有效擴大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高科技產品的需求彈性較大，隨著日本、韓國、台灣以及中國大陸等高新技術的發展，美國的高科技替代產品逐漸增多，因此，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反而降低了對美國進口商品的依賴，從而也放大了中美貿易順差。

(四) 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與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國際貨幣有關

美元作為世界主要的國際貨幣，不僅要滿足世界各國在貿易清算、債務清償和國際儲備等方面的流動性需要，還要維護美元幣值的穩定。美元流出必然導致國際收支逆差，然而長期逆差又威脅到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這是所有國際貨幣都不可避免的「特裡芬難題」。¹⁶²隨著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擴大，全球對美元的需求日益增多，美國貿易赤字必然加大。¹⁶³

(五) 美國出口管制加劇了雙邊貿易不平衡。

美國長期對中國單獨實施的出口管制嚴重束縛了美國的出口能力。美國在大量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卻嚴格限制高新技術及產品的出口，使得美國對華比較優勢難以發揮，這必然會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加劇。2007年，美國專門增加了包括電腦、航空航太民用技術、數控機床和積體電路設備在內的47個出口管制專案，迫使中國消費者向日、韓等國尋找進口替代產品。近年來，雖然中

¹⁶² 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裡芬(Robert Triffin)在其《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兌換的未來》一書中提出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著其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由於美元與黃金掛鉤，而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雖然因此而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但是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澱，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與堅挺，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個兩難困境。」這一內在矛盾在國際經濟學界稱為「特裡芬難題(Triffin Dilemma)」正是這個「難題」決定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不穩定性和垮臺的必然性。

¹⁶³ 孫磊，趙國欽，「解析美國儲蓄-投資缺口與貿易逆差的關係」，黑龍江對外經貿，2007，頁12。

國高技術產品進口快速增長，但自美進口比重卻從 2001 年的 18.3% 下降到 2009 年的 7.5%，如果仍按 2001 年的進口比例推算，2009 年美國對華出口至少損失 330 億美元。

（六）人民幣匯率在一定程度上的被低估。

這個問題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過程都是可以證明的。理論上以上七條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可以證明。實踐過程中，如 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也曾因匯率問題向德國和日本施壓，迫使兩國的貨幣大幅升值，但這並未改變德國和日本一直維持對美國巨額貿易順差的現實。“廣場協定”簽訂後不到三年，日元兌美元名義匯率升值約 110%，而同期美國貿易逆差卻增加約 70 億美元；1990 年至 1995 年，日元兌美元升值約 90%，同期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約 650 億美元，漲幅約 60%；1998 年至 1999 年，日元升值約 40%，美國貿易赤字增加 1000 億美元；截止到 2008 年，美國對德國仍然逆差 429 億美元，對日本逆差 726 億美元。事實證明，日元升值並沒有使美國巨額的貿易逆差得到改善，反而使美國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¹⁶⁴

三、貿易逆差下的中美關係：以 2006-2007 年政策互動為例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增長，90 年代後期，中美貿易額迅速增長，成為雙方關係發展的主軸，而經貿議題已逐漸與其他如人權、不擴散或其他議題掛勾，回歸到雙方經貿實質利益的討論。但美中在經貿議題上是既合作又衝突，如最惠國待遇的審查問題¹⁶⁵，就曾為雙方經貿關係發展過程中的爭議焦點。中國大陸剛加入 WTO 之際，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發展有一相對平穩的時期，但近年來由於兩國貿易政策的變化與貿易額的增加，使得兩國貿易摩擦不斷出現，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爭議焦點圍繞在雙邊貿易不平衡、紡織品配額、知識產權保護、反傾銷案例產生、對中國大陸入世承諾履行的批評等方面。

布希政府就任以來，中美之間經貿議題在雙邊關係中所佔之地位越形重

¹⁶⁴ 高永富，「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及其解決途徑研究」，*國際貿易*，2009，頁 2。

¹⁶⁵ 雖然 1992 年柯林頓即決定將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審查與其人權問題脫勾，但每年最惠國待遇審查仍成為華府對中政策的大辯論，各方勢力競爭激烈。

要，尤其隨著兩國經貿往來日益頻仍，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增長十分迅速，且美國國內有不少民意認為來自中國的競爭是美國製造業衰退的主要原因，而這類民意將中國的競爭力歸因於中國本身各種不公平的作法，例如工資過低、惡劣的勞工標準、政府補貼和操縱人民幣匯率，使其無法依循自由市場邏輯運行等。他們要求美國必須對中國採取措施，布希政府面臨國內這種要求反制中國的強大壓力。因此，不僅高層官員經常就此議題進行磋商，雙方領導人（布希與胡錦濤）迄今 8 次的會晤中，亦將雙邊經貿議題視為討論的重點。美方認為，美中貿易持續失衡的原因，主要是在於中國官方操作人民幣匯率；採取企業出口退稅政策，對企業進行變相補貼；設置非關稅貿易障礙；對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力，導致仿冒問題猖獗。但布希政府為避免發生重大的政治紛爭與衝突，選擇透過對話管道進行談判，來化解雙方經貿議題的歧見，而非傾向於公開的衝突。因此，布希政府官員雖常向中方喊話，表達不滿，要求中方在雙方所關切的經貿議題上能有所作為，但仍多次否決國會要求其以制裁方式來解決美中貿易歧見的模式¹⁶⁶。

2006 年，布希在新日財政部長鮑爾森的建議下，向中方提出建構「戰略經濟對話」機制（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並為中方所同意。對美方而言，該對話機制是美中建交以來規格最高的經貿交流機制，也是美國政府在其國際經濟關係中建立的首個機制。對中國而言，「戰略對話機制」一詞，反應美中關係有所增進，並突顯出雙方關係之密切¹⁶⁷。同年 9 月，鮑爾森出訪中國大陸，訪問期間，除會晤該對話機制首次在北京舉行，鮑爾森與中國副總理吳儀共同宣佈成立「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在首次會談中，雙方主要關注的議題分別為市場開放、人民幣匯率、智慧財產權保障、能源利用等四項議題。首先，在市場開放議題方面，鮑氏此行最大目的之一是「如何幫助中國轉向更為自由和開放的市場」，其中包括資本市場」。但中國認為，在結束加入 WTO 的 5 年過渡期後，中國市場的全面開放，事實上已無須與美方再多作討論。中國自認其開放不乏有目共睹，作為一個經濟持續發展的發展鍾大國，不論從經濟安全或市場公平角度考量，中國要作的應該是公平地對外開放貿易和投資領域，美方當然有更多機會，但必須通過市場機制的競爭。其次，就人民幣匯率議題而言，鮑氏希望中國能在

¹⁶⁶ 如美財政部長鮑爾森、商務部長古鐵雷斯及貿易代表施瓦布曾於 2007 年 7 月底致函警告國會，通過立法懲罰中國將會損害美國及世界經濟。

¹⁶⁷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戰略』來之不易」，國際在線，2006 年 10 月 19 日。事實上，中方雖將雙方副外長層級的對話機制稱為「戰略對話」，但美方始終不願用「戰略」一詞，而是將其定位為「高層對話」（Senior Dialogue）。

此議題上有更多的努力及實質作為，但實際上，中方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所面臨的內部壓力可能更大，因為中方認為，「人民幣匯率是一主權話題，中國將站在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自主決定」¹⁶⁸。第三，就智慧財產權保護而言，美中雙方對此爭議在於實際執法成效上，鮑氏希望中國能拿出具體辦法，以期能更有效保護智財權；中方代表吳儀則表示，中國將繼續以負責任態度加強智財權保護，履行相關國際義務。事實上，對中國而言，美中在智財權上的爭議，主要焦點還是在執法問題上，因為中國內部即使在智財權法律體系上具備一定的水準，但在實際執行上則仍力有未逮。最後，就能源議題而言，吳儀表示將加強與美方之間的合作，共同維護國際能源市場穩定。美國能源部長博多曼則表示，希望和中方就確定中國石油儲備的原則而共同努力，中國不要隨意動石油儲備做為調節價格的槓桿。綜合而言，美中雙方在主要經貿議題雖仍有歧見，但雙方在首次經濟戰略對話期間，仍簽署幾項重大商務協議，獲得一定程度的成果，誠如中國總理溫家寶所言，此次雙方官員參加的規模及層級前所未有，反映出美中經貿關係是既競爭又合作的。

2007年5月22-23日，美中在華府舉行第二次「美中經濟戰略對話」。在此之前，由於美中貿易逆差創下新高，使得參眾兩院充滿保護主義的氣氛，對中國可說相當不利。在此氛圍下，中方由副總理吳儀率領代表團赴美進行對話，美方則係由鮑爾森主持會議。會中主要檢討第一回合對話中所達成之工作計畫的進度，並持續就包括處理經濟失衡政策、中國經濟發展及與世界貿易體系整合、進一步市場開放，以及在能源安全、環境與創新等方面的合作等。雙方延續前次對話的基礎，針對降低兩國貿易失衡問題、市場開放、人民幣匯率、智慧財產權及能源利用等議題進行討論。首先，就市場開放議題而言，美方關切的是中國有關限制美國公司進入中國金融服務市場的股權限制和監管規定，以及美中兩國全面開放航空業的談判。中方則同意恢復核發美國證券在中國大陸的營業執照，以及立即開放外資銀行在大陸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信用卡，使美國銀行可立即與中方銀行進行競爭等相關措施。至於航空議題方面，美中針對航空業談判達成了擴大兩國航權的協議。其次，就人民幣匯率議題而言，雖然美方希望在此議題有所進展，以平息來自國會要求制裁的壓力，但中方的開放幅度並不如美方所預期。第三，就智財權保護而言，美中雙方簽署「關於加強知識產權執法合作的備忘錄」，

¹⁶⁸ 「匯率：人民幣升值是中國問題並非中美問題」，中國網，2006年12月14日

其對雙方加強合作，共同打擊仿冒和盜版貨物在兩國間的流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後，就能源議題而言，雙方強調的是對於未來清潔能源之運用與技術。

綜合兩次會議的成果，該機制對解決雙方貿易歧見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也凸顯美中政經關係的錯綜複雜，仍有相當大的合作空間。就積極面而言，成立對話機制不僅反映出美中互動關係的強化與深化，同時亦有助於減少美中雙邊可能的經貿爭端。但由消極面來看，此機制的建立反映出美中在經貿互動的認知上出現嚴重落差，以及中國經濟體質令美國感到擔憂，希望藉此機制促使中國改善經濟體質。誠如，鮑爾森所言，美中雙方之間在政策上歧見並非針對改變的方向，而是改變的步伐。美中之間在兩國經貿對全球化經濟的影響上仍有根本的共識，並持續努力溝通予以達成。但不可諱言的是，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對兩國經貿議題仍有重大影響。尤其 2006 年美國期中選舉結果，民主黨贏得國會多數，在其掌控國會的情勢下，美國應在人民幣匯率議題上對中施壓，已成為兩黨在國會中的基本共識，這使得美中經貿議題更形錯綜複雜。中方也一再呼籲美方切莫讓政治因素影響雙方經貿互動¹⁶⁹，未來兩國在此議題上仍將維持既矛盾又合作的局面。

第二節 人民幣匯率與升值

一、人民幣匯率的商品貿易

(一) 中國出口與人民幣匯率

中美兩國貿易逆差主要來源為商品逆差。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占到了全部出口中的三分之一。從產品看，2009 年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中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的產品有，化學產品、紡織原料、機電與音響設備，出口產品的資本與技術含量較 2000 年有提高。但是，由於中國進口中資本與技術品零部件的出口比重較高，中國出口的升級更多的體現的是加工裝配環節的升級。從整體上看，中國出口的匯率彈性係數較高，人民幣升值將會對中國出口造成不利影響。同時，由於中國出口大多是低附加值產品，美國製造商不願意生產。提升人民幣匯率雖然導致對中

¹⁶⁹ 如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在 2007 年 8 月 21 日接見美國前國務卿奧布萊特時表示，強烈反對美方將一些局部、個別的經貿問題擴大化並實施貿易保護。不要讓政治因素干擾兩國經貿運作。

國進口的減少，但這部分減少的進口會轉移為對別的國家(如印度、馬來西亞等)產品進口的增加，且進口成本更高，而高出的成本最終將由廣大美國消費者承擔。因此，人民幣升值雖然會減少中國的出口，但也會造成美國更高成本的商品進口，中美商品逆差會轉移為美國對其他國家更大程度的商品逆差，對美國貿易逆差並沒有根本的改善。¹⁷⁰

(二) 美國出口與人民幣匯率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0年1-8月，中國自美國進口的前十大商品是大豆，積體電路，塑膠及其製品，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車輛及其零附件(不包括鐵道車輛)，有機化學品，雜項化學產品，廢紙和紙板，渦輪噴氣發動機、渦輪螺旋槳發動機等燃氣發動機，製造半導體器件等的機器及裝置、零件和附件。

從中國市場佔有率情況看，美國的渦輪噴氣發動機、渦輪螺旋槳發動機等燃氣發動機金額占我自全球進口同類產品的比重高達62.6%，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占45.3%，廢紙和紙板占43.2%，大豆占41.0%。而從美國的出口情況看，其對外出口大豆的45.7%、廢紙和紙板的52.8%銷往我國。

可以看出，美中國對華出口的產品價格彈性並不高，人民幣升值不會對美國出口有明顯影響。此外，美國在高技術和軍民兩用產品方面對華實行嚴格的出口管制，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10月18日，奧巴馬向國會提出「有條件解除對中國臨時出口C-130運輸機的部分禁令」，但遭到國會和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白宮方面也不再堅持。因此，在美國嚴重的國防疑心病下，放寬對華出口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綜上所述，由於美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低，再加上美國對華的出口限制，人民幣升值對改善美國出口影響並不大。

二、人民幣匯率與中美經貿關係

人民幣匯率與升值對於中美關係的影響，還是必須從前述兩國的貿易逆差結

¹⁷⁰ 劉韋志，綜析中美經貿現況與對雙邊關係的影響，*中共研究*，第43卷第8期，2009年8月，頁89。

構切入。對於華盛頓而言，人民幣的低估是造成兩國貿易逆差主要的自變數，帶是對於北京而言，兩國貿易結構的差異才是決定人民幣匯率的主要變數。這種因果互為導致的解釋才是造成人民幣議題主要衝突的來源。

進一步分析，美國與其它國家的雙邊貿易失衡一般較少令人關注，因為它們(逆差)被認為是自由市場力量的結果，但像美中之間這種的貿易失衡則通常被西方一些輿論認為是中國故意採取相應經濟政策的產物。加上聯邦預算赤字，美國經常專案逆差令經濟學家和外國投資者都倍感焦慮，他們擔心美國人將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對數額如此之大的債務償還本金和利。聯邦債務負擔的總額已突破 10 萬億美元，它已經對經濟增長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其嚴重程度將不斷加劇。¹⁷¹雖然匯率控制對促進中國出口是一種有效的手段，但這種政策操作始終讓中國的決策者造成了不小的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問題。簡單地說，保持人民幣的低值意味著中國的出口商品會比當人民幣價格由市場力量決定時更為便宜。結果是中國貨物在美國最嚴重的問題更便宜，而美國出口商品在中國更昂貴，這就為中國提供了有效的出口補貼，從而激勵美國企業將其生產遷移到中國。在其它市場上的美國出口商也遇到同樣問題，它們將在那些市場與低價的中國產品競爭。¹⁷²

國際經濟學家對人民幣價值低估程度的測算差異頗大。例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在 2008 年 7 月說人民幣相對美元依然價值低估約 30%，即便在 2005 年 7 月中國的匯率機制轉向「有管理的浮動」，以來人民幣已經升值了 18% 以上。¹⁷³相比之下，大多數發達國家允許其貨幣在公開市場上交易，只是偶爾幹預以期暫時影響短期的價格震盪。中國的一些亞洲鄰國也使其貨幣相對美元價值低估，以便在出口上保持與中國的競爭力。就像中國的政策操作一樣，香港、臺灣和馬來西亞過去也購買美元，力圖控制其貨幣的價值。

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未形成實質性的影響，將中美貿易順差問題歸咎於人民幣匯率並不合理。美國輿論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是造成中美貿易順差的根源，

¹⁷¹ TreasuryDirect (美國財政部公債局電子化系統之一)，「政府債務和持有者」，2008 年 10 月 7 日。

¹⁷² 鄒偉偉，*中美經貿關係的歷史發展與政策博弈*（西南財經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頁 42。

¹⁷³ William R. Cline and John Williamson，*基本均衡匯率的最新估計*，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政策簡報 PB08-7，2008 年 7 月。

但縱觀 2005 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出，在 2005~2010 年期間，人民幣匯率升值超過 20%，但是中美貿易順差額卻總體保持連年上漲態勢，中美貿易順差僅在 2009 年金融危機時期略有降低，2010 年則再度上升。由此可見，人民幣升值無助於減少中美貿易順差，匯率因素不是中美貿易順差問題的根本原因。¹⁷⁴

目前人民幣不存在大幅波動和變化的基礎，人民幣短期內對美元過快升值將帶來諸多風險，不利於中美以及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2010 年以來中國經常項目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顯著下降，國際收支向均衡狀態進一步趨近，勞動力、資源、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也影響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當前人民幣匯率與均衡水準相比並無太大偏差，不存在大幅波動和變化的基礎。相反，人民幣短期內兌美元過快升值將帶來諸多風險。其一，匯率在短期內過快升值將對出口型中小企業和就業帶來嚴峻挑戰。中國眾多出口企業平均利潤很低，人民幣升值將使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利潤降低甚至關門倒閉，在失業率飆升的情況下，國民總體消費能力將大幅下降，不但影響中國社會穩定，也將嚴重影響中國從美國進口產品，進而不利於美國的出口翻番計劃。其二，人民幣短期內對美元大幅升值將引發存量外匯儲備大幅縮水，使國民福利遭受損失。其三，人民幣對美元過快升值還將增強對亞洲區域貨幣整體升值的預期，進而激發短期流動資本的投機衝動，「熱錢」大進大出勢必影響亞洲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其四，人民幣對美元過快升值帶來的強大升值預期，將吸引大量海外資金進入，推高人民幣計價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可能進一步引發資產泡沫風險。

中國匯率改革似乎都體現了中國的政策目標：促進全球經濟平衡，未來中國將根據自主性、可控性及持續性原則，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中國並沒有借助人民幣匯率制度「攫取國際貿易的不公正競爭優勢」。事實上，在本次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許多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匯率卻保持基本穩定，為抵禦國際金融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亞洲乃至全球經濟的復甦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展示了中國促進全球經濟平衡的努力。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人民幣升值是必然，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會是一個長期的升值過程，絕對不能因為非中國內部的經濟因素，特別是不能屈從於美國政府或民間出

¹⁷⁴ 袁欣，「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探析」，*生產力研究*，2008，頁 24。

於政治目的或本國經濟圖謀的壓力而調高或調低人民幣匯率，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會給中國經濟帶來相當嚴重的損害。未來中國將根據自主性、可控性及持續性原則，並與中國經濟各方面的發展相協調，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當前確實存在激烈貿易摩擦和貨幣競相貶值的高風險概率，全球金融危機下不論是新興市場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新經濟增長點的捉襟見肘，激化各國刺激政策的同向競爭矛盾。一方面，受美國等傳統的全球最終消費市場面臨著嚴峻萎縮風險。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極度寬鬆的財金政策，加劇了凱恩斯刺激計畫後遺症——財政赤字風險和主權債務危機。時至今日，絕大部分國家已經缺乏充足彈藥繼續實施赤字計畫。危機以來利用政府赤字消費來抵禦私人部門需求萎縮衝擊的效應已經開始退潮。顯然，通過制定出口戰略爭奪海外市場成為了目前各國政策最後的稻草。

另外，在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商品所占的國際市場份額卻出現了淨增長，這無疑使中國成為了眾矢之的。一方面，由於人民幣匯率事實上的掛鉤美元，限制了美元相對於人民幣的貶值；而希臘等主權債務危機所帶來的歐元貶值壓力等則使得歐盟相對於美國對華出口具有了競爭優勢。因此，美國要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將最為突出，畢竟中國龐大的基建、產業升級投資所帶來的進口需求真是歐美競爭的焦點，如中國政府刺激計畫中的部分投資是國內企業無法滿足的需要從歐美乃至日本進口。

另一方面，中國更傾向於引進FDI和直接購買技術而非直接進口資本密集型商品的方式，則與美國政府當前的促進就業政策形成矛盾。對美國政府而言，直接對華出口資本密集型商品有助於美國國內就業，而通過引進FDI和直接購買技術的形式，直接或間接分享發達國家的技術外溢，從而助力中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顯然，中美在究竟是直接進口資本密集型商品還是引進FDI或直接購買技術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利益分歧。

第三節 金融風暴與美中關係

一、金融風暴衝擊全球與中國經濟

2008年美國經濟因為雷曼兄弟等銀行破產以及一系列的金融危機，導致世界各國在短短幾月之內遂捲入此一巨大風暴之中，全球的經濟也陷入停滯與蕭條。根據日本瑞穗證券公司的調查顯示，美國損失高達4.4兆美元，歐洲損失1.4兆美元；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全球經濟恐怕陷入1982年以來最大的衰退。2009年全球經濟成長率恐將降至1.3%。¹⁷⁵根據IMF對世界經濟衰退的定義（即增速低於3%），2009年世界經濟會步入衰退期。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全球貿易和投資活動會明顯萎縮，根據IMF的預測，2008年全球貿易增長率將由2007年的7.2%滑落到4.6%，2009年進一步下滑到2.1%。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估計，2008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資總額為1.6萬億美元，同比下降10%。而且，隨著企業倒閉失業人員增多，社會矛盾將更為加劇。國際勞工組織預測，全球失業人數將由2007年的1.9億人升至2009年底的2.1億人，貧困勞工將增加4,000萬人，全球性經濟衰退的風險越來越大。¹⁷⁶

由於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即與資本主義全球化進行生產要素的分工於結合，在充分利用外資與比較利益優勢的條件下，透過出口推動經濟成長且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在與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美國）緊密結合之下，加上中國經濟自身的內部失衡（過度依賴出口內需不足；儲蓄率過高欠缺效率化投資管道）。當經金融風暴爆發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必然受到衝擊，主要的表現形式在於出口衰退，經濟成長停滯與失業攀升。

二、金融風暴的性質及其理論性分析

從發展與蕭條的循環性關係來看，本次金融風暴屬於資本主義週期性或波浪性的經濟危機。許多學者對此都有深入性的分析，其中最著名的理論為「康得拉季耶夫循環」與「熊彼得技術創新週期理論」。俄國經濟學家康得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ff)整理了資本主義國家140年的生產數據，包括商品價格、利率、工資、國際貿易等經濟指標，以及主要原材料與能源的產量與消費量。最後他發

¹⁷⁵ 轉引張宏遠，全球金融風暴下的中國角色與定位，*展望與探索*，第6卷第12期，頁8。

¹⁷⁶ 斯琴塔娜，「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運行帶來的影響」，*中國鄉鎮企業會計*，頁12。

現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存在一個長達 40-60 年不等的週期波動，包括 20-30 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的上升階段與 20-30 年經濟相對停滯的下降階段。¹⁷⁷從「康得拉季耶夫循環」的假設來看，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週期已經進入了停滯下降的開端，金融風暴只是這個長波段的開端而已。

其後著名經濟學者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從創新的角度延伸了經濟發展的週期理論。他認為，技術創新在時間序論上不是均勻分佈的，而是類似波浪的形式存在。技術創新的浪潮與經濟增長的週期性波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也並非簡單地伴隨技術與制度創新，而是這些創新直接推動，所以創新頻率的高低起伏是長週期的內生性動力。¹⁷⁸由「熊彼得技術創新週期理論」的假設而言，美國與世界經濟週期已經進入資訊產業長週期的末端，在經濟全球化與後福特主義的驅動下，美國已將大浪的製造業轉移到國外，短期之內不能有剩餘的技術創新項目與投資潮，華爾街的金融資產資深欠缺足夠的實體經濟作為槓桿。在週期性的循環過程中，切缺技術創新的誘因與實體經濟的式微是金融風暴發生的基礎。

從「治理」（governance）與「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角度而言，¹⁷⁹主要因為布列敦森林體系（Brenton Woods system）崩潰解體以來，全球再也無法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建制；全球化在不斷深化之同時，由於欠缺有效的治理結構與一致性的價值共識下，一旦全球市場與政府同時發生失靈效應，將會出現骨牌式的巨大危機風險。若補充霸權穩定論（Hegemony）的論調，¹⁸⁰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秩序，主要是建立在美國國家利益與對資本主義世界領導的企圖上，作為一個善霸，美國積極建構了許多國際經濟建制同時提供甚多經濟公共財。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後，美仍繼續充當國際貨幣功能，但是當美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全球金融危機隨即而來。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外部責任與內部經

¹⁷⁷ 李連仲，長波理論與世界經濟發展，*探索*，第 3 期（重慶：2000 年），頁 13。

¹⁷⁸ 劉輝鋒，長波理論研究論評，*江西社會科學*，第 5 期（江西，2004 年），頁 16。

¹⁷⁹ 有關治理（governance）的意涵，我們可以從下的觀點理解江西。對經濟的運作的研究，不只是面對想像的市場機制，或國家的政策，而是將與社會各種機制之間的統理（governance）關係聯繫起來。所謂的統理機制在此是指主導（govern）和協調經濟體系內法人機構的經濟活動，以面對資源稀有性和複雜性的問題，使市場活動產生秩序與效率的各項制度而言。因此，經濟統理機制的目標在於有效地和逐步地調整經濟或非經濟的活動，以及他們與外在環境之間的關係，使得經濟活動常態化。

¹⁸⁰ 霸權穩定論學者將經濟學中有關於「公共財」的概念，應用在國際關係中有關霸權國家之所以存在，以及為何存在作出瞭解釋以及說明。所謂「公共財」在經濟學中意指這種商品是一般人在消費此種商品時，並不會減少其他消費者獲得這個商品的數量，例如道路、路燈、人行道等等¹⁸⁰，但是由於免費的消費者太多，所以必須有一個機構負責提供這樣的公共財或是強迫消費者付費以維持公共財的提供。相關論述可參閱 Charles.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2 (June 1981) ,pp.242-259

濟如果出現高度的不均衡（內部經濟發展停頓，外部責任無限），將更加劇治理失靈效；換言之，美國經濟失衡的問題實為此組命題的關鍵。美國國內的儲蓄率偏低，長期對外貿易處於逆差。逆差已經占國內 GDP 達到 6% 的水準，這些逆差主要靠印刷美元處理。相對於美國經濟失衡的結果，其他新興工業國家面臨的則是「美元過剩」的問題，這些剩餘儲蓄必須尋找適當的金融資產進行投資，這也為美國華爾街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創造與泡沫化提供了條件。

就「全球互賴」(interdependence) 的觀點而言，經濟全球化帶來了相賴依賴的現象。當互賴關係建立後，國家之間就會出現某種程度的相互牽制，對此反應將更為敏感，因此出現了敏感度 (sensitivity) 與受損度 (vulnerability) 的後果。¹⁸¹ 本文針對金融風暴的外擴效應與近期美中的經濟互動關係的解釋，大致是從這樣的觀點出發。進一步而言，美中為世界第一與第三大經濟體，分別代表已開發國家與發中國家，由於雙方在現代化近程處於不同階段，產業結構與市場需求可形成互利與互補，雙邊貿易已由建交初期 (1979 年) 的 24 億美元增至 2008 年的 3,373 億美元 (美國統計為 4,090 億美元)，漲幅高達 170 倍。¹⁸² 美中的互賴關係出現在以下的形式：美國不僅需中國繼續購買其國債維持其低利率環境，亦需大陸廉價產品以防通貨膨脹；中國則賴鈎美債且避免其貶值導致外匯存底大幅縮水，同時藉助美國消費市場以維其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¹⁸³ 美中緊密互賴的經貿關係，反過來也成為金融風暴形成的背景，其主要表現形式在於美中的貿易失衡及其後續效應。根據表一數據顯示，10 年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由 686 億暴增至 2,663 億美元，增幅將近四倍。根據統計中國目前擁有 7,369 億美元，已經超越日本，成為持有美國債券最多的國家。

前述美國經濟的內部失衡是金融風暴產生的重要原因，但中國大陸經濟結構的內外失衡也恐將是另一個重要的自變數。深入而言，中國當前的經濟成長模式存在明顯的問題，即外部成長過於依賴出口，內部成長過於依賴依賴固定資產 (特別是房地產) 的要素投入，這兩項依賴導致中國大陸經濟存在著過及收支不平衡與內部失衡的根本原因。中國經濟專家即指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是自身結構調整、經濟週期波動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迭加。「內在的結構調整和經濟週期

¹⁸¹ 就國際關係的互賴理論認為，互相依賴的關係建立之後，雙方便有某種程度的相互牽制，對彼此的反應也就更為敏感。或者說，國家之間必須維持相互敏感度，以處理共同關切的安全與經濟議題。另一方面，這些國家關係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相互易毀，要改變這樣的關係或結構將要付出更多的代價。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pp.660-662.

¹⁸² 劉韋志，綜析中美經貿現況與對雙邊關係的影響，*中共研究*，第 43 卷第 8 期，頁 89。

¹⁸³ 同前註。

波動是主因，而國際金融危機則加劇了內在矛盾的調整，使問題更加突出」。¹⁸⁴說明瞭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間接造成金融危機的產生，更使得中國大陸在金融風暴之下出現兩個立即與明顯的衝擊：「出口衰退與泡沫化」。

表一：1999-2008 年美國對中國逆差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年代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金額	686	838	830	1,031	1,240	1,619	2,016	2,325	2,532	2,663

資料來源：劉韋志，綜析中美經貿現況與對邊關係的影響，*中共研究*，第43卷8期（臺北：2009年），頁92。

本次金融風暴其實也涉及「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的概念比較。¹⁸⁵由於這種比較含括了「政經發展模式」、「政經轉型」與「改革路徑」等幾個問題層面，因此也引發了學術社群的關注與討論。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角度探索，著重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關連性，特別是「政府與」與「市場」的關係。按照吉爾平（Rober Gilpin）的分析可歸納為「市場經濟成長的政治性原因與作用」（I）、「經濟變遷與政治變遷上的相互關係」（II）、「國際經濟市場對國內經濟市場的重要意義」（III）三個自變數。¹⁸⁶在此架構下可以「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進行以下的比較（如表二：國際政治經濟學下的「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若從「轉型與發展」的角度思索，王信賢從「新自由主義」與「新傳統主義」的

¹⁸⁴ 吳曉靈，「中國經濟如何走出困境」，*人民網*，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4/49155/9317110.html>（點閱日：2009年9月18日）。

¹⁸⁵ 所謂「華盛頓共識」係由英國經濟學家、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國際貨幣基金顧問 John Williamson 於 1989 年在其《拉美政策改革的進展》一書中整理出他認為當時華盛頓的政策圈（包括美國政府、國際經濟組織如 IMF 或主流智庫）主張拉丁美洲國家應採取的經濟改革措施。相關論點參閱：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華盛頓共識簡史」，收錄於黃平、崔之元編，*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63-85，2004 年 5 月雷默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開啟了相關意涵的討論，雷默的報告指出北京共識主要包括以下四點：（一）新的發展思維：指引其他國家如在霸權體系下，如何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政治選擇。（二）有用的原則：a. 創新價值 b. 持續穩定且平等的發展 c. 自主理論（三）能量轉移：對華盛頓共識的反動；相容並蓄的特色吸引他國仿效；吸引他國經濟利益與中國結合。（四）新道路：發展非對稱力量。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http://fpc.org.uk/publications/123>>

¹⁸⁶ 楊宇光、楊炯譯，Rober Gilpin. *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21世紀的世界經濟*（臺北：桂冠出版社，2004年）。

觀點，對於「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進行分析比較。(表三、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理論爭辯)。

不論是吉爾平或是王信賢的觀點，都涉及西方資本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政府與市場的角色」等概念的比較。若至於金融風暴的環境下思考，吾人認為直接觸及兩種體系的「治理」(「沒有政府的治理」與「沒有治理的政府」)與「失靈」(「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問題。

表二：國際政治經濟學下的「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	北京共識
I	理論背景	新自由主義	新重商主義
	國家角色	自由放任	介入主導
II	改革方式	震盪療法	漸進改革
	政治與經濟關係	經濟引導政治	政治領航經濟
	市場轉型	市場同化	路徑依賴
III	全球化	全球主義	懷疑論與轉化論
	國際經濟市場	整合入全球市場	加入全球市場， 但保有相對自主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三、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理論爭辯

理論爭辯焦點	新自由主義	新傳統主義
改革方式	震盪療法	漸進改革
市場轉型	市場同化	路徑依循
中產階級	李普賽假設	社會斷裂

社會組織	公民社會	國家統合
全球化與回應	極端全球主義	懷疑論與轉化論者

資料出處：王信賢：「中國特色！？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理論爭辯」，**第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臺北：政大東亞研究所，2008年），頁3-3-11。

三、金融風暴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

2008年，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與日本。在國際貿易，中國從1978年的世界第32位貿易國家竄升到2004年的世界第3位，預估中國的出口將很快超越美國與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¹⁸⁷截至今年3月為底，中國外匯存底已超過2兆美元，為目前擁有最多外匯存底的國家。中國經濟的迅速成長成為世界經濟增長重要驅動力之一。中國GDP總量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06年的5.5%。根據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2003年到2005年，中國經濟成長對世界GDP的平均貢獻率高達13.8%，僅次於美國的29.8%，排名世界第二。根據世界銀行測算，2007年中國經濟場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能達16%，甚至超過美國。¹⁸⁸

出口對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關統計請參考表四：近十年來中國進出口貿易統計（1998-2008））。然而在金融風暴爆發後，2008年第四季，中國大陸出口出然仍成長4.3%，但增長已由10月份的19.2%下降至11.12月的-2.2%、-2.8。進口的情形更糟，第四季下降8.8%，由10月的正成長15.6%，至11月與12月分別衰退17.9%與21.3%。「進口的急遽下降，明確地顯示中國的內需正在下滑」。¹⁸⁹2009年第一季，中國出口的降幅已達-19.7%，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4,287億美元，同比下降24.9%。由於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於出口的推動，2007年中國GDP中，有37%來自出口，出口衰退必然引發中國經濟成長滑落。¹⁹⁰2009年第一季出口總值2,455億美元，占GDP的總值已降至25.5%，對生產總值的貢獻大幅衰退，2009年第一季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例，也從2004年的69.8%下降至44.59%。學者分析，中國的經濟已經連續七季滑落，從2007年第二季成長11.9%，到2009年第一季成長6.1%經濟成長率已經下滑

¹⁸⁷ 童振源，中國經濟發展之全球風險與挑戰，**九鼎**，22期（澳門，2009年8月），頁35。

¹⁸⁸ 同前註。

¹⁸⁹ 傅豐誠，「全球金融風暴下的中國經濟」，**經濟前瞻**，123期（臺北，2009年5月），頁5。

¹⁹⁰ 史惠慈、程韻璿，「擴大內需挽救中國經濟成長？」，**經濟前瞻**，123期（臺北，2009年5月），頁11。

5.8 個百分點。¹⁹¹鑑於中國第一季出口與進口同比分別下滑 19.7% 與 3.08%，若外需仍疲軟，中國今年將可能出現改革開放以來首次的出口負成長，並創下自 1993 年以來從未出現過的兩位數負成長歷史（相關衝擊可參見表五：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 2004 年至 2009 年第一季）。

表四：近十年來中國進出口貿易統計（1998-2008）

年份	進出口總額	出口總額	進口總額	貿易差額
1998	3,239.49	1,837.12	1,402.37	434.75
1999	3,606.30	1,949.31	1,656.99	292.32
2000	4,742.97	2,492.03	2,250.94	241.09
2001	5,096.51	2,660.98	2,435.53	225.45
2002	6,207.66	3,255.96	2,951.70	304.26
2003	8,512.07	4,383.71	4,128.36	255.34
2004	11,547.92	5,933.69	5,614.23	319.46
2005	14,221.18	7,619.99	6,601.18	1,018.81
2006	17,606.86	9,690.73	7,916.14	1,774.59
2007	21,738.33	12,180.15	9,558.18	2,621.97
2008	25,616.30	14,285.50	1,1330.9	2,954.60

資料來源：中共海關統計，<http://www.china-customs.com>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 2009 年發佈的「景氣領先指標」顯示，中國經濟活動狀況走到 26 年的最低點，甚至比天安門事件後幾年的低潮其還冷。¹⁹²出口衰退除了直接衝擊中國大陸經濟的增長外，更會影響製造業的與工業的表現，進而形成產能過剩、利潤下滑等效應。由於中國大陸的出口部門現階段以低技術、勞力密集、中小企業的產業性質為基礎，出口的萎縮，將直接導致吸納農民工的中小企業破產倒閉，最後更形成嚴重的失業與社會問題。學者指出，中國出口每波動 1%，將影響中國 18-20 萬人的就業。失業潮的持續擴大將對中國脆弱的社會結構帶來嚴重的衝擊，拖累中國經濟復甦。¹⁹³中共官方 5 月份公佈 2008 年的失業率為 4.2%，中國社科院則指出若將 2000 萬失業農民工納入，失業率將達 9.4%。學者指出，中國的失業率往往低估，若依國際普遍法來

¹⁹¹ 同前註。

¹⁹² 黃浩榮，「中國經濟成長之謎」，遠見雜誌（臺北：2009 年 4 月），頁 96。

¹⁹³ 史惠慈、程韻璿，前揭文。

推估，中國實際失業率將達 27%。¹⁹⁴

四、金融風暴下的美中關係

(一) 提出「超主權貨幣」觀點，替代美元地位

溫家寶表示：「中國確實有點擔心，畢竟中國擁有鉅額美國債券，希望美國能守信，確保中國資產的安全」。意指中國擁有龐大美國公債所衍生的風險問題。溫家寶的談話也顯示了中國在金融風暴之後對於全球金融秩序的關注，特別是美中所存在的經貿互賴結構與囚徒困境之下的合作問題。

在 2009 年 3 月份兩會召開前夕，中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3 月 23 日撰文表示：「藉由此次危機可思考將現行的國際貨幣系統改革為國際儲備貨幣」。周在文中未提到貨幣名稱，但卻指出：「經濟危機顯示依靠一個國家的貨幣作為國際貨幣是危險的」。¹⁹⁵中共倡議建立「超主權儲備貨幣」取代目前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之說。雖未能獲得歐美等國與會國家的支持，但金磚四國立即同聲響應。

北京除了拋出「超主權儲備貨幣」的議題外，也針對國際貨幣組織（IMF）的功能提出了新的檢討與反省。這可視為對美國主導管理國際金融體系領導權之重大挑戰。除了前述周小川專文的「明示」外，中國央行副行長胡曉煉隨後指出：「國際貨幣基金」應密切監控美國經濟情況。她同時表示：「在目前情況下，IMF 應該規範那些發行儲備貨幣之國家的金融政策」。¹⁹⁶隨後，副總理王岐山更在 27 日在「泰晤士報」專文中指出，中國將貢獻「國際貨幣基金」更多的資源以提升其借貸能力，以面臨金融危機。¹⁹⁷

紐約時報評論即：「指出北京的作法形式上體現開發中國家對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扮演角色的不滿，但實際上卻隱含了中國在 G20 召開前爭取發言權與未來替代美國全球金融霸權的企圖」。¹⁹⁸中國官員的說法其宣傳的用意遠大於實質意義，「洛杉磯時報」指出：「目前沒有一個足以取代美元的國際貨幣」。因為國

¹⁹⁴ 同前註。

¹⁹⁵ 周小川談話內容可見，「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人民網，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557/137941/index.html>（點閱日：2009 年 9 月 22 日）。

¹⁹⁶ 胡曉煉的談話可參見，「世行顧問：中國將在解決全球危機中發揮特殊作用」，新華網，網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3/31/content11107059.htm>（點選日：2009 年 10 月 1 日）

¹⁹⁷ 王岐山的談話可見，http://news.backchina.com/2009/3/29/gb2312_34869.html 中新網：（點選日：2009 年 9 月 28 日）。

¹⁹⁸ DAVID BARBOZA, "China Urges New Money Reserve to Replace Dollar", 引自紐約時報，網址：http://www.nytimes.com/2009/03/24/world/asia/24china.html?_r=2&ref=world（點選日：2009 年 8 月 29 日）。

際貨幣需要相對穩定性，使其容易購買與投資，然而在全球外匯存底中歐元占 25%，日圓只有占 3%，均無法與美元匹敵，而人民幣更無法自動轉換成投資工具。但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歐巴馬在倫敦會晤胡錦濤前表示，美中關係「將為世界處理未來許多挑戰設立一個平臺」，美國官方也指出「中國在解決國際經濟及金融危機、北韓及伊朗核武僵局、巴基斯坦動亂及氣候變遷等議題，是不可或缺的」。在各項議題中，中國的經濟角色顯然為美國所重視。¹⁹⁹

(二) 建構「G2」概念，提高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

最早提出「G2」概念的則是伯格森 (C. Fred Bergsten)，他於《外交事務》「對手間的夥伴關係：華府應如何應付中國的經濟挑戰」(“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他認為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沒有決策的影響力，因此可以不負責任作為，但美國唯有提出這種「G2」架構下，才能使中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有負責任與建設性的行為；要打中國拉進來，讓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夥伴。²⁰⁰

「G2」概念的發酵，主要是因為世界銀行總裁佐立克 (Robert B. Zoellick) 與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本 (2009) 年 3 月 6 日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所發表的題為「經濟復甦有賴 G2」 (“Recovery Rides on The ‘G-2’”) 的文章。美中兩國一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一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其經濟互依程度顯而易見。而美國房地產與股市泡沫助長過度消費，中國作為出口大國則過度儲蓄。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等等，又形同補貼美國的泡沫，造成一個全球基本的收支失衡。總之，該文認為，世界的復甦繫於「G20」，「G20」的復甦關鍵在「G2」。²⁰¹ 佐立克更與林毅夫在華府表示，「為了世界的經濟復甦，美國及中國必須合作，並成為 G20 的火車頭，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 G2 (指美國及中國)，G20 的功能將無法發揮」。²⁰²

¹⁹⁹ 「央行顧問：中國將在解決全球危機中發揮特殊作用」，新華網，網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3/31/content_11107059.htm (點選日：2009 年 9 月 29 日)。

²⁰⁰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4 (2008), pp. 57-69.

²⁰¹ Robert B. Zoellick and Justin Yifu Lin, “Recovery Rides on the G2”, *Washington Post*, March 6, 2009, p.A6.

²⁰² Robert B. Zoellick and Justin Yifu Lin, “Recovery Rides on the G2” op. cit..

即便有學者不看好 G2 的未來性，²⁰³。但國際主流媒體仍認為 G2 反映了金融風暴下國際政治經濟與美中關係的「客觀現實」。《華盛頓郵報》一篇題為「望向北京」的文章說，「首屆 G20 去年在華盛頓舉行，這說得過去。若第二次峰會是在北京舉行，將等於發出一個清晰信號，承認華盛頓／北京軸心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關係；它是全球經濟脫困的關鍵因素。如兩國攜手合作，世界會變的繁榮和穩定；若彼此作對，世界的未來將會向最悲觀的預言家所預測的那麼黯淡。」英國《經濟學人》網站也在「中國佔據舞臺中央」的文章中指出，許多人認為本次峰會應當關注的不是 G20，而是 G2，也就是中國和美國。²⁰⁴

這些觀點都說明，北京在全球經濟事務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國的經濟實力與基礎，成為中共重要的物質條件；此外，在全球互賴與的結構中，美中只能採取合作協調的態度才能取得利益的極大化，「美中經濟戰略對話」可視為具體的產物。

第四節 小結

隨著近年來中美經貿關係的快速發展，使得兩國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經濟互相依賴關係。對於此類關係的發展和其所產生的政治、經濟、安全影響，國際關係學者的判斷都是積極與正面的。有學者認為，中美之間的經濟互動已發展為一種共生與互賴的結構。這種關係的形成為兩國注入了戰略的新內容，強化了彼此相互借重的迫切感。一方面美國對外戰略設計開始以中國作為基本假設，其東亞安全戰略的施展和經濟發展環境的營造有賴於中國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國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和平發展戰略也迫切需要美國的和平姿態。最後得出，世界無法承受中美兩大國交惡，中美保持良好關係是世界和平的前提。無論美國所說「中國是具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國家」，還是中國所稱的「中美建設性夥伴關係」，都說明兩國已形成一種難以分割的互賴關係結構，它無形地引導著中美兩國走向自由主義論者口中的「經濟互相依賴和平」之路。

²⁰³ 鄭永年即指出：「對中國來說，一方面要意識到 G2 的客觀存在和其必然性，但也要意識到目前的 G2 在很多方面很不對稱，並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首先，G2 的局限性很顯然。儘管存在著 G2，但中美兩國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不僅僅表現在數量方面，即經濟和技術方面，而且也表現在本質方面，例如兩國不同的文化和政治體制，更不用說是軍事戰略方面的利益了」。鄭永年的觀點可參閱：「G2 在什麼意義上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網址：<http://blog.udn.com/jzer6699/3341397>（點選日：2009 年 9 月 29 日）。

²⁰⁴ 「G2 共治時代來臨」，**商業週刊**，1155 期（臺北：2009 年 4 月），頁 83。

但是，這種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真的可以鑄造和平嗎？吾人持懷疑的態度。論自由主義論的分析雖有其立論基礎，但對兩國間一些現實問題，可能構成中美關係的挑戰因素。試分析如下：

首先，何者導致中美關係經濟互賴？多數學者的分析偏重經濟學的視野。認為是中國在勞動力上的比較優勢（特別是低廉的工資）吸引了大量跨國公司的投資，同時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不可否認，美國政府推動中美關係固然有經濟利益的考慮，但最重要的，應該還是全球與區域戰略的需要。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內對於應該採取什麼樣的中國政策始終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最終接觸戰略取代圍堵戰略，成為美國面對中國崛起的戰略選擇。美國認為與圍堵相比，接觸戰略能更好的促進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從而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相互尊重有利於促進戰略共識和合作。基於對中的接觸戰略，美國沒有限制同中國的經濟聯繫；為了更好地實現此戰略，美國擴大了同中國的貿易往來。在這個意義上，中美經濟相互依賴不僅是美國對華戰略手段，同時也是其產物。可以想像，如果美國像冷戰初期對待蘇聯那樣對中國，中美之間目前的相互依賴是不可能產生的。如果意識到中美經濟相互依賴的關鍵原因在於美對中戰略，受到國家行為體的深刻塑造，那麼對其分析就不可能簡單地採用「經濟相互依賴和平」路徑，而應考慮更多的政治因素。

其次，在經濟相互依賴的背後，美中為世界第一與第三大經濟體，分別代表已開發國家與發中國家，由於雙方在現代化近程處於不同階段，產業結構與市場需求可形成互利與互補，雙邊貿易已由建交初期（1979年）的24億美元增至2010年的3,873億美元（美國統計為4,090億美元），漲幅高達170倍。中的互賴關係出現在以下的形式：美國不僅需中國繼續購買其國債維持其低利率環境，亦需大陸廉價產品以防通貨膨脹；中國則賴美債且避免其貶值導致外匯存底大幅縮水，同時藉助美國消費市場以維其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中美在經濟互相依賴上的不對稱性相當明顯，中國對美國的需求遠遠超過美國對中國的需求，兩國並未形成對稱性互惠共生關係。不對稱性是「相互依賴政治的核心，是權力的來源」，而美國正是憑藉自己作為其中依賴性較小的一方而獲得了某種權力，從而對中國產生種種影響。

從安全方面看，美國限制了那些可能損害國家安全利益的中美經貿往來形式，力圖把兩國之間的經濟互賴控制在與國家安全無關的領域內。比如，美國對華實施出口控制。自 2006 年以來，美國商務部提出了進一步加強對華出口管制，在對原來的出口限制清單進行微調後，增加了 47 項軍民兩用產品或技術。當時美國助理商務部部長克裡斯多夫直言不諱，聲稱此舉是為了保障美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和軍事利益。在嚴格的對華出口控制下，美國對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要遠低於從中國的進口。這從經濟角度來看，加劇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利於其經濟可持續發展。但此措施的最終採用，我們可以看到無論何時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利益發生矛盾美國本能地會傾向於後者。



第五章 結論

從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由於國際關係的本質為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安全合作對緩解安全困境、增進互信、預防衝突和戰爭、維護國際社會穩定與發展有重要的作用。中美作為後冷戰時期兩個重要的大國，其安全合作就顯得更為重要。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加強中美安全合作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一、加強中美安全合作的必要性

首先，新的威脅和挑戰的出現，使中美安全合作成為必要。隨著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的加深和全球化的發展，一系列新的問題和威脅不斷出現。國際關係學者指出，全球化國家面臨的共同挑戰主要包括：跨國威脅和來自失敗國家的威脅。跨國威脅包括：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暴力極端主義、疾病、自然災害、環境惡化和流行性疾病等。來自失敗國家的威脅是指失敗國家的內部衝突，導致難民潮和成為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成為國際體系的負擔。²⁰⁵

全球化使國際合作更加困難，也更加必要。在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和威脅方面，中美應該集中力量，僅依靠單邊力量無法解決問題，而且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果不能同時保證別國的安全，可能也將自身難保。

其次，傳統的地區安全問題的解決，需要中美安全合作。經濟全球化和亞洲的區域經濟整合以及經濟增長，正改變著亞太地區的政治安全形勢。在新的安全威脅不斷出現的同時，亞太地區傳統的政治衝突與安全議題，如朝鮮半島問題、台灣問題、領土與領海主權和海洋爭議等，並沒有得到解決，甚至競爭和矛盾有加劇的可能。這些問題的解決和管理，都脫離不開中美的政治互信與互動。朝核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關鍵在於美國與北韓存在嚴重的不信任和敵視。而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也與中國戰略環境的穩定密切相關。朝鮮半島問題的解決涉及到東北亞地區戰略格局的調整、駐韓美軍的走向乃至美國東亞戰略的調整，需要相關各方達成諒解與合作。

²⁰⁵ 班寧·加勒特，「中美夥伴關係的戰略機遇」，美國研究，2006年第1期，頁109。

隨著中國崛起的客觀事實，如何建立建設性的中美關係成為中美兩國外交的重要課題。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崛起的大國和現有霸權國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對於解決中美結構性矛盾、維持中美關係的穩定、最大程度地尋求中美利益的共同點而言，加強中美在安全領域的合作將是未來最重要的議題。

二、加強中美安全合作的可能性

首先，中美都必須有加強安全合作的意願與動機。自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雙方都願意加強在安全領域的合作。美國方面認為，中國作為主要的地區大國，將不可避免地影響美國的安全利益；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核大國，中國的行為將廣泛地影響並牽動美國的戰略格局與全球利益；中國軍方是極其重要的機構，與其保持接觸可以塑造中國的外交政策，因此加強與中國的軍事和安全合作是要的。

中國方面也希望通過安全合作謀求一個良好的東亞安全環境、獲得先進技術和知識、服務於中國的國家利益。雙方都希望通過合作減少因誤判而導致的衝突；塑造或影響對方政府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希望瞭解更多的對方防務機構及其實踐的資訊。這種合作的願望為合作的深化提供了可能。其次，中美對彼此認知的深化，為雙方合作提供了基礎。隨著國際戰略環境的變化和相互交往的深入，中美兩國對彼此的認識不斷深化。美國雖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美國全球霸權和地區霸權地位的最大挑戰，但是美國同時也認識到，如果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對中國保持接觸非常重要。美國認為惟有接觸才能把中國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中，避免中國發展帶來的不確定性，進而挑戰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

現有的安全合作機制，也為雙方的合作提供了框架或平台。除了雙邊合作外，中美雙方都積極參加多邊安全合作。換言之，已有的安全合作機制，為中美安全合作的深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按照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假設，國際建制能夠提供資訊、增加透明度、限制大國的權力、增加對成員國的約束，從而有助

於增進合作。中美

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東協區域論壇(ARF)、六方會談等框架內的合作，為雙方積累了合作的經驗與信任的條件。

三、台灣問題為牽動中美關係的內涵

柯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對中國採行「戰略伙伴」與「全面交往」政策，中共與美國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美國政府希望透過全面交往，協助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促進中共的經濟改革，進一步使中共扮演國際社會的建設性角色，最後促使中共成為民主國家。柯林頓更明確提出中國政策的三大支柱：堅持一個中國、堅持對話、不應該使用武力，做為其中國政策的基本架構。

平心而論，美國的中國政策，一向具有戰略性的模糊，而柯林頓的中國政策就前文分析而言，乃具有向中共傾斜的性質。但是在強調與中共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並推動擴大交往政策的同時，美國仍堅持和平對話來解決兩岸問題。也就是說，在追求美國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柯林頓政府將中共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希冀和平演變中共之同時，也保持台海兩岸的安全。

民主黨政府這樣的美中關係定位與擴大交往政策，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飽受共和黨的強烈批評。小布希在競選期間明白反對柯林頓政府的戰略伙伴關係定位，小布希認為中共不是戰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ship）而是「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小布希總統在競選其間的這項說法，被視為對中共政策的重大改變之一，當選總統後，小布希總統對中共政策是否進行重大調整，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美中關係是「戰略競爭者」而非「戰略伙伴」以成為小布希政府初期對美中關係的定位這樣的基本政策論述，符合所謂戰略競爭關係的論點。與柯林頓政府相較，小布希總統對中共政策顯然做了基本的戰略調整，不過這樣的調整並非將中國視為敵人。對布希政府而言，中共不一定是現在或未來的敵人，但也不是柯林頓政府所定位的「戰略伙伴」，中國非敵，但也不是盟友，基本上北京是一個崛起中的戰略競爭對手。事實上，在蘇聯崩潰，後冷戰時期來臨時，美國國內就

針對中共是否取代前蘇聯成為美國競爭對手，還是只是區域霸權的問題，進行了許多辯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將對美國造成威脅；但也有些學者認為，中共的國力確實在提升中，但就戰略角度而言，中共的軍力仍與美國有差距，中共對美國利益的主要威脅是東亞安全，特別台灣問題。

但不論是何種論述，基本上多數美國學者、專家都認為，中共已經在崛起中，「中國威脅論」的觀點、看法已經在美國引起關注，至於如何因應中共這種崛起的趨勢，也就引起所謂「圍堵」(containment)與「交往」(engagement)兩種觀點。顯然地，柯林頓政府採用了交往為主的中國政策，雖然民主黨政府也承認與中共之間有很多差異，但是與中共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試圖透過積極交往政策改變中共，讓中共融入國際體系，避免與中共採取對抗政策。小布希總統雖然未完全採用「圍堵」觀點，但對於與中共積極交往顯然不如柯林頓政府後期那樣熱衷。因此，小布希政府雖維持「一個中國」的基本政策宣示，但同時強調日本的戰略合作，更重要的是，在台灣問題方面，小布希總統明白表示表示，若台灣早受到挑釁，美國會協助台灣自衛。

參考書目

(一) 英文部分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Released” , Office of Press Secretary ,Washington ,D.C., July 21 ,199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Vol.5,No.31 (August 1,1994) ,p.522.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 (June 1981) ,pp.242-259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 No.2 (June 1981) ,pp.242-259

A Strategy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A Report to Congres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 28 ,1991).

A Strategy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Report to Congress* ((Department of Defense,1992)

Abram N. Shulsky, “Deterrence Theory and Chinese Behavior,” *RAND*, 2000, pp.45-47.<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161/>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

Allen S. Whiting ,“China's Use of Forces,1950-1996,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No.2 (Fall 2001) ,p.131.

Andrew Heywood ,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Foundation ,2002),p.50.

Barry R.Posen ,Andrew L.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6-1997,Volume 21,Issue3:5-53.

Bates Gill, ”Powell in China: Modest Progress Will Be Better Than Non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7,2001.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4 (2008), pp. 57-69.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 s as Optimist 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 19, No.3, 1994/ 1995, pp. 83-85.

Charles.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 Charles.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 Charles.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
- Charles.P.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 No.2 (June 1981) ,pp.242-259
- DAVID BARBOZA , “China Urges New Money Reserve to Replace Dollar” , 引自紐約時報 , 網址 : http://www.nytimes.com/2009/03/24/world/asia/24china.html?_r=2&ref=world (點選日 : 2009 年 8 月 29 日) 。
- Donald Rumsfeld ,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QDR)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30,2001.pp4-8.
-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1992)pp.3-18.
- George J. Demko , Willian B. Wood, Recording the world: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Westview Press*, 1999.
- Gerald Segal,”Networked Security:Why We Do Not Need A New Framework For East Asian Security”,*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Vol.XII No.2 (Summer/Fall 1998) pp.488-505.
- Glenn H .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7,No. 1, 2002, pp. 149-173.
-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78), pp.1-3.
- Jack Levy,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New York: Norton, 2001
-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Joseph S. Nye, Jr., “Coping with Japan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92/1993, 89, p.98.
-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 <http://fpc.org.uk/publications/123> >

- Martin L. Lasater , *The New Pacific Community : U.S Strategy Options in Asian*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1996),pp.12-13.-
- Peter Hays Gries ; Thomas J.Christensen, “Correspondence:Power and Resolve in U.S. *China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No.2 (Fall 2001) ,p.161.
- President Clinton , “Building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Dispatch* , Vol.4,No.28(July 12 ,1993), pp.485-488
- Rice Condoleezza ,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79(1),2000, pp.46-51.
- Rice Condoleezza ,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79(1),2000, pp.46-51.
- Richard H. Solomon, “Asian Security in the 1990s: Integration in Economics, Diversity in Defense,”*Dispatch* ,Vol,1 No.13(Nov.5,1990),pp.243-248.
- Richard J. Ellings and Edward A. Olsen, “Asian’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 ,”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1992, 3(2), p.15-17.
-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 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 Keohane, “Achievin g Cooperat 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 *World Politics* ,Vol . 38, pp. 226-254.
- Robert B. Zoellick and Justin Yifu Lin, “Recovery Rides on the G2”,*Washington Post* , March 6 ,2009,p.A6.
- Robert B. Zoellick and Justin Yifu Lin, “Recovery Rides on the G2” op. cit..
- Robert Jervis, “ Realism, Neoliberal ism, and Cooperation”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4, No. 1, 1999,pp. 42-63.
-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3.
-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Nye ,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 Free Press), pp.660-662.
- Roy Kamphausen, David Lai and Andrew Scobell eds. , *Beyond the Strait: PLA Missions other Than Taiwan*,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 S. Army War College, 2009.
- Secretary Baker , “The US and Japan: Global Partners in s Pacific Community,” *Dispatch*, Vol1.2,NO.13(Nov.5,1990),pp.841-846.
- Thomas J.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No.4 (Spring 2001) ,p.38.

Thomas J.Christensen, “The Contemporary Security Dilemma:Deterring a Taiwan Conflict”,*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5:4, (Autumn 2002) ,p.13.

Thomas J.Christensen,”China,The U.S.-Japan Alliance,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Spring 1999), pp.49-8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 <http://www.defenselink.mil/qdr/report/Re2port20060203.pdf> ,2009 - 01 - 12.

William J.Clinton ,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1995-1996*(Washington D.C.:Brassey’s, January, 1995),pp.XII,9.

Winston Lord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 Ten Goals for American Policy ,”*Dispatch* ,Vol.47,No.36(Sept.6,1993),pp.612-614.

Zalmay Khalilzad , “U.S Grand Strategie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 and World ” , in Zalmay Khalilzad ,ed., *Strategic Appraisal 1996* , Santa Monica ,Cal. :Rand ,1996, pp.11-34.

Zalmay M Khalilzad , “Sweet and Sour Recipe for a New China Policy”, *RAND Review*, 23(3), 2000,pp.6-11.

(二) 中文部分

〈中俄關於世界多及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 *人民日報*, 1997 年 4 月 24 日, 版 1。

「G2 共治時代來臨」, *商業週刊*, 1155 期 (臺北: 2009 年 4 月), 頁 83。

「中美經貿關係中的分歧與共贏」, *中評社*, 網址: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6/9/9/1/101699137.html?coluid=148&kindid=0&docid=101699137&mdate=0520001511> (點選日: 2011 年 5 月 22 日)。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戰略』來之不易」, *國際在線*, 2006 年 10 月 19 日。

「反核擴散: 中國的大國責任與利益追求」, *新華網*, 網址: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14/content_5089524.htm (點選日: 2011 年 5 月 17 日)。

「匯率: 人民幣升值是中國問題並非中美問題」, *中國網*, 2006 年 12 月 14 日。

Munro, Ross H .、Berntein Richard 著, 許綏南譯, *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 (台

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3-5。

Patrick Tyler 著，聯合報譯，**中美交鋒**，（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年2月），頁519。

Robert Jones Shafer，趙干城、鮑世奮譯（1996），**史學方法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頁33。

Robert S. Ross，「中國崛起、地區權力轉移與東亞安全，從1949年到21世紀」，**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11期，頁36。

Robert S. Ross，「中國崛起、地區權力轉移與東亞安全，從1949年到21世紀」，**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11期，頁42。

TreasuryDirect（美國財政部公債局電子化系統之一），「政府債務和持有者」，2008年10月7日。

Waltz, Kenneth N. 著(1997)、胡祖慶譯，**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圖書），頁121~123。

William R. Cline and John Williamson，基本均衡匯率的最新估計，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政策簡報PB08-7，2008年7月。

人民日報，「江澤民在杜尚別出席「上海五國」元首會晤時的講話」2000年7月5日。

人民日報，「江澤民在杜尚別出席「上海五國」元首會晤時的講話」2000年7月5日。第1版

人民日報，中國向東盟論壇提交新安全觀立場一，2002年8月2日，第3版。

人民網，「關於『北京共識』與中國發展模式的對話」，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557/54488/54489/3802863.html>（點選日：2008年10月11日）

人民網，網址：<http://opinion.people.com.cn/GB/6102773.html>（點選日：2008年10月9日）。

于有慧，「中國的大國外交」，**中國大陸研究**（台北：1999年），42卷第3期，頁45-62。

中國國家地理編委會，**國家地理（世界卷）**（北京：藍天出版社，2007），頁314。

中華歐亞基金會、改革開放論壇聯合研究報告，**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台海局勢**（台北：大屯出版社，2003年），頁57。

王岐山，http://news.backchina.com/2009/3/29/gb2312_34869.html 中新網：(點選日：2009年9月28日)。

王信賢：「中國特色！？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理論爭辯」，第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臺北：政大東亞研究所，2008年)，頁3-3-11。

王勇，「論中國的新安全觀」，**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1期，頁42-45。

王秋彬，「東北亞地區安全困境及其成因解讀」，**長春師範學院學報**，第28卷第4期，2009年7月，頁1-2。

王逸舟，「論綜合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1998年第4期，頁23-26。

王慧，「中美貿易逆差原因分析」，**價格月刊**，2010年第10期，頁19。

王黎，**中美戰略互信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院碩士論文，2010年)，頁16。

王輯思、徐輝：「.中美危機行為比較分析」，**美國研究**，2005年第2期，頁27~29。

史惠慈、程韻璿，「擴大內需挽救中國經濟成長？」，**經濟前瞻**，123期(臺北，2009年5月)，頁11。

吉爾平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87~88。

朱宏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年)，頁25-28。

朱崇坤主編，**霸權的歷程—美國軍事戰略冷觀察**(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年)，頁260-261。

吳蕙思，「國際核不擴散體制面的挑戰：美國的作用及其對中國的意義」，載於倪世雄、王義桅主編，**中美國家利益比較**(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頁209。

吳曉靈，「中國經濟如何走出困境」，**人民網**，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4/49155/9317110.html> (點選日：2009年9月18日)。

李少軍，**國際戰略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38。

李明，「地緣政治與中共對東北亞的外交戰略」，**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略**(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2006年)，頁75。

李連仲，**長波理論與世界經濟發展**，**探索**，第3期(重慶：2000年)，頁13。

李義虎，**地緣政治學：二分論及其超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253。

李稻葵，「中美貿易順差：根本原因在哪裡」，**國際經濟評論**，2006，頁 05。

肖耿，「從結構與制度視角解釋中國匯率政策和外部經濟失」，**國際經濟評論**，2007，第 7-8 期，頁 18。

周小川，「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人民網**，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557/137941/index.html>（點閱日：2009 年 9 月 22 日）。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出版，1999 年）頁 44。

邱坤玄，「台灣的中共外交研究與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東亞研究**（台北：2009 年），40 卷第 2 期，頁 18。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31 卷第 3 期（台北：2000 年），頁 23。

金威，「從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看安全觀的變化」，**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0 年第 4 期，頁 10。

金駿遠，**中國大戰略與國際安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21。

門洪華，**建構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05-206。

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華盛頓共識簡史」，收錄於黃平、崔之元編，**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63-85，

胡鞍鋼，**中國大戰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8。

胡曉煉，「世行顧問：中國將在解決全球危機中發揮特殊作用」，**新華網**，網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3/31/content11107059.htm>（點選日：2009 年 10 月 1 日）

唐世，**塑造中國的理想安全環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12~ 18。

唐世平，**塑造中國的理想安全環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34。

唐世平、曹筱陽，「尋求中、美、日相互安全的基點」，**戰略與管理雙月刊**，2002 年總第 50 期，頁 105。

孫滔，**人民幣升值與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天津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2。

孫磊，趙國欽，「解析美國儲蓄-投資缺口與貿易逆差的關係」，**黑龍江對外經貿**，2007，頁12。

孫曉玲，「霸權穩定論”與中國新安全觀：一種比較視角」，**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2期，頁53。

班寧.加勒特，「中美夥伴關係的戰略機遇」，**美國研究**，2006年第1期，頁109。

袁易、嚴震生、彭慧鸞.合編**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認知**。(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年)，頁2。

袁欣，「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探析」，**生產力研究**，2008，頁24。

馬耀邦，**中美關係-透視大國隱性戰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頁153。

高永富，「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及其解決途徑研究」，**國際貿易**，2009，頁2。

高桓，多極化世界需要樹立新安全觀，**國際政治與安全**，2000年第11期，頁22-27。

康紹邦、呂力合著，**國際戰略新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頁1。

張文木，「中共國家安全哲學」，**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1期，頁24。

張文木，「中共國家安全哲學」，**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1期，頁24。

張宏遠，全球金融風暴下的中國角色與定位，**展望與探索**，第6卷第12期，頁8。

張亞中、孫國祥，「亞太綜合安全：台灣安身立命之所基」，**亞太綜合安全年報**（台北：2002年），頁3。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伙伴**（台北：揚智出版社，1999年）頁79。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文化，2003年），頁47。

曹雄源，**戰略透視-冷戰後美國層級戰略體系**（台北：五南出版，2011年），頁164-165。

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研究的評析」，**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12期，頁65-89。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出版，2004年），頁205-206。

陳永祥，**布希與中國**（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42。

陳啓懋，「國際體系和中國國際定位的歷史變化」，**國際問題研究**，2006年第6期，頁36-37。

傅豐誠，「全球金融風暴下的中國經濟」，**經濟前瞻**，123期（臺北，2009年5月），頁5。

斯琴塔娜，「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運行帶來的影響」，**中國鄉鎮企業會計**，頁12。

童振源，**中國經濟發展之全球風險與挑戰**，**九鼎**，22期（澳門，2009年8月），頁35。

華夏經緯，「國際上已經形成了『北京共識』」，網址：
<http://hk.huaxia.com/zt/pl/07-093/608561.html>（點選日：2008年10月11日）。

黃浩榮，「中國經濟成長之謎」，**遠見雜誌**（臺北：2009年4月），頁96。

新浪網，網址：<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6-09/0851554624.html>
（點選日：2011年3月12日）。

新華網，「中國提升軟實力：『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網址：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6/13/content_1522884.htm（點選日：2008年10月11日）。

新華網，網址：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8243.htm（點選日：2008年10月9日）。

新華網，網址：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1/16/content_2467736.htm（點選日：2008年10月9日）。

楊光海，「美國的東亞同盟體系：態勢、趨向及意圖」，**國際論壇**，2002，頁4。

楊宇光、楊炯譯，Rober Gilpin. **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21世紀的世界經濟**（臺北：桂冠出版社，2004年）。

楊潔勉等著，**大磨合—中美相互戰略與政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60。

楚樹龍、耿秦主編，**世界、美國和中國—新世紀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理論探索**，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84。

楚樹龍、彭春艷，「冷戰後國際安全理論的發展」，**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第4期，頁13。

董立文，「論中共的大國定義及其問題」，**中山人文社會學期刊**（台北：1998年），第6卷第2期，頁65-76。

董立文，唐開太，**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台海局勢**（中華歐亞基金會、改革開放論壇合著，民92年）頁178。

資中筠，**戰後美國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頁118。

鄒偉偉，**中美經貿關係的歷史發展與政策博弈**（西南財經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頁42。

劉韋志，綜析中美經貿現況與對雙邊關係的影響，**中共研究**，第43卷第8期，2009年8月，頁89。

劉韋志，綜析中美經貿現況與對雙邊關係的影響，**中共研究**，第43卷第8期，頁89。

劉輝鋒，長波理論研究論評，**江西社會科學**，第5期（江西，2004年），頁16。

劉靜波，**21世紀初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6年），頁48-53。

樊勇明，「霸權穩定論的理論與政策」，**現代國際關**，2000年第9期，頁20~21。

蔡拓，「當代中國國際定位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人民網**，2010年5月8日。

鄭永年，「G2在什麼意義上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網址：
<http://blog.udn.com/jzer6699/3341397>（點選日：2009年9月29日）。

鄭端耀，「新型安全觀與兩岸關係」，**社會建構論與兩岸關係：理論與實踐的對話**（台北：當代思潮系列座談，政大國關中心主辦，2001年）。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與影響」，**中國利益總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6），頁5。

薩本望，「我國安全觀的變化及新的普遍安全觀的主要特點」，**和平與發展**，2000年第1期，頁5-9。

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和等譯，**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08~113。

關中，「十年必辯，十年必變：五十年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折」(國政研究報告，民國 91 年 4 月 1 日)

關中，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遠景季刊** (台北：2002) 第 3 卷第 1 期，頁 3-8。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頁 789。

蘇浩，「地緣重心與世界政治的支點」，**現代國際關係**，2004，頁 4。

